




Research on David Harvey's
Thoughts of the Urban Space

唐旭昌 著

大卫·哈维

城市空间思想研究

 人民出版社



大卫·哈维
城市空间思想研究

ISBN 978-7-01-014244-9



9 787010 142449 >

定价：39.00 元

大卫·哈维

城市空间思想研究

唐旭昌 著

责任编辑:钟金铃

封面设计:汪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研究/唐旭昌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01-014244-9

I. ①大… II. ①唐… III. ①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研究

IV. ①B01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3515号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研究

DAWEI HAWEI CHENGSHI KONGJIAN SIXIANG YANJIU

唐旭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40千字 印数:0,001-2,000册

ISBN 978-7-01-014244-9 定价:3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一、大卫·哈维与城市.....	1
二、国内外学者视野中的哈维城市空间思想.....	5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14
第一章 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理论渊源.....	18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18
一、空间.....	18
二、城市.....	20
三、城市空间.....	23
第二节 马克思：立场与方法.....	24
一、坚持激进的批判立场.....	24
二、采用《资本论》的概念框架.....	31
三、运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	34
第三节 列斐伏尔：空间与社会.....	39
一、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	40
二、资本主义空间充斥着矛盾.....	44
三、迈向社会主义的空间.....	46
第四节 福柯：空间与权力.....	50
一、空间时代的崛起.....	51

二、空间里渗透着权力	52
三、全景敞视主义	54
第二章 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理论基础	59
第一节 空间：社会的建构	59
一、填补马克思的“理论空盒”	59
二、空间是社会的构造物	63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建构	67
第二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基石	70
一、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70
二、作为城市空间理论基础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78
第三章 资本逻辑视阈下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84
第一节 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85
一、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	86
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的结合体	91
三、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	95
第二节 作为资本主宰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103
一、“为积累而积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基本法则	104
二、金融资本：形塑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决定性力量	110
三、“三级循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资本循环形式	117
第三节 作为弹性积累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123
一、从福特制到弹性积累	123
二、弹性积累背景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经济	126
第四节 思考与启示	129

一、对资本逻辑的反思	129
二、对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	135
第四章 权力逻辑视阈下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141
第一节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的矛盾	141
一、人与自然的矛盾	142
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	151
三、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	163
四、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一致”的趋势	167
第二节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不平衡地理发展	174
一、不平衡地理发展与全球化	176
二、不平衡地理发展与居住差异	181
三、不平衡发展与郊区化	188
第三节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阶级垄断租金	191
一、阶级垄断租金与绝对空间	191
二、阶级垄断租金与相关阶级力量博弈	195
三、阶级垄断租金与城市化	199
第四节 探寻未来的城市世界	203
一、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歹托邦”图景	203
二、对未来城市空间的探寻和展望	207
第五节 思考与启示	214
一、正视和化解城市矛盾	215
二、制定健康合理的城市规划	221
三、人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和关键	224

第五章 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辩证评判	232
第一节 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积极意义	232
一、促成了地理学的研究的重大转向.....	232
二、开辟了城市空间分析的新视角.....	235
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思想的新境界.....	237
第二节 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缺憾	239
一、马克思的城市空间思想.....	240
二、恩格斯的城市空间思想.....	244
索 引	251
参考文献	262
后 记	269

导 论

一、大卫·哈维与城市

选择以“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思想”作为本书的选题 (David Harvey, 在学术界有大卫·哈维和戴维·哈维两种译法, 本书采用前种译法, 更多时候直接采用哈维来指称), 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一是哈维本人学术路径、学术特点和思想立场的特殊性及现实性; 二是城市空间对人类发展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 三是中国目前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 哈维的学术路径、特点和思想立场

大卫·哈维 (1935 年—), 出生于英国 Kent 的 Gillingham, 当今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社会理论家, 现为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教授。他先后获得剑桥大学地理系文学学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哈维曾先后任教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大学、美国宾州大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哈维最初研究的学术重心是地理学, 其代表作是 1969 年出版的被称为“地理学圣经”的《地理学中的解释》(*Explanation in Geography*)。由于哈维在地理学方面的卓越成就, 他先后获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吉尔纪念奖 (1972 年)”、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荣誉奖 (1982 年)、被称为地理学诺贝尔奖的“瓦特林·路德国际地

理学奖”（1995年）。

应该说，哈维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其研究成果都获得了世界地理学界的很高评价，并因此奠定了在地理学界的重要地位。但是以1973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的出版为标志，哈维的学术路径、学术特点和思想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满足于“解释世界”的目的，而是寻求“改造世界”的任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学者都将哈维归入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列。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哈维摒弃了地理学研究中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和所谓“价值中立”的立场，转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地理学问题，把地理学研究与实际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力图建构一种将地理学研究中的空间分析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分析相结合起来的理论，也就是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理论，并用此理论来分析评判当今的城市空间，从而探寻城市空间尤其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矛盾问题，为最终找到一条替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理想城市奠定基础。

在这个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他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应该说，在哈维众多的著作中，围绕城市和城市空间进行研究和探讨是其学术研究的一大亮点。这集中体现在1973年出版的《社会正义和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1982年出版的《资本的界限》（*The Limits to Capital*）、1985年出版的《资本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及《意识和城市经历》（*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1996年出版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2001年出版的《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2010年出版的《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这几部著作中。贯穿这些城市空间思想研究著作中的一个核心线索就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及方法和《资本论》的概念框架来分析、探讨、审视和评判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在这些著作中哈维深刻

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进行分析和批判的过程中,哈维虽然是从空间、地理和环境的视角去切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但又不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因此,哈维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问题上不乏真知灼见,并为如何建设好城市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考和启示。不难看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和探讨城市空间是哈维城市空间研究区别于其他西方学者城市研究的一个最大亮点。

(二) 城市空间对人类发展具有的特殊意义

城市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历史产物,它寄托着人类无限的美好希望。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人们之所以选择城市,是因为城市能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生活环境,能给人带来愉悦的精神享受和全面发展的良好条件。在当今,城市这个特殊的容器聚集大量的人口、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城市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空间主体、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与此同时,城市又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中心和各种利益主体共生的场所,城市空间中各个个人、群体、团体、阶层和阶级追求各自的利益并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个特殊的空间中展开博弈和斗争。所以,城市空间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是集中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领域。这样,在城市空间中,人们的美好愿望与较为严酷的现实构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形成、发展和解决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传统观点来看,城市空间都被理解为一个中立的物理空间,似乎只需要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规划、建设、改建、重建就能够让城市得到和谐发展。但是,在城市空间塑造和改造的背后是资本的渗透和各种权力的介入,城市中各种利益主体都力求在这个特殊的空间中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这集中表现为在城市这个有限空间内,对诸如住房、公共空间、生活空间和交通空间等空间资源的争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城市不

是某些特权阶层独享的空间，它应是各个阶层与群体和谐共生的场所，他们都有权利获得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研究城市这个独特的空间，探讨这个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社会意义，让城市能够和谐健康发展，让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磁石以吸引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人们都能够在这个容器中美好的生活，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凸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

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的城市建设逐步转向以效率为先的发展模式上来。在这种发展模式的主导下，尤其是在推行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商品化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底层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空间利益受损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发展模式以经济为主要考量指标而忽视人文和社会内涵；二是城市规划不科学和执行不力；三是广大中低收入者的居住权得不到保障；四是特殊群体和特殊人员不合理地占有过多的空间资源；五是由拆迁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突出；六是城市中社会公共空间资源（如商厦、宾馆、娱乐场所、公园、绿地、马路、图书馆等）的利用和占有的不平等。

作为承载着人类美好希望的城市空间，应是所有城市生活中的各个主体都有权获取相应的空间资源，应是各个主体平等分享城市生活的空间。唯有如此，城市才会更加和谐和美好。城市空间中的矛盾和问题伴随着城市发展的始终，人类只有正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才能够更好地前行；而哈维有关城市空间尤其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思想对人类在城市空间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都作了较为深入的富有卓效的探讨和思考。因此，对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进行梳理、研究和探讨，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对城市空间的认识、为建设和谐而宜居的城市以及为我国城市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我国城市化如火如荼进行而暴露出来诸多社会问

题的当今，要使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就需要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以避免城市化过程中不必要的弯路。所以，对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与发展起到一定的参照、借鉴和启示作用。

二、国内外学者视野中的哈维城市空间思想

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对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进行专门研讨的文章和著作不多，其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一些期刊和一些著作中。但这些呈零散状态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进行了解读，对其城市空间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了揭示和分析，对涉及有关城市空间思想的一些重要理论做了梳理和研究，对哈维有关城市空间思想的重要文本进行了解读和评述。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基础和借鉴，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本书的成形和出版。

（一）国内研究现状

1. 对哈维及其著作的介绍和翻译

从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在国内率先对大卫·哈维进行介绍和研究的，当推蔡运龙和顾朝林，他们主要是从地理学的视角来介绍和研究哈维的。早在1990年，蔡运龙就对被称为“地理学圣经”的著作——《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进行了介绍和评述。他们认为这是一部用逻辑实证主义对地理学进行解释的著作，该书为地理学的科学化和理论建构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是第一本地理学方法论专著，在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① 顾

^① 参见蔡运龙：《地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评〈地理学中的解释〉》，《地理研究》1990年第3期。

朝林、李平从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角度对哈维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哈维是在地理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之一，1973年《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出版标志着哈维从实证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主要体现在他以阶级斗争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城市问题。^①唐晓峰主要从学术视野和思想内涵方面来介绍和评述哈维，在他看来，“以地理思维之长（空间观察），见人文社会之短（批判弊病），是哈维治学的主要特点，也是其学说为人关注的主要原因”。^②

从翻译的成果来看，目前对哈维的著作完整的翻译有：2003年由胡大平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希望的空间》(*Spaces of Hope*)；2003年由阎嘉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2008年由王志弘翻译、台湾群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迈向不均地理发展理论》；2009年由初立忠等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帝国主义》；2010年由胡大平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2010年由王志弘等翻译、台湾群学出版社出版的《资本的空间：批判的地理学刍论》；2010年由黄煜文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2011年由陈静翻译、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部分翻译的成果有：胡大平翻译出自《空间、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的《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和《可能的城市世界》；胡大平翻译选自《城市经历》一书的《贯穿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弹性积累：对美国城市中“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孔明安翻译的《“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朱美华翻译的《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朱康翻译的《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而对关系到哈维城市空间的几部核心著作至今还没有被翻译出版。

① 参见顾朝林、李平：《哈维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29日。

② 唐晓峰：《思想者哈维》，《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29日。

2. 对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研究

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是奠定其城市空思想研究中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因此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和探讨的当数胡大平教授。围绕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他先后发表了《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和《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三篇论文。胡大平认为,正是通过地理学这个人口,哈维才认识到了空间问题在当代资本生产中的重要性,由此才积极推动和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基础来探寻消除物化实现自由的道路;^①在进一步分析哈维的空间路径和总体性方法的基础上,胡大平指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哈维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视角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案例;^②胡大平还对哈维构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原因和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正是由于实证主义地理学忽视社会和历史的致命缺陷才导致哈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构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③

3. 对哈维城市空间问题的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哈维的空间思想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围绕他的著作《希望的空间》中的有关乌托邦空间思想进行研究;二是从城市规划学科的角度来分析其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城市空间。《希望的空间》一书的翻译者胡大平认为,哈维是从空间视角来阐明乌托邦问题的,该书聚焦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斗争,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的

① 参见胡大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② 参见胡大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载张一兵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③ 参见胡大平:《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重组就是一种物化的乌托邦，而这种矛盾只有在辩证的时空乌托邦理想中才能解决。^①王金岩、吴殿廷对哈维的《希望的空间》进行了中国化式的解读，他们从该书中包含的全球化背景下地理空间不平衡思想出发，主张在中国的城市空间建构过程中应该吸收哈维的辩证乌托邦思想的营养，避免单一的权力乌托邦或市场乌托邦。^②巨澜对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进行了述评，他认为哈维城市空间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城市化，通过城市化，哈维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在塑造城市中的决定作用。^③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探寻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章仁彪、李春敏对哈维的空间理论进行了探析，他们将“空间及其生产”视作哈维关注的核心问题，认为哈维既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探索的传统，又尝试将空间作为一个积极因素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阐述框架之中，这是贯穿于哈维空间理论分析中的一个逻辑主线。^④张应祥将哈维看作是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中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代表人物和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他认为，哈维是在批判性吸收列斐伏尔思想的基础上，把城市的本质理解为一个个人造环境，与此同时哈维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创立了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把城市空间视作资本积累、资本危机和资本循环的产物，城市空间既负载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也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⑤高鉴国也将哈维视作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哈维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明确表示坚持马克思

① 参见胡大平：《为什么以及如何通过空间来探寻希望？哈维〈希望的空间〉感言》，《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

② 参见王金岩：《城市空间重构：从“乌托邦”到“辩证乌托邦”——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的中国化解读》，《城市发展研究》2007年第6期。

③ 参见巨澜：《哈维城市空间理论述评》，《黑河学刊》2009年第2期。

④ 参见章仁彪、李春敏：《大卫·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⑤ 参见张应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主义基本观点的代表人物，在整个城市研究领域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哈维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城市进程中资本积累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哈维坚持用马克思的劳资关系作为分析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但他又提出了阶级关系在城市空间中表现为居住差异、阶级利益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①孙江将哈维视为马克思之后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视野的角度对哈维的空间思想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哈维“综合运用地理学家特有的空间观察力和犀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弊病批判力，开创性地把空间生产作为一个积极因素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核心，把马克思主义空间化，重构了当代马克思主义”。^②

4. 对诸如时空压缩、弹性生产、不平衡地理发展概念的研究

冯雷从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主题的角度探讨了哈维的空间理论和时空压缩理论。在他看来，哈维反对那种把空间看作空洞、均质与社会关系无关的容器的观点；而哈维的“时空压缩”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资本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③董慧对哈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进行了探讨，她认为哈维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采取了新颖、拓展与激进的路径。^④仰海峰探讨了从马克思到哈维的资本空间规划与资本布展思想。他认为，哈维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从福特制到弹性生产的转变。^⑤哈维还对弹性生产方式特征以及弹性生产与资本全球规划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剖，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资本的时间因素，而哈维更多关注的

① 参见俞吾金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256页。

② 孙江：《“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③ 参见冯雷：《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四个主题——对后现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④ 参见董慧：《大卫·哈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述评》，《哲学动态》2008年第5期。

⑤ 参见仰海峰：《全球化与资本的空间布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是资本的空间因素。^①胡大平也撰文认为，哈维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作围绕资本积累而建立和变化的制度，而当前资本积累出现了以弹性积累为特征的新变化。^②《后现代的状况》一书的翻译者阎嘉主要集中探讨了哈维的后现代问题。他认为在哈维研究后现代主义时，区别于一般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坚持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批判，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历史状况。^③阎嘉还对哈维的《巴黎，现代性之都》做了评述，主张这是一部以巴黎这座大都市的空间改造为例进行分析的作品，生动地展示了大都市的空间改造是以“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物质化过程和以“时空压缩”为特征的情感体验过程的统一，而在文学上则表现为陌生感、异化感、孤独感以及迷惘、紧张乃至惊恐的心态。^④从国内学者对哈维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他们对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的相关方面都有所触及和论述，这主要涉及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城市空间思想的相关概念、城市空间的经济社会意义这三个方面。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研究来说，相关的学者做了许多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他们的学术成果对本书也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丰富的素材。但是这些探讨从各自的视角和各自的学科背景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做的局部的考察和分析，缺乏一个系统和整体的思维来对哈维城市空间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研讨，尤其是没有从哈维分析城市空间的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认识和探讨城市空间。因此，本书的目的在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力图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来考察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从而发掘塑造城市空间的经济规律和影响城市空间的政治因

① 参见仰海峰：《弹性生产与资本的全球空间规划——从马克思到哈维》，《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

② 参见胡大平：《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③ 参见阎嘉：《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兼评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理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④ 参见阎嘉：《现代性的文学体验与大都市的空间改造——读戴维·哈维〈巴黎，现代性之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素及社会力量。

(二) 国外研究现状

哈维有关城市空间研究的主要著作出版以后,这些著作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围绕这些著作的书评也相当多。

围绕《社会正义和城市》进行的评述。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学教授 Richard L. Morrill 认为,《社会正义和城市》是哈维在意识到以前自由主义格式和实证方法不能完全理解城市的本质之后,转向以马克思的激进视角来分析城市的一部著作,在该书中,哈维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地租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及其城市中的阶级斗争。^① 美国克拉克大学迪克·皮特把《社会正义和城市》看作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地理学逐步转向关注相关社会问题的产物,认为该书充分体现了哈维的学识和政治倾向。^② 英国坎特伯雷肯特大学 R.E.Pahl 将《社会正义和城市》视作奠定哈维在城市研究中重要地位的一部著作,他认为在该书中,哈维把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力图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而“城市化和城市是哈维关注的重点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则是哈维探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法论”。^③

围绕《资本的界限》进行的评述。美国康乃狄克大学 Bernard Magubane 认为哈维的《资本的界限》是一部跨学科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哈维综合改写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本,该书涵盖了《资本论》的

① Richard L. Morrill, Book Review: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64, No.3 (Sep., 1974), pp.475-477.

② Dick Peet, classics in human geography revisited: Harvey, D.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Prog Hum Geogr* 1992; 16; p.71.

③ R. E. Pahl, Book Review: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by David Harvey, *Urban Stud* 1974; 11; p.93.

主要概念和主要理论；但是哈维并非简单地综合《资本论》，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具有独创性的观点。^①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 Gordon L. Clark 对哈维《资本的界限》一书评价很高，他认为该书表明了哈维的学术视野得到了开拓和深化，它为哈维全面深入地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和资本主义空间形式和功能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该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潜在的内在矛盾、形成危机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现实，Clark 尤其赞赏哈维有关资本主义体系中内在矛盾的分析和城市空间中建筑环境的理论。^②

《资本的城市化》、《意识和城市经历》是哈维研究城市空间并在国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国外学者围绕这两部著作进行了广泛的评论。英国爱丁堡大学 R. J. Morris 将哈维视为一个既具备哲学知识又具有历史知识的学者，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过程。R. J. Morris 认为，“资本主义要生存，就不得不城市化”构成了这两部著作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是建立在资本必须不断地循环和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哈维这些著作的最大价值在于不断地对空间意识和社会经济关系相连的问题进行探寻和拷问，但是哈维著作也存在着把城市化过程过于简单化的缺陷。^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John Walton 认为，哈维的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解释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进程，哈维《资本的城市化》一书的主要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空间的基础上改写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从地理学的视角研究城市；三是对传统的城市社会学进行批判。^④英国爱丁堡大学 David McCrone 也对哈维的这两部

① Bernard Magubane, *The Limits to Capital* by David Harve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12, pp. 534-535.

② Gordon L. Clark, Book Reviews: *the Limits to Capital*, by David Harve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73, No. 3 (Sep., 1983), pp. 447-449.

③ R. J. Morris, Book Reviews: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and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0, No.3 (Sep., 1988), pp. 574-577.

④ John Walton, Book Reviews: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 Vol.77, No.1 (Mar., 1987), pp. 129-133.

著作进行了评述，他认为哈维无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城市社会，这些著作试图把空间作为同金钱和时间一样的，都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范畴。^①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John Eyles 认为，这两部著作体现了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结果，哈维坚信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进程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法则来加以考察，而这又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时空动力来加以阐明。资本既形塑了城市空间，同时也塑造了城市中居民的社会意识。因此，哈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进了城市研究中，而这在传统的地理研究中长期被忽略。^②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是哈维又一部反映其城市空间思想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Kent Mathewson 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Cindi Katz 对该著作都给予了较高评价。Kent Mathewson 认为，至该书出版前的近三十年时间，哈维一直在做构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工作，该书也是他这一理论目标的重要一环。他以马克思的辩证法为工具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诸如“地方—全球”、“时间—空间”、“自然—社会”等一系列范畴和矛盾，坚持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阶级斗争作为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工具。^③Cindi Katz 认为该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分析了人与自然、空间生产以及蕴含生产关系和再生产、社会结构力量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地点，在该书中哈维旨在理解“时间、空间、和自然”与差异地理生产的关系，在哈维看来，这些差异既是一个社会生态过程，同时

① David McCrone, Book Reviews: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and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8, No. 1 (Mar., 1987), pp.130-131.

② John Eyles, Book Reviews: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and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from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12, No.1 (1987), pp.116-120.

③ Kent Mathewson, Book Reviews: David Harvey's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Geographical Review*, Vol.87, No. 4 (Oct., 1997), pp. 554-557.

也是一个政治经济过程。^①

从国外相关研究文献可以看出，众多学者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探讨集中在对哈维相关的著作的评述中。他们对哈维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思想的著作的主要内容、重要特点和特殊地位做了概括和评述。虽然这些成果能够为了解哈维城市空间思想提供了一些线索和重要启示，但是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完整的论述，更没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进行考察和解读。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主要内容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用以研究和分析的指导方法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本书旨在通过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进行经济分析和政治学解读来揭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矛盾和问题，同时又结合中国城市化过程从中探寻对中国城市建设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书的逻辑结构按照以下的顺序展开：首先对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的相关前提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分析。而这又围绕两个方面内容进行，一方面是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理论的渊源进行追溯，这里主要涉及马克思、列斐伏尔和福柯这三个与哈维城市空间思想密切相关的人物。马克思为哈维的城市空间分析提供了思想资源、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资源；同时，哈维在分析探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直接借用了《资本论》的概念和框架。列斐伏尔有关空间和空间生产的重要意义，有关空间与社会的内在

^① Cyndi Katz,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assions: Engagements with David Harvey's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88, No. 4 (Dec., 1998), pp.706-707.

关系等观点也构成了哈维城市空间分析的重要思想来源。福柯有关空间中渗透着权力、权力又深深地影响和塑造空间的思想为哈维从权力逻辑视阈下分析评判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探讨了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主要涉及两个基础理论问题，一是哈维把空间看作是社会的建构；二是哈维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作是其城市空间思想的理论基础。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所进行的经济视阈的分析和政治视阈的解读。在经济视阈的分析中，哈维从商品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将其视为是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是级差地租、垄断地租和绝对地租的结合体，是统治阶级力图实现剩余价值的空间。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金融资本具有绝对控制性的力量。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他的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政治视阈的解读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矛盾、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和城市空间中的阶级垄断租金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和探讨。在梳理、归纳、概括、分析、探讨和评判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的同时，本书结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我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规划、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及问题、资本逻辑的边界进行了一些思考，期望能够为我国的城市化建设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索和借鉴。

本书最后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进行了综合性的评判。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综合的体系，其中包含着各种学科背景、多种人物思想，其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矛盾问题不乏合理的批判与深刻地揭露，但哈维城市空间思想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憾，那就是对空间地位和作用给予了过高的地位和评价，以及对马克思空间思想尤其是城市空间思想存在严重的误读和曲解。因此，很难用“好”与“坏”来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作一个简单的判断，而需要用辩证的观点对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作一个合理的评判。从理论上说，哈维对地理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推进都具有积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城市空间理论能为我们现

阶段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一些有益的和借鉴。

（二）研究方法

本书研究对象的特点和哈维学术特点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本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总的来说，本书主要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和谈话记录中，本书的主要工作是，从大量的中外文文献资料抽取、梳理、概括和总结出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从而对其城市空间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进行探讨，并从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视角对其城市空间思想进行解读，从而服务于为中国的城市建设提供思考和借鉴的目的。因此文献研究方法就成为了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大量的文献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取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相关概念、概括其城市空间思想的主要脉络、提炼其城市空间思想的主要框架。

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哈维是从实证地理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学科背景非常复杂，涉及了地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因此，对其城市空间思想进行研究也就必然要涉及这些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从这些相关的学科知识背景中去了解哈维城市空间思想形成发展的历程、主要内容和相关特点。所以，多学科的综合视野的研究是本书研究重要方法之一。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从事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也与哈维本人的理论旨趣相一致。哈维之所以从实证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局限在书斋里的传统地理学面向鲜活的社会实践、直面现实的社会问题从而为解决现实问题贡献地理学科应有的力量。因此，哈维继承了马克思的“改变世界”比“认识世界”更重要的实践传统，他的城市空间思想不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之上，重要的是为未来的城市世界找到一条实践道路。同时，当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也构成了本书研究的重大现实背景；对哈维

城市空间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旨在为中国城市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这些因素都决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本研究中必须遵循的重要方法。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有一个历史变化和演进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城市空间思想有其特定的主题和特色，但从哈维整个城市空间思想发展脉络看，又有其贯穿其中的主线。因此，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与其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息息相关，而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恰恰能搞清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来龙去脉，从而更加准确和完整地掌握其城市空间思想。

第一章 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理论渊源

从哈维各个阶段的的城市空间思想来看，他受马克思、列斐伏尔和福柯的影响至深。这三位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影响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嬗变。概括地讲，马克思为哈维城市空间思想提供了激进的批判立场和分析方法；列斐伏尔有关空间与社会的观点为哈维从地理的空间、自然的向社会的空间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福柯有关空间与权力的观点为哈维把握城市空间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关系提供了较好的思路和视角。我们从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政治解读中，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列斐伏尔和福柯思想的印记和痕迹。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之前，有必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这主要涉及三个概念，分别是空间、城市、城市空间。这三个概念构成了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进行分析和解读的分析基础和逻辑前提，只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后，才能够更好地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深入的把握。

一、空间

与时间一样，空间是我们把握物质运动和社会发展的方式；同

时，空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模式中也具有与时间一样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正如英国学者戴维·萨克所言：“对于所有的思想模式来说，空间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思维框架。从物理学到美学、从神话巫术到普通的日常生活，空间连同时间一起共同地把一个基本的构序系统（ordering system）楔入到人类思想的方方面面。”^①

从空间概念的发展历程看，它大致经历了从形而上学的空间到社会空间这样一个演变过程。20世纪之前空间概念主要是形而上学性质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亚里士多德的有限空间概念、牛顿力学的绝对空间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是与点、线、面和立体密切相关的几何学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还把空间理解为一种位置，而且作为真实存在的位置，它是必须附属于实体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空间是事物占有位置的总和，即使最大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空间概念更具有几何学的特征。牛顿的绝对空间概念是迎合其解释世界的机械运动而提出的。在牛顿看来，宇宙中的一切物体都是因为相互的引力而处于绝对的运动之中。但是，这种有规律的运动是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的，是永远保持不变的，因而是以绝对空间作为参照系的。可见，牛顿的绝对空间概念是作为古典力学的基石而提出和存在的。

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空间这个概念更多地与地理学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自古以来，地理学家从人与自然相关联的视角和空间的区分及现象相结合的视角来研究和分析地球表面。^②因此，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就成为了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地理环境思想方面，以至于出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即声称地理环境会影响甚至决定人种的体质、民族的性格、社会的生活甚至国家的国体与政体。但是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深化与发展人们对空间的认识进一步得到了升华，对空间的理解和

① 罗伯特·戴维·萨克：《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② 参见罗伯特·戴维·萨克：《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界定逐步从地理空间或生物空间走向了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人们对空间的认识也逐步完成了从了解空间的物质属性到了解空间的社会属性的巨大转变。

因此，20世纪后空间概念的界定逐渐走向了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多重领域，人们更多的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和视阈来理解空间、界定空间。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观点有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福柯的权力空间概念、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和大卫·哈维的作为社会建构空间的概念。虽然他们对空间概念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空间、探讨空间，把空间视作一个包含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权力、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领域，都反对那种把空间理解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观点。总的来说，他们更愿意把空间看作是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更加侧重于把空间理解为一种涵盖和包容了各种社会关系的空间。

空间概念的不断拓展与升华为哈维的城市空间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哈维正是从空间的多重属性尤其是空间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中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进行了分析、探讨和批判，从而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城市空间思想。哈维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一个独特视角在于，他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的，这主要体现在从资本逻辑视阈和权力逻辑视阈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上，而这种分析路径恰恰是空间认识成果升华和发展的重要体现和反映。

二、城市

什么是城市，对城市应该怎样进行界定？这看似是一个非常基础和简单的问题，可是自从有城市以来，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对此莫衷一是，很难达成共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都立足于各自的学科，给出了城市的不同的定义。经济学家将城市视作是生产力的聚集区域和经济活动集中的地点；政治学家倾向于把城市看作是各

种政治活动上演的舞台；历史学家则把城市看成是建筑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地理学家认为城市是劳动地域分工的结果和大量人口资源的集结地。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视角去理解和看待城市，但是他们都很难说服对方。随着城市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其城市学科相应地不断推进，人们已扭转单一地从某一学科对城市定义的趋势，逐步转向从跨学科、多视野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界定，尤其是把社会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向度融入其中。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在其代表性著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中，将城市定义为“一个规模较大、人口密集的异质个体的永久定居场所”。^①沃斯这一看似简单的关于城市定义中，实则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仔细分析起来，它至少揭示城市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城市是人口集中、人口密度比较高的特殊空间；第二，城市的优势体现在它是工商业、金融机构、交通和通讯线路、新闻、广播电台、图书馆、博物馆、医院、大学等因素的集中；第三，城市最鲜明的特征体现在它的异质性上，城市中阶级结构非常复杂，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是城市人生活的常态，金钱关系取代了以作为社群基础的个人关系。

同样是美国的著名建筑评论家、城市规划思想家刘易斯·芒福德，则对城市有其更深入和更独特的理解。芒福德指出：“城市在其完整意义上便是一个地理网状物，一个经济组织体，一个制度的过程物，一个社会战斗的舞台，以及一个集合统一体的美学象征物。一方面，它是一个为日常民用和经济活动服务的物质结构。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有意为了有着更大意义的行动以及人类文化更崇高目的而服务的戏剧性场景。城市促进艺术，并且本身就是艺术；城市创造剧场，并且本身就是剧场。在城市，作为剧场的城市，经由人性、事件、团体的冲突与合作，人有目的

^① 路易斯·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载孙逊主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页。

性的活动被设计和构想成为更重要的高潮部分。”^①芒福德对城市的认识较之沃思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芒福德不仅仅关注到了城市的经济属性，更深入到了城市的社会属性及其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他认为城市最为重要的功能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要有精神、文化和人性的需求与追求，城市应该是人性得以发挥和人性光辉得以闪耀的舞台，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遵循人的尺度和原则而不应该受物的尺度和原则的影响和羁绊。

早在四百多年前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就对城市作了如下认识和评价：“何谓城市，及城市的伟大被认为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②乔万尼对城市定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主要是从权力逻辑视阈来认识和看待城市的，他更愿意把城市看作是促进公平正义和实现人类自由幸福的特殊区域。

哈维十分鲜明地反对把城市进行局限于某一学科的唯一解读和界定，他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和解读也是承接跨学科、多视野的角度。他是从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辩证统一的角度来把握认识和理解城市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城市是与资本主义紧密联系的资本主义建构形式和物质扩张形态；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必须服从于增长、效率和利润的准则；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资本流通与积累，劳动力、商品与货币流动的特殊区域；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一种特殊空间构型的人工环境“第二自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还是一个汇集了众多矛盾和冲突的特殊地域。从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把握和理解可以看出，哈维继承和发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507页。

^② 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展了路易斯·沃斯和刘易斯·芒福德的关于城市本质的思想；而尤为独特的是，哈维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三、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的概念与空间和城市的概念紧密相关。与这两个概念一样，城市空间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在早期，人们习惯把城市空间理解为由房屋、道路、管道、公共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构成的物质实体和自然实体，也就是物理意义上的城市空间或自然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在现阶段，随着人们对城市和空间概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人们对城市空间的内涵也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具体表现为把社会关系和政治意义也融入到城市空间概念的理解中。因此，城市空间既包括由像房屋、公共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构成的物质空间，还包括由国家、地方政府、监狱、法院、警察和各种管理部门构成的社会空间。换言之，城市空间是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结合体。在哈维看来，城市空间无非是由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构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哈维也是从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空间的。

哈维所认识和理解的城市空间，也是基于城市空间现代意义上来理解的，这与马克思把社会视作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体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哈维看来，城市空间本身既是一个自然实体，也是一个社会实体。从自然实体看，城市空间包含由住房、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组成的自然空间；从社会实体看，城市空间还包括影响和制约城市空间发展变化的一系列社会因素，比如制度、法律、道德关系、伦理法则等等。更难得可贵的是，哈维还看到了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内在辩证关系。因此，按照哈维的理解，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的构成要素的视角来对城市空间进行理解和把握是知晓城市本质的一个重要路径。

第二节 马克思：立场与方法

一、坚持激进的批判立场

虽然哈维的学科特长和学术立足点是地理学，但是他却有广泛的多学科背景，并且在许多学科领域诸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中都有一定的造诣。之所以要涉猎这些宽广领域的学科，主要是由其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所决定的。从表象上看，城市空间是以一定的物质外貌呈现的物理空间，而深入了解则会发现城市空间还蕴含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认识和研究对象，多学科的切入是理解城市空间复杂有机体的重要方法。而且哈维的目标是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进行分析和评判，作为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统一的复杂有机体的城市空间，又必然地与这些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从不同的学科对城市空间进行解读和分析会获得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从多学科交融的角度分析城市空间更能够把握城市空间的复杂本质。

1969年初，以研究地理学方法论为重点、被称为“地理学圣经”的《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出版，奠定了哈维在地理学界的显赫地位。然而，让许多人颇感意外的是，1973年哈维出版了《社会正义和城市》，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逆转——从实证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以后的研究中，还依稀可看见实证主义的影子，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哈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背景和方法论资源融进了他的地理学研究之中，并力图从时空辩证统一的角度来分析和解读城市空间，他由此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哈维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首先，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在现有的全部理论体系中最具有说服力，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能解释现实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把

改变现实作为自己的理论使命；其次，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目标非常有意义，因为马克思政治目标的定位是激进的、进步的，其目的不仅是提高没有特权地位者的生活条件，而且还在于探索人类解放的普遍前景。这样，在面对诸如空间、城市化和正义等复杂棘手而用传统的地理学又不能解决的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强大分析能力则满足了哈维的迫切需求，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为地理、环境和空间问题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基础。因此，面对近三十年来有关诸如“后现代主义”、“后工业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以“后”为特征的流行话语时，哈维主张必须到马克思那里寻找理论资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所谓的流行话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对此，他敏锐地指出：“切断我们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就是切掉我们敏锐的嗅觉以满足现代学术流行的肤浅外表。”^①

哈维进一步借用库恩(Kuhn)的范式理论阐明了在地理学思想领域引进马克思理论范式的目的——用马克思的理论范式去应对传统地理学中的危机，去解决传统地理学中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哈维认为，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地理学重在数量分析，这样虽然能够把地理学研究建立在一定的科学基础之上，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这种方法日益显出其局限性。尤其是在面对广泛存在、影响人类至深的生态问题、城市问题、国际贸易问题时，传统地理学不能提供深度的解释和说明。因此，“放弃旧的理论范式，进行新的地理学革命，建立反映现实的地理学理论”成为了哈维进行地理学革命的目标，为此他呼吁：“我们地理学的范式不能很好地应对实践中的一切问题。是到了推翻旧的地理学范式的时候了，客观的社会条件要求我们再也不能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了。正是出现的客观社会条件和我们不具备应对实践中发生的一切的能力，我们才有必要对地理学思维进行一场革命。”^②

①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②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29.

在哈维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完全能够胜任这个任务，因为，“马克思理论明显的特点在于，它是站在那些没有掌握生产方式的人，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之点。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概念、关系和方法就具有了形成新的范式的潜力，而这些又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结构的一个巨大威胁”。^①按照哈维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虽然具有一定的共同点，比如都具有唯物主义的基础，都诉诸分析的方法；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实质性的区别，即：实证主义仅仅寻求理解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则寻求改变世界，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范畴是通过辩证的方法获得建构和确立的，而实证主义的方法更有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特征。当然，马克思主义并非是哈维研究地理学的唯一理论基础，他所主张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各种理论的奇特混合，他认为研究地理学时最佳的策略是将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现象学等各自的长处结合起来。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哈维对马克思的厚爱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衷。

人口资源问题是地理学尤其是经济地理学研讨的核心问题，其中人口资源科学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问题也是地理学界一个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哈维极力反对那种在人口资源问题上秉持价值中立的学说。在他看来，“科学研究方法的各项原则（不论是什么），是规范性而非事实性的陈述，因此，这些原则不能以科学本身的方法来验证和赋予正当性，而必须诉诸科学以外的其他方式。这里所谓的‘其他方式’，其所属领域不外乎形而上学、宗教、道德、伦理、传统惯例或人类实践等”。^②他以马尔萨斯、李嘉图和马克思关于人口资源的观点，说明他们的观点和学说都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马尔萨斯的代表作《人口论》虽然声称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但其中无不充斥着对社会被统治阶级和底层民众悲惨命运的默认和赞许，以及对统治阶级和社会上层统治地位的极力论证和维护。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126-127.

^②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马尔萨斯缓解人口压力的重要措施是对人口的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而其代价无疑就是让下层阶级默默承受这样的苦难。与“人口论”形成呼应的是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论”，马尔萨斯认为对生产和人口的实际控制主要是来自需求不足而非生产不足，有效应对的办法就是依赖非生产阶级之消费力量的适当运作。在哈维看来，这也是赤裸裸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完完全全暴露了马尔萨斯捍卫私有财产的嘴脸。与马尔萨斯经验论的方法基础不同，李嘉图尝试建立一种透过市场机制进行经济分配的抽象模型，其核心概念是“经济人”，他指望通过理性经济人的善行而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图景。哈维认为这无异于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学说，因为经济人是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为了逐利的最大化，往往以牺牲他人利益为手段达到自己获利的目的，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美好，反而会导致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哈维认为，李嘉图的学说是彻头彻尾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一种工具。

哈维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评判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无疑是具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难能可贵的。他在《资本的空间》的“序言”中谈到了当时他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氛围，也叙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写道：“任何向往改变我们思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的人，都不是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下这么做。每个人都必须利用手边的知识素材；每个人也必须得尝试与每个时代限制人们思想的预设、成见和政治偏向搏斗，它们限制思想的方式，最好状况下可谓是压制性的宽容，最糟糕则是纯然的压迫。”^① 这里的“压制性”主要是指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学说的诋毁和打压，再加上苏联又出现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因此，哈维认为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塑造新的理解和整治行动模式的严肃材料，成为极度困难的事情”。^②

①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序言”第 5 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序言”第 5 页。

哈维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地理学研究的基础旨在创立一种批判的地理学，对此他深有感触：“学习马克思的方法，也开启了通往各种其他知识工作和政治评论的大道，涉及像是地理知识的争议性质、环境议题、地方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地理知识和社会与政治理论的一般关系等多样的课题；浮现出一个探讨场域，致力于掌握政治权力如何利用（无论如何界定的）地理知识。同时，这也指出了有界定出一门批判地理学（以及批判的都市理论）的迫切需要，以便‘解构’（采用当前的术语）某种看似‘中立’或‘自然’、甚至是‘显而易见’的知识，实际上如何成为维持政治权力的工具性手段。”^①概言之，哈维创立批判地理学的目的就是要把地理学理论的研究与实际活动相结合，不再把地理学当作与世隔绝、与当下社会现实毫无关联的纯粹理论学科。

“地理学者对公共政治形成能否提供成功、重大且有效的贡献”是哈维一直思考的问题。至于为什么会一直思量这个问题，哈维给出了他的解释：“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我们的动机，会发现这种急迫感源于个人抱负、学科帝国主义、社会需求和道德义务形成的奇特混合。”^②

首先，就个人抱负而言，哈维表明了要在林立的学科体系中争得地理学科的一席之地。因为所有学者包括地理学研究者都身处于一个富有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中，而社会权力大都集中在公共领域中，作为较弱勢的地理学科必须努力与其他学科争取公众眼中的地位和特权。如何达及此项目标，哈维认为将传统的依附于顺从于国家体制的地理学转变为一种激进的地理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路径。

其次，就社会需求来说，哈维反对那种盲目跟随和屈从于社会现实的地理学，而创建一种激进批判地理学。地理学科演变的历史就是一部由社会需求推动变化和发展的历史。哈维以英国的地理学科发展为例来说明论证他的观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标志，英国地理学界发生了哈维所称的

^①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第9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认识论决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地理学多半牵涉非学术性的活动，以遵循“帝国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为导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大学为基础，强调特殊训练的专业地理学已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在哈维看来主要在于这种趋势迎合了“统合型国家”这种社会政治组织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一种组织相对严密、阶层结构分明的体制，其间各机构如政治、行政、法律、财经、军事等环节环环相扣，由上往下传达资讯，并‘指示’位于下层个人和团体，告诉他们哪些才是维系整体社会存活的适当行为。这种操作的口号是‘国家利益’。统合型国家支配的伦理是‘合理性’和‘效率’……先进资本主义统合型国家内部的新兴统治阶级，几乎全来自工业及金融利益阶级。在许多采取统合型国家形式的共产国家中，统治精英则多来自政党”。^①统合型国家采用一系列操纵控制和收编的策略技术以确保经济的增长、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和提升国家在整个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为此就必须控制经济危机和压制潜在的各种不满和社会动荡。哈维看到，面对这样一种受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支配的国家和社会现实，地理学最终被收编和支配了。一方面，地理学的毕业生被当成商品在市场上行销，从事地理学的学术研究者把学术出卖给某个有特定需求的客户；另一方面，“地理学者性喜四处探索的毛病也得加以控制，专业必须设法压抑内部异议；学科内形成了一个统合架构——地理学科内部的迷你统合型国家，忠实复制了国家的统合结构。我们在学科内配置了权力经纪人、自封的品味仲裁者，最后甚至建立了协会本身松散的霸权力量”，于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成为好市民，在所谓‘国家优先顺序’和‘国家利益’之前卑躬屈膝，贱卖自己的学术训练”。^②正是在地理学科和地理学人才处在如此尴尬境遇下的反思和反叛，哈维才致力于创造一种激进的批判地理学。

就道德义务来讲，哈维主张应反思地理学家那种对所从事的工作心

①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安理得而又缺乏批判性立场的传统地理学实践，认为地理学家应该切实回答“哪一种地理学用于哪一种公共政策”的问题，因为“批判性的学术揭露了事实和价值分离的虚假造作，并指出视科学形态中立的主张，本身就是一项意识形态的陈述”。^①有鉴于此，哈维提出了地理学应“根据周围现实创造新的实践”而改变世界的主张。在他看来，地理学家应尝试从内部颠覆统合型国家的精神，而大学就提供了相当强的抵抗基础，因为大学崇尚的是一种“后顾式”（backward-looking）传统，这恰恰与统合型国家权力手段的“前瞻式”（forward-looking）传统相对立。因此，“地理学也承担了一些微小但意义重大的任务。首先，必须将种族主义、族群中心主义和傲慢的家长制——帝国时代的余绪——从我们的教科书中完全删除。我们亦必须建立真正的人文主义文献，来瓦解人为（且几近精神分裂）的事实和价值、主观和客观、人和自然、科学和人类旨趣等二元对立。地理学家的道德义务便在于直接面对人文主义传统及统合型国家普遍需求之间的紧张状态，提高我们对此矛盾的认知，并藉此学习如何在统合型国家结构的内部善用这种矛盾”。^②不难看出，哈维所理解的地理学家的道德义务就是要从统合型国家的束缚和压制下解放出来，把人文主义传统融入地理学的研究之中，从而发挥批判现实的精神，进而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

哈维正是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不满的基础上，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哈维指出，要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和马克思挑战者之间的对话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大的难点在于二者之间缺乏一种共同认可的基本词汇。在二者交锋时马克思主义挑战者无疑占据下风，因为大多数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也几乎毫不在意和缺乏了解，他们“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受到经验分析传统的‘训练’，不容许任何一丝的辩证思维或关系性意义”、“愈是受过精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就愈难以理解马克思式的再现是怎么回事”。^③与

①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③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难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挑战者却不会出现这种难题，因为“对马克思传统中的研究者而言，了解资产阶级的范畴有其必要。资产阶级思想的基底（以其自身角度来理解）可以提供重要且具可塑性的材料，接受马克思那套让人惊叹的批判工具塑造后，可以展现经过改造且更令人信服的世界观”。^①

具体到都市社会学而言，哈维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知识的过度偏狭和片面，难以从整体上深入了解分析这门学科，而采用马克思主义却能完全胜任这个任务。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对都市社会学研究的难点还在于他们所秉持的研究理念有极大的问题，因为他们信奉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是和谐”的理论。在哈维看来，马克思主义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因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是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矛盾最为深刻和最为直接的体现，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也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维度。所以，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始终贯穿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发展和解体的全过程，无疑这一矛盾也自始至终贯穿于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中。

二、采用《资本论》的概念框架

哈维具体阅读了马克思的哪些著作，又有哪些著作对其产生了多大影响，这实在无法考证。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资本论》对哈维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城市空间思想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哈维在大学里长期讲授《资本论》课程，他对《资本论》进行了持续三十多年的研究，这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资本的界限》中。哈维之所以要对《资本论》进行长期不懈的研究，主要是因为在完成《社会正义和城市》后，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而在研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候又面临着“固定资本”、“金融资本”这一系列与城市空间密切相关的概念和问题。因此，他打算不需借助外力而是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内部去分析问题，而

^①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资本论》无疑就成了最好的管道。这部著作力图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空间生产和空间构型作为一个积极因素整合进马克思理论框架的核心。因此，《资本的界限》这部著作在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研究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特殊的作用，它构成了哈维后来城市空间思想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

但是只要仔细分析《资本的界限》这部奠定哈维城市空间思想基础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该书打上了非常鲜明的《资本论》的烙印，因为该书中的主要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式基本上沿袭了《资本论》的概念框架。在《资本的界限》中，哈维基本上沿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概念和范畴。商品、价值、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资本的构成、资本积累、租金和阶级关系既是《资本的界限》的主要概念和范畴，也是《资本论》的主要概念和范畴。由此可以看出，哈维是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主要概念和范畴来构筑它的城市空间思想的奠基之作——《资本的界限》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由一系列范畴和概念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之作，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当属“价值”。从《资本论》的内容可以看出，价值这个概念贯穿于整个《资本论》著作的始终，从实质上讲，《资本论》中大多数内容都是对价值概念的具体化，也就是具体分析价值的具体表现形态。在《资本论》中主要出现了三种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第一种是劳动价值的纯粹形态，其价值量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内容主要表现为商品的二重性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第二种形态是劳动价值的货币形态，其价值量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共同构成，其主要内容表现为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第三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其实质就是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平均利润。所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石上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等，构建起了《资本论》的理论大厦，展现了《资本论》的理论整体”。^①《资本论》也表现为以商品为逻辑起点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的整

^① 张雷声：《〈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体，这主要体现为“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单个资本循环转化为单个资本周转、单个资本转化为社会总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转化为成本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商业利润、银行利息、地租。经济范畴不断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①这样一个概念和范畴体系。

在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中，商品也是哈维分析和解读城市空间的逻辑起点和重要入口。正是把土地、住房、城市设施等空间产品视为商品，由此分析了这些空间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以及统治阶级进行空间生产的目的在于占有剩余价值。同时，从价值的转化形式——地租入手分析作为级差地租、垄断地租和绝对地租结合体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哈维从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角度，着重分析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塑造的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在马克思资本循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

马克思研究资本的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一基本思想也被哈维继承在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解读之中。哈维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所蕴含的矛盾，包括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产阶级自身中的矛盾、城市空间中的不平衡发展以及替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走向未来新的城市空间等内容。由此不难看出，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是采用了《资本论》的概念框架。

哈维还借用《资本论》中的危机理论思想来阐发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危机理论。在《资本的界限》中，哈维以空间为核心和切入点，对资本主义延缓危机的方法提出了“结构修复、空间修复和时间修复”的三部曲。哈维对马克思的社会危机理论情有独钟，将此理论视作分析研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重要思想资源。正是凭借马克思的社会危机理论，哈维找

^① 张雷声：《〈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到了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尤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危机是如何形成、发展、解决的，以及怎样陷入更深的危机中不能自拔的重要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三、运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

哈维长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进行地理学研究，解决传统地理学中许多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哈维在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坚持“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作为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基本出发点；坚持从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来分析认识和探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坚持“阶级关系是阶级社会中最为重要和复杂的社会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是引起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之一”的观点，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和看待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坚定认为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模式一定会退出历史舞台，走向历史的终结，会被新的社会替代方案所代替，努力去追求一种辩证乌托邦理想。所有这些方面都清楚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是哈维在分析探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哈维是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把握马克思的本体论的。他探讨了马克思本体论的建构机制，认为这个机制是通过整体与部分、整体与要素的转换而实现的。而“转换是通过这些矛盾的解决得以发生的，与每一次转换相伴随的是整体的再塑，而整体的每一次再塑反过来又会改变要素的定义、含义、功能以及作为整体内部的关系”。^①在此基础上，哈维进一步推导出马克思本体论研究的任务：就是发现社会结构转换的规律。哈维坚持认为是否具有“总体性”是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最重要的区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89.

别，哈维还就如何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了说明，指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解释任何现象而加以粘贴的随意标签，而是辨别分析社会结构转换的一种方法。”^①

哈维还用结构功能主义来分析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他认为，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和他的本体论的基本内容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必须看作是结构内部和结构间矛盾的结果”。^②哈维认为这些结论看似抽象难懂，但是只要结合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就比较易懂了。他强调，城市化是来源于社会经济基础的一种结构，同时城市化又是与其他的结构具有内在关系的一个独立结构。因此，哈维赞同马克关于探究城市起源的观点，认为“要研究城市起源问题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探寻在城市社会前期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矛盾，并表明这些矛盾在转化成城市的社会组织形式之后是如何得到解决的”。^③哈维坚持主张，结构功能主义是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他指出：“对任何试图创立一个像有关城市化这种带有跨学科特点的理论人来说，他必须回到马克思所实践的、奥尔曼和皮亚杰所描述的功能结构主义上来。换句话说，虽然这个结论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受欢迎的，但是要把握像城市化、经济发展和环境这样的跨学科问题时，唯一能够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是在马克思所构想的整体结构中运作的方法。”^④

结构功能主义作为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主要流派，它把社会视为一个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手段的系统，认为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以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90.

②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93.

③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93.

④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302.

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着，各个部分对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而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的。哈维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显然是结构功能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反映，具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和目的论色彩。但是，毕竟哈维还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唯物主义这个根本，更为重要的是哈维还将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贯穿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和解读中。

哈维分析城市空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还体现在他对概念的正确把握上。他认为，作为认识成果的概念或者观念是由生产中的物质力量决定的，概念是客观外部物质力量在主体中的一种反映，概念会随着客观条件和实践的不断变化而变化。概念为我们解释社会历史和思维历史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哈维坦率承认，自己的创作尤其是《社会正义和城市》的创作深受马克思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影响。他还结合了该书中的具体章节进行了相关的论述。哈维坚持认为，马克思方法论的最大特点在于他的实践观，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理论是人类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而困扰西方思想的诸多二元论问题，比如人和自然、事实和价值、主观和客观、自由和必然、身心、思想和行动等问题，都可以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得到解决。哈维将实践的观点看作是马克思著作中最值得珍视的工具，在他看来许多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由此可见，哈维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和“实践性”，这是非常具有见地的。可以说这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和核心。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之所以充满活力，并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持久、深刻的震撼力，就在于构筑它灵魂的基本精神，即有特定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凝聚而成的基本精神”。^①从某种意义上讲，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是一种

① 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才能正确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践性；同样，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实践性的基本前提下，才能全面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

哈维自己也曾一再申明，他是用辩证的方法来探讨城市空间问题。按照哈维的理解，地理学知识主要关涉制图学的辨识、时空的测量、地方区域或领域、环境品质与自然的关系等四个“结构支柱”问题。对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哈维力主采用一种类比推理的方式。在他看来，这种研究模式能够“寻求连结和相互关系，在表面上分离的现象里推展隐喻和潜在的统一性，寻找类似之处，藉由检视某个领域的现象来阐述另一个领域里的现象。最重要的是，他在不同思考模式（经常出自相当不同的制度）之间谋求转译。它具有全然的开放性，避免了由本质论和纯粹主义范围支配的世界里，典型的那种地盘战争和排斥”。^①可见，哈维所力推的类比式的推理方式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有许多共同和相通之处，就方法论实质而言类比式的推理方式也就是辩证法思维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他认为辩证法对于分析研究城市空间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对辩证法的理解能够加深我们对社会生态过程的认识；另一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探寻之中融入辩证法的理解，这样就能够把空间、地点、环境等主题综合进社会和文学理论之中。而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②哈维声称，“关系”和“总体”是辩证法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特征和实质，是理解辩证法的重要入口。

在面对形形色色不相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辩证法资源的各种观点时，哈维主张应从马克思的实践和近年来对辩证法的反思中提取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理解辩证法的关键要素和重要方面：哈维将

①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6—337页。

② 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Blackwell Publishing, p.46.

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以下十一个方面：第一，辩证思维强调过程、流动、变动和对要素、结构和组织系统的分析；第二，要素通过流动、过程和边界领域的关系运作等途径来构成事物的结构系统或整体；第三，要素或系统包含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是在构成它们的多样化过程中产生的；第四，事物的每一个层次和领域都包含有矛盾；第五，空间和时间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外在于过程之外，但是空间和时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进程中，有着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第六，整体和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第七，整体和部分的内在关系导致事物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和结果的内在变化；第八，事物的转换或创造源于事物或系统中的内在矛盾；第九，变化是所有系统和系统中所有方面的特点，这是所有辩证法原则的一个最重要方面；第十，辩证认识本身就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对概念、抽象、理论和知识的系统结构永不止步的探索过程；第十一，对未来“可能世界”的探寻离不开辩证法和辩证思维。^①

从哈维对辩证法基本原则的概括中可以看出，他正确地把握了辩证法的实质、精髓和要害，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他把联系、发展、变化看作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从事物的内在矛盾中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因此，他把握住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精髓——矛盾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辩证法的功能在于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是“解释世界”，正如他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要将辩证法和辩证思维注入社会科学尤其是地理学的认识、理解和研究中，具体到地理学领域，就是辩证地理解空间、地点和环境的关系。只有这样，地理学才能更好地进一步科学的发展。与此同时，辩证法的另一重要功能还在于“改变世界”。在哈维看来，在寻求社会替代方案中，尤其是在探寻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过程中和展望未来的城市规划和远

^① 参见 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Blackwell Publishing, pp.48-57.

景中，更是离不开辩证法和辩证思维方式。为此，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也视作一个内在的辩证的发展过程，把辩证法作为一个认识、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工具，这在他的辩证乌托邦的社会蓝图中可以得到清晰生动的体现。

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和评价方面，哈维与卢卡奇的观点一致，认为马克思主要把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哈维显然更倾向于马克思的观点，并以《资本论》为例，对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分析、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评述。哈维认为马克思在运用辩证法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最富洞见的思想在于：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受资本流通所制约的社会系统。在他看来，《资本论》语言特色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它充满了对“过程”和“系统”的描述和分析，因为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资本不仅仅被当作“物”，更为重要的是把资本当作一个“过程”、一种“关系”。具体地讲，资本包含着产生、增殖、保值、贬值甚至毁灭的过程，资本背后隐藏的是劳资双方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而马克思所讲的“资本的创造性”，不是指资本一般的权力，是指资本所具有的流通功能和整体特性。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变动和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也是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普遍强权法则的重要体现。

第三节 列斐伏尔：空间与社会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年），法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列斐伏尔最大特点在于他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长期性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公开性。他在有关城市空间思想方面的独特贡献在于：从空间与社会的视角，探讨了空间的社会性、空间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空间与政治的关系、资本主义空间与矛盾及其克服资本主义空间矛盾的途径等一系列有关空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都市》（1972年）、《空

间的生产》(1973年)、《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年)等著作中。

列斐伏尔有关空间与社会的思想对哈维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和解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列斐伏尔思想的影响下,哈维才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才揭示了隐藏在城市空间后面的资本对城市空间的塑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社会关系,也才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了资本在塑造城市空间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正义和城市》的创作中,哈维承认他接触到了列斐伏尔的主要都市著作并对他以后的城市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也曾坦率地承认在对城市现象的研究中,除了通过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他获得了对城市的深刻洞见外,列斐伏尔的著作是对他的城市研究影响最为深刻的著作,其中《空间的生产》、《城市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思想》都是哈维重点参照的书目。哈维尤其赞赏列斐伏尔著作中所蕴含的激进主义和批判式乌托邦思想,这些在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激进批判立场和对未来城市空间的展望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一、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

以1968年发生于巴黎郊区的学生运动即“五月风暴”为界,列斐伏尔研究的重点有所变化。在这之前,列斐伏尔主要关注的是日常生活问题;在这之后,他集中精力研究都市化与空间生产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两者割裂开来看待,而是应当把日常生活与都市化和空间的生产这个主题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正是“五月风暴”使列斐伏尔开始逐渐认识到日常生活中的都市对于革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他开始思考政治斗争与都市空间的关系。他开始认识到,都市既是工作生活聚集场所,同时也是未来革命发生的关键所在地。总之,自“五月风暴”后,列斐伏尔更多地关注城市这个独特的空间,并将其与日常生活革命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因此,空间生产就成了列斐伏尔理论关注的焦点。

列斐伏尔敏锐地意识到了空间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大有

取代时间后来居上的趋势，并适时地提出了“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著名论断。他非常强调空间生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都是空话。”^①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生产”是生产力自身发展以及有关空间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直接介入的产物，它是以能量之流、原料之流、劳动力之流和咨询之流等为特征的流动经济。空间与生产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它具有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特点，空间直接性地介入到其生产与自我生产之中。因此，空间成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此，列斐伏尔才发出如此感叹：“空间已经达到如此显著的位置，它是某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现实，即在某种被生产出的社会空间之中的现实，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难道说不是这样吗？”^②所以，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原来的空间中的生产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

列斐伏尔所理解的空间社会性包含着四条基本原则：第一，物质空间正在消失；第二，任何一个社会，都会生产出包含着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的社会空间；第三，对空间认识的理论是对生产过程的复制和再现；第四，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中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产生。^③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社会性理解是从对传统认识论的空间观的批判开始的。在他看来，传统的空间观是以数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为特征的空间观，这种空间观往往把空间视为一个抽象物和没有内容的空盒子，空间只是表示物质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传统的空间观是把空间形式和物质内容联系起来理解的，是从空间的物理属性和自然属性的角度来解读空间和理解空间的。这种空间观明显地忽略了空间的社会属性。所以，列斐伏尔

①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②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新版序言（1986）》，载张一兵编：《社会批判理论论事》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③ 参见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p.30-46.

一再声称：虽然空间本身是事先给定的，但是空间却是社会变化、社会经验和社会实践的产物。

为了进一步对空间的社会性进行分析，列斐伏尔还把迄今为止的空间生产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绝对空间，即本质上处于自然状态的空间，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的空间；第二阶段是神圣的空间，这主要是指暴君统治的国家时期的社会空间；第三阶段是历史性空间，这主要是指以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为代表的政治国家的社会空间；第四阶段是抽象空间，这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空间，具有与积累的空间紧密相连、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相互割裂和工具性等特征；第五是矛盾性空间，这主要是指由新旧两个时代之间的分裂所导致的矛盾的社会空间；第六阶段是差异性空间，主要是指同一社会空间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和不同点，主要表现不同空间的连接和组合。^①从列斐伏尔对各个历史时期空间生产的划分可以看出，空间生产日益从自然性、抽象性走向矛盾性、差异性，也就是说空间生产的社会性特征日益凸显和与日俱增，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社会性集中表现为资本逻辑的决定性和支配性作用。

列斐伏尔之所以强调空间是社会性的，一方面是因为空间涉及诸如性别、年龄与家庭组织等社会关系这样的再生产；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空间涉及生产关系。在他看来，“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②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各个时期的生产方式必定会生产出一个新的社会关系及其空间，从而使生产得以继续。而且，各种社会关系与各种空间关系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主要表现为各种生产关系既形成了空间，与此同时，其发展又受制于空间。由此可见，“社会空间既是行为的场所，同时也是行为的基础”。^③

^① 参见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p.48-52.

^②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 页。

^③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191.

列斐伏尔论证空间的社会性的一个主要论点在于，他指出当代政治经济学业已走向了一种空间政治经济学。与以往的时代相比较，当今社会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如像食物这样曾经稀少的东西变得丰富了，而像空间这种曾经丰富的东西如今却变得稀少了。整个空间都成为人类了解、认识、规划和实践的对象，人们不断地占据空间、规划空间、生产空间。而且，为了让空间充分地发挥其价值，空间被人为地稀有化、片段化和碎片化了。空间政治经济学最鲜明体现的地域就是现代城市空间，因为在现代城市空间中存在着名副其实的空间生产、空间交换、空间消费和空间分配。在城市空间中，诸如房屋、道路、公共设施、公园、绿地等空间产品都涉及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诸多方面。这尤其体现为建筑业和娱乐业地位的上升：曾经，建筑业是作为第二产业和从属部门而存在的，如今它俨然成为了首要的经济部门；娱乐业也已经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产业，海滩、大海、太阳和冰雪都成为了人们消费的空间。

列斐伏尔声称，空间的社会性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空间已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策略和工具；空间始终服务和服从于某种战略，空间体现出了功能性和工具性的特征。于是，空间不再是客观性和中立性的了，它要服从于某种战略性、政治性的需要而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性。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的关系是剥削和统治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得到维持的。也即是说，在当今，统治阶级把空间已经当作一种控制工人阶级、运用权力和管理整个社会的工具来使用。所以，出现了围绕着空间的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其中占主导地位 and 绝对优势的是个体的、资本的 and 私有的一方，而他们所寻求的目标是靠投资带来最大利润。正如列斐伏尔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当抽象空间开始存在时，统治阶级抓住了对它的控制，然后他们把空间作为权力的工具来运用，达到产生利润的目的”。^① 所以，资本主义的空间是一个支配性的、征服性的、压迫性和集权性的空间，它集中地体现为一种权力工具，统治

^①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314.

阶级正是凭此才取得了对空间的掌控权。

二、资本主义空间充斥着矛盾

按照列斐伏尔的理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也就是农合社会时期，城市在社会生产中不具有中心地位，城市所扮演的是与生产方式相对的上层建筑的角色。这个时候城市的主要功能上政治功能，同时还具有贸易功能。当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以后，随着科学的胜利和技术革命的出现，城市空间得以全新的塑造，城市也日益成为发明、生产、娱乐的新型领域。于是城市发生了巨大转型，既从以前的商业城市转向了工业城市。此时城市的规模、形式和功能的塑造都主要得益于工业化这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如果进一步追问工业化因素背后的影响，那就不得不提及资本的逻辑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以后，都市化的城市又取代工业化的城市，这时的城市不是工业化生产都市化，恰恰相反，是都市化生产工业化。

无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经历什么样的转型与发展，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终身蕴含着各种矛盾的空间。其具体表现就是，一方面，资本主义空间是作为抽象空间而存在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空间又是矛盾的统一体。之所以说资本主义的空间是抽象的，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空间是与资本积累的策略紧密相连的、具有工具性特征的空间；又之所以说资本主义空间是矛盾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空间处于新旧两个空间时代的转换之中，旧的空间类型必然要被新的空间生产类型所取代。

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这个抽象空间始终是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受资本的支配，因而它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空间。列斐伏尔还声称，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空间的爆炸”的时代，这不仅体现在即时的、生活的层次上——生活空间、个人空间、学术空间、监狱空间、军队空间等空间的爆炸；而且还体现在城市、

区域和国际的层次上。面对“空间爆炸”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显得无所适从，它们难以应对这个它们生产出来的充满混乱和矛盾的空间。

那么资本主义如何克服这些矛盾和危机呢？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是其重要手段。列斐伏尔分析考察资本主义克服矛盾和危机的最大亮点在于，他不是从生产过剩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危机，而是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危机。在他看来，科学技术虽然使现代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的生产力发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矛盾和危机。作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统一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必须要再生产出它自身，否则就难以存在和发展。而且，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企业周围环境的组织化等方面都依赖于空间的发展。因此，列斐伏尔坚持主张，资本主义能够克服矛盾和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

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的“中心—边缘”的问题和矛盾。在这种策略中，以大都市为代表的中心地区主宰边缘地区。大都市地区之所以具有主宰性的地位，其原因不仅在于大都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循环、资本积累积聚的特殊空间，而且在于大都市空间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地域。大都市作为一种构成性中心，它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集结地，聚集了财富、信息、知识、文化及其权力，而这些聚集的因素的实际占有量城市空间中的不同成员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再加上广大的郊区和农村处于被边缘化的“二元”对立状态。于是，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就出现了“中心”和“边缘”的对立和矛盾，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大都市中出现了空间殖民这种新殖民地。居于中心地位和统治地位的是金融家、地主、房东、房地产开发商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联盟，而居于边缘地带和被统治和剥削地位的是大量的农村人、工人、无家可归者等被统治阶级。这样，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就处于一种对立和隔离的状态中。

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还表现在资本主义空间的全球化与破碎化之间

的矛盾这方面。资本主义空间全球化的原因在于，资本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动力下具有扩张的本能和冲动，它冲破了地域、国家、民族、宗教和语言的界限，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全球化特征。与资本主义空间的全球化特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体现出来的断裂和破碎化特点。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占主导地位的空间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这种空间生产方式把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逻辑强加到这些国家和地区，把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一股脑儿地纳入到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中来。这势必会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空间生产带来破坏和断裂，这也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脱离了本身所固有的空间生产方式和空间生产逻辑，大多数都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不相符合的空间生产之路。

三、迈向社会主义的空间

马克思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其结果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要被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取代。列斐伏尔也十分认同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只不过他是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揭示和看待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如同哈维一样，列斐伏尔也有着较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针对“马克思主义已经落伍了，比较不能切合历史了”的流行论点，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大加肯定，指出：“正是在目前更甚以往，我们除非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的光照下，将其修正以应用到特殊情境，否则无法分析世界的种种现象。”^①正是对马克思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秉承和坚持，列斐伏尔坚信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所代替。

列斐伏尔从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差异性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空间特点进行了分析。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和生产关系阻

^①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碍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因此，必须有一种新的空间生产形式取而代之。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特征，“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了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①这也由此决定了与资本主义同质性和重复性的空间不同，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

列斐伏尔指出，在社会主义空间取代资本主义空间这场革命中，必须依靠工人和农民，因为“唯有工人和农民运动汇合与联结起来，扣连到事物的生产与特质性工作，以及使用空间的人，才能使世界改变”。^②然而，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基层的自发性爆炸还不足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一个适当的空间，只有经过民主的普遍性的自我管理，社会主义的空间才能成为现实。按照列斐伏尔的理解，要实现社会主义空间的普遍性的自我管理就必须改变空间生产的方式，变以“自上而下”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生产空间为“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否则，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将沦落为一种抽象的乌托邦。

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所讲的满足社会需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理所当然地包括像住宅、家庭设备、运输以及都市空间改造等关系到空间的社会需要。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人都拥有接近一个空间的权利，人人都享有作为社会生活和文明中心的都市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了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③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不再是资本主义式同质化的抽象空间及其无法

①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②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③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消除与克服的矛盾的空间，而是异质性并存的、“和而不同”的“差异性空间”。

与列斐伏尔一样，哈维也十分肯定空间生产对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正是把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作为商品来生产和经营，这才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延续和发展至今。关于此点，哈维评价道“虽然列斐伏尔也许有点夸张，但我认为还是值得回顾一下他的某个评论，即资本主义通过唯一的方式——‘通过占据空间，通过生产空间’——而在20世纪得以幸存”。^①同时，空间策略也成为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一项重要策略，在评论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所包含的重要地理空间思想时，哈维指出：“如果像我建议的那样，把它《共产党宣言》理解为对空间组织在阶级斗争中的非中立性的令人信服的陈述，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即面对明显威胁其存在的阶级力量的兴起时，资产阶级也可以发展它自己的空间策略：分散、分而治之、在地理上瓦解它们。”^②跟列斐伏尔的观点一致，哈维也声称空间的控制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日常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我们应当把对于空间的控制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的和普遍的社会力量资源的观念，归功于亨利·列斐伏尔不断坚持的声音。”^③

哈维认为，在改造社会的任何规划中，空间策略都面临着一个核心的困境，那就是空间的同质化，也就是空间被当作一种私有财产的商品来任意地买卖。哈维坦率承认这个思想是来源于列斐伏尔的，他指出，列斐伏尔在1974年的《空间的生产》这部著作中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能够达到把空间同质化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在整体上的‘粉碎’和分裂成可以自由转让的私有财产的各个部分、可以在市场上任意地买卖”。^④在列

①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②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③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2页。

④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7页。

斐伏尔提出的“在把空间自由地运用于个人和社会目的，以及通过私有财产、国家与其他形式的阶级和社会力量控制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紧张关系”之外，哈维还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所面临的几种显而易见的困境。一是空间的重组始终是社会权力通过其得以表现的框架的重组；二是“创造空间”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面临的重要政治经济现象；三是任何空间策略都必须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四是空间的同质化给场所的概念造成了各种严重困难；最为严重的困境，还在于“只有通过创造空间才能征服空间”这样一个事实。

1973年出版的法文版《空间的生产》是列斐伏尔关于空间思想的重要代表作，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很大一部分也来源于该书。在1991年道格拉斯出版的《空间的生产》的英译本中，哈维还特意为其作了跋文，高度评价了这部著作。哈维指出：“列斐伏尔主张生活应当被当作一种规划来过，并且只有那种明智的政治的规划才让生活更加富有意义。《空间的生产》无疑体现了这种规划的目的，列斐伏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该书工作和写作。而且《空间的生产》是一部重要的标志性著作，它值得广泛地阅读，因为该书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和无限的可能性。”^①从《空间的生产》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列斐伏尔主要探究了“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空间的结构”（spatial architectonics）、“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矛盾空间”（the contradictions of space）和“差异空间”（differential space）。而哈维在分析和解读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把空间作为一种社会的建构来理解，这明显地受到了列斐伏尔“社会空间思想”的启发；哈维把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当作一种商品来分析和对待，这其实与列斐伏尔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空间是一个“抽象的空间”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样，哈维在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时，毫无疑问承继了列斐伏尔的“矛盾空间”的思想。

^①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431.

第四节 福柯：空间与权力

作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福柯的理论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历史学、医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等学科。但是长期以来，他对后现代地理学空间理论的建构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有关空间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一些讲稿和访谈录中。具体来说，这些讲稿和访谈录主要有：《不同空间的正文和上下文》（1967 年）、《权力的地理学》（1976 年）和《空间、知识和权力》（1982 年）。福柯对后现代地理学空间理论的重大建树，集中体现为他对空间与权力关系的系统而独到的论述。他率先指出，现在的时代是空间的纪元，是空间崛起的时代，随后他紧紧围绕空间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这一探讨中，他从大量的实体空间，诸如监狱、疯人院、工厂、军营、学校、医院等，发掘隐藏在空间背后的权力关系，并进一步解释这些权力运作的机制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重大影响。

当哈维面对地理学缺乏批判的眼光和自省的关注时，他把福柯的有关空间与权力的思想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加以引进。对此，他有一段比较耐人寻味的陈述：“自从福柯教导我们知识 / 权力 / 机构在在特定治理模式里纠缠在一起，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却很少有人想要将这盏探照灯转向地理学本身。他们没有留意福柯的另一项重要观察，即规训、监控、和惩罚对一切机构（从监狱和工厂，到世界银行、大学，甚至是个别学科）的运作具有重要性”。^① 福柯有关空间与权力的思想，对哈维的主要影响体现为：首先，“空间时代的崛起”的思想促使哈维重视空间的重要意义，把它视为同时间这个维度同等重要的范畴，从而建构了作为城市空间指导思想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其次，“空间里渗透着权力”的思想构成了

①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18 页。

哈维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内部所包含的各种主体利益力量、城市空间中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以及统治阶级结成联盟等思想的来源；最后，作为充满社会肌体“全景敞视主义”这种规训与惩罚体制，成为哈维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的有益养料。

一、空间时代的崛起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两个重要向度。可是长期以来，至少在 20 世纪以前，由于历史决定论根深蒂固的影响，时间在人文社科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而空间这个向度在人文社科领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居于从属的地位。正如福柯指出的那样，“19 世纪最重要的着魔 (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以它不同主题的发展与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累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和威胁世界的冻结”，^① 而“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② 直到 20 世纪，以列斐伏尔、福柯、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和爱德华·索亚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出现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的改观。

福柯认为，空间虽然在当今成为我们关心、理论和体系的范围，但是，它如同时间一样也有其自身的历史。在他看来，空间的历史经历了地方化 (localization)、延伸 (extension) 和基地 (site) 三个阶段。地方化阶段主要是以中世纪层级性地点整体为代表，空间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层级性和对立性，比如神圣地点与凡俗地点、封闭地点与开放暴露地点、城市地点与乡村地点等构成的层级与对立。定位空间的打破和延伸空间的建立，这主要归功于 17 世纪的伽利略。伽利略的地球绕日的发现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视野和空间，建构了一个无限开放的空间。而今天，基地

① 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载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理论读本》，明文书局有限公司 1999 年版，第 400 页。

② 福柯、瑞金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6 页。

又取代了延伸。所谓基地，主要是指“被两点或两元素间的近似关系所界定；从形式上，我们可将这种关系区分成序列的、树状的与格子的关系”。^①福柯强调，在机器记忆的资料及计算结果的储存、汽车交通和电话线声音的传输等当代的技术工作中，基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人类基地或生活空间的问题，不仅是了解这个世界是否有足够空间容纳的问题——这显然是个重要的问题——而且也是在一个既定的情境中，了解人类元素之近亲关系、储存、流动、制造与分离，已达成既定目标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世代是空间带给我们的，是基地间的不同关系形成的世代”。^②

由此，福柯指出：“当今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epoch of simultaneity）：处在一个并列的年代，近与远、肩并肩以及星罗散步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样一刻，其中由时间以一生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交叉间之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③所以，在福柯看来，空间的重要性会随着人类实践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即使是以时间为重要向度的历史事件也应该被还原为各种空间化的描述，因为每一个历史事件中都包含着位置的迁移、疆界的划分、历史地图的重建，而不能把历史仅仅做单一的线性理解。所以，福柯坚持认为，20世纪以后的时代不再是时间主宰空间的年代，而是空间崛起的时代。

二、空间里渗透着权力

在福柯看来，空间里隐藏和渗透着权力关系，空间是权力关系赖以

①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载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理论读本》，明文书局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401页。

②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载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理论读本》，明文书局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401页。

③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载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理论读本》，明文书局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400页。

存在的场所。在一般意义上讲，人们都习惯对空间作物理学意义上的理解，而在福柯的眼里，空间蕴含着无穷的社会意义，最突出地体现在建筑空间与权力的关系上。尤其是像监狱、工厂、学校、监狱，甚或整个城市等空间里都渗透着权力关系，这些空间都是权力赖以存在的场所，其原因在于这些建筑空间与经济、政治或制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都构成某个特殊群体或阶级利益压迫控制另一些群体和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在福柯看来，建筑空间为我们理解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提供了最佳的、生动形象的例证。

福柯具体考察了建筑空间里面权力形式的运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的不同特点。他以 18 世纪作为历史的分界点，在这之前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帝制。在这种体制下，纪念性建筑的可视性和诸如公共广场这样的仪式场所，都被某些势力集团或阶层仔细地算计和规划，这些建筑被深深地打上了权力的烙印。在 18 世纪后，建筑空间权力运作体制的典型特点是“生物—权力”（bio-power）。这是建筑空间的现代权力体制运作模式，这种权力模式运行依靠的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社会制度复合体，这种现代权力运行的典型载体就是医院、监狱、工厂、学校、住宅等建筑。现代权力在建筑空间运行的生动体现就是在学校、监狱、工厂等空间中对纪律的实施和控制。因为在福柯看来，只有首先从对人类空间分配入手才能保证纪律在特定空间中运行。具体讲，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工厂中生产的增长、维持学校中正常秩序、减少城市中的危险和动荡因素。

福柯声称，作为保障纪律所进行的人类空间分配中又关涉到一系列技术的采用。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自我封闭的场所，这个场所就是为贯彻纪律而特设的保护区，这种封闭又主要是通过“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来进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① 比如对流浪汉和穷人的禁闭，学校中寄宿制

^①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62 页。

的采用，军营中对军人的束缚。这样，纪律就创造了一个兼具建筑学和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

纪律在具体的实施中又必须借助于一种层级监视机制。层级监视是靠“监视站”来进行的，这些“监视站”有一个类似军营的理想模式。而在较为完备的军营里，“一切权力都将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任何一个目光都将成为权力整体运作的一部分”。^①所以，福柯认为，军营是一个借助把一切变得明显可见来行使权力的范本，这种模式和它的层级监视原则逐渐扩展、“嵌入”和运用到城市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中。工厂中的监视以泰勒主义为代表，“所有生产力的变数——能力、积极性与技巧的稳定性——都被观察、比较，并赋予特殊的权重”；^②在医院，整个医院的建筑形式是为了便于医生的巡视检验；在学校初等教育的改造中，被明文规定的监督细节进入教学关系中；在监狱里，每一个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权力犯人都被置于持续的观察和监视之下。

三、全景敞视主义

在福柯的眼里，全景敞视主义是以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为（panopticon）代表的一种规训方案和规训意象。他认为，全景敞视建筑应该被看作一种普遍化的功能运作模式和权力关系方式。全景敞视主义的职能扩展到政治领域的所有层面，它也被广泛纳入教育、医疗、生产和惩罚等职能领域中。在历史上，有两种典型的规训方案和规训意象：一种是城市控制瘟疫等流行病时而采用的规训方案和规训意象，另一种是以全景敞视建筑为代表的规训方案和规训意象。

17世纪末，当城市发生瘟疫时，在城市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和监督。

①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4页。

②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8页。

采取空间隔离的措施主要是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格限制一切人自由出行，将城市划分成若干区，实行区长负责制，而在每一个区里面的每一条街道又有一名里长负责，同时对一切乱窜的动物进行捕杀。所以，“这是一个被割裂的，静止冻结的空间。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动，就要冒生命危险，或者受到传染，或者受到惩罚”。^①与空间隔离措施相伴随的，还有不停的监督。为了进行有效的监督，动员了许多的社会力量：民兵在出入口、市政厅和各个区进行警戒；区长督促监督里长，而里长则落实对每个居民的监督，以核实有没有人因为瘟疫死亡以便采取必要有效的措施。

这种监视机制的有效运行依赖的是一种不断的登记体制：里长向区长报告，区长向市长报告。“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性别”都被登记注册。登记册分为三份，一份交给区长，一份交给市政厅，另一份供里长每日点名用。在巡视中所能了解的一切情况比如死亡、病情或异常情况都被记录下来，以转达给区长和市政长官，以便他们决定采取何种医疗措施。所以，“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②由此，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为了防止瘟疫的蔓延，就要求对瘟疫患者“进行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与网络化”。^③这样，瘟疫患者就被卷入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因此，瘟疫流行的城市实质上是一个被规训的社会。因为在瘟疫流行的城镇，“应完全被一个层级网络、监视、观察和书写所覆盖；一种广延性权力以一种确定无误的方式统治每个人的肉体，使该城镇变得静止不动”。^④这实质上

①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9—220页。

②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1页。

③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2页。

④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2—223页。

就是一个治理完善的城市的乌托邦。

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作为监狱改革的一种方案，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四周是一个被分成许多小囚室的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由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的瞭望塔；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通过逆光效果，囚室里的囚禁者能被清晰地观察和辨认。因此，“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除了另外两个功能。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① 由此全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就在于，“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千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② 福柯认为，这种机制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③ 这样，一种虚构的关系却产生了真实征服的效果。

从瘟疫袭扰的城市与全景敞视机构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中，福柯察觉到了规训方案的变化。他认为在瘟疫袭扰的城市中，权力被动员起来反对一种超常的灾难；而全景敞视建筑则是一种普遍化的功能运作模式，它是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确定权力关系的。在福柯看来，全景敞视建筑就是一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它实际上是独特的政治技术的象征。全景敞式建筑具有许多价值，它可以用于改造犯人、医治病人、教育学生、禁闭疯人、监督工人、强制乞丐和懒惰者劳动。那么，现代社会中还存不存在具备这些功能的全景敞式建筑？福柯的回答是，在现代生活中，“全景敞视模式没有自生自灭，也没有被磨损掉任何基本特征，而是注定要传遍整

①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4—225页。

②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6页。

③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6—227页。

个社会机体。它的使命就是变成一种普遍功能”。^①也就是说，作为规训方案和规训意象的“全景敞视机构”广泛遍布于整个社会，社会的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以各种不同形式采用各种手段监控、约束和束缚社会上的不同人群，从而达到对这些特定人群进行规训、教化和管理的目的。

哈维将福柯视为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的代表。在他看来，福柯颠覆了中心化和全球化的宏大叙事，将微观的身体提到了凸显的位置，把身体作为理解政治抵抗和解放政治学的基础和特殊重要场所。哈维认为，作为宏观话语的“全球化”和微观话语的“身体”在社会生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彼此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指出的：“这两种话语体制——全球化和身体——在同一光谱上的两极发挥作用，借助那种光谱，我们从量上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②而这两种话语体系的联系在于，“对身体的特殊性理解不能独立于它所嵌入的社会生态过程……如果没有对全球化的理解，身体就不能在理论上和经验上被理解。但是，相反地，把全球化归结为最简单的定义，它便是关于亿万个体之间的社会空间关系”。^③哈维认为，福柯的独特贡献在于他能从全球化和身体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领域和话语体系中发掘和建立二者的联系，并从这个联系中关注微观身体是如何受制于宏观全球化的，从而为进一步从“全球化”与“身体”的视角探讨身体是如何被规训、被约束的另一种机制奠定了基础。

哈维认为，福柯对空间与权力关系把握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是从微观的身体被规训和惩罚的角度展开的。因为，在福柯看来，个人的日常生活是在通过压制、约束和惩罚的社会力量所强加的空间中展开的。身体存在于空间里，而且空间必须服从于诸如监禁、规训和惩罚这样的社会力量。所以，“对福柯来说，空间是一个权力场所或权力容器的隐喻，它通

①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3页。

②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③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常会抑制但有时也会解放‘形成’的过程”，^①重建力量关系的任何斗争，都是一种重组它们空间基础的斗争。哈维认为福柯通过对社会控制空间内部的监禁的强调，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像监狱、医院等有组织的压迫性的空间内，由此他抓住了城市地理学家们极力关注的一个主题，而这恰恰是传统地理学中所忽略的。

哈维极力赞成福柯的“时空的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与身体的生产相关联”的观点。哈维认为，福柯在其研究空间与权力关系的重要代表作《规训与惩罚》中，就将感觉和身体从绝对的时空世界观中解放出来，并把身体作为解放策略的中心问题。这样，福柯挑战了遏制和规范身体的普遍机制。对福柯来说，全景敞视建筑就是这种机制的典型代表。这种思想源流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分析和解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据此哈维看到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制，城市空间中的不平衡地理发展，阶级垄断同盟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和群体的剥削与压制。

①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8页。

第二章 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理论基础

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奠定在时间、空间辩证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哈维突破了对空间进行形而上学解读的局限，从社会的视角去分析空间和揭示空间；另一方面，哈维还从方法论的角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一种时空结合的理论，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构成了哈维城市空间分析的一个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前提。

第一节 空间：社会的建构

一、填补马克思的“理论空盒”

哈维对蕴含于空间中的社会关系的探寻，是从分析和评判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尤其是城市空间思想理论开始的。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历史决定论，其主要特征就是以线性的时间为维度来考察社会进程和人类历史，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空间的缺场”，是一个“空间理论空盒”。

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否包含了空间的思想，哈维并没有采取断然否决的态度，他承认在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也能看到关于地理空间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他曾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段落论证其观点：“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

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

在肯定马克思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承认空间和地方性的重要性的同时，哈维又毫不隐讳地指出：“这些都没能彻底整合到理论表述中，这种理论在时间方面很有效力，但空间方面却很虚弱。他的政治眼光和理论贡献因为未能在他的思想里，建立起有系统且独特的地理向度而垮掉了。”^② 因此他认为，尽管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全球征服活动做了引人注目的、深刻的描述，但是马克思有关空间问题的著作和思想却是零碎的、简略的和不系统的，因为像有关国家、世界市场和危机形成的理论等问题并没有受到马克思严肃认真地对待和考虑。所以马克思主义“很难对付生态议题，或是空间与地方特殊状态内、高度分化的个人和社会群体活动乃首要关切的那种主题”。^③

但是不管怎样说，哈维还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文本中蕴含的空间思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唯物理论和历史主义解释中已经具有空间理论的框架和雏形。因此，哈维认为他的目的就是在此基础上，“为这个框架提供详尽的轮廓和实质内容材料，以便为进一步深入分析资本积累的空间动力学奠定基础。我希望这有助于我们阐明和解释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③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170页。

主义的实际历史地理学”。^① 他觉得这样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当今时代，“多样的城市化现象、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地区间的相互依赖和竞争、地区和国际间劳动分工的重组、社区的领土性质和国家功能、帝国主义以及发生在帝国主义间的地理政治的争斗，所有这些都应该被阐释和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理论中”。^②

具体到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分析和评判城市空间时，哈维认为最大的挑战和障碍在于阐明资本积累的时间动力学和新空间构型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因为马克思本人及其后来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外在的空间关系和内在的空间组织对形塑时空动力学几乎不起任何作用”，^③ 所以在这一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形成明晰完整和系统的空间理论和空间关系。因此哈维一再声称，应当把空间关系和地理想象当作分析问题的一个基本物质属性和一个根本的积极的因素。因为在哈维看来，唯有如此才能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动力学，才能从理论上阐明资本主义是怎样形塑空间组织的、怎样生产的，以及怎样使生产、交换、消费的地理景观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的。

由于对传统地理学研究现状的不满和马克思理论对空间问题的忽视，哈维主张应把空间关系和地理想象整合进马克思的理论之中。就城市空间研究而言，他要做的就是空间的生产和空间的形塑作为一个核心的积极的因素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从而建构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之所以如此，哈维提出了两点最为重要的理由。

第一，应将马克思理论视为一个运动的辩证过程，其中的每一个概念和结论应随着每一个新的阶段的实践而得到扩展、修正，而不是将马克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32.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p.32-33.

③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33.

思理论仅仅当作一个寻求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框架并由此引导出永恒真理的方法。在《资本的界限》这本著作中，哈维就力图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把地理环境空间等要素融合进资本理论的分析 and 阐述中重新阐发《资本论》，并通过危机形成理论、固定资本流通理论、信贷系统运作的调查和研究，重新界定了马克思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概念。

第二，尽管马克思有关空间和地理问题的评论中是零碎性的，但毕竟存在着很多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这也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和起点，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在哈维看来，《资本论》第一章有关社区、地点和世界市场等空间的概念中充满了丰富的空间形象，这充分地表明地理空间现象与马克思所采用的概念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价值这个概念就是借助于几何学的描述来完成的，因为商品形成的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的空间形式和内容的转换，价值最终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结晶体，因此，“商品的价值越来越扩张进人类的抽象劳动中，而这种扩展的比例与交换冲破它的地方限制是一致的”。^① 在哈维看来，马克思所论述的货币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与空间地理密切相关的过程：货币正是通过不同地点和空间的交换的过程后，才从潜藏在商品的对立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中形成一个具有特殊价值的“结晶体”。而且马克思还提到，穿越空间的交通是“价值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克服空间障碍的能力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

总之，哈维认为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力图把时空视角和社会生态议题整合进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而重塑马克思的理论。关于这一点，他认为他与那些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者不同，“他们运用空间性和空间隐喻的唯一目的是采用一种不可调和的异质的、不可沟通的和不可简约的个人主义立场，并从根本上颠覆马克思主义理论”。^② 而他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和发展，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保持旺盛生命力所必需的。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34.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34.

二、空间是社会的构造物

“什么是城市空间，怎样理解城市空间”是哈维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注并力求加以解决的问题。哈维主张，我们应该从不同角度来思考城市空间。而正确的城市空间概念非常重要和关键，因为“如果我们要对城市现象和社会有一个整体认识，那么形成一个合适的空间概念就变得非常关键”。^①哈维指出，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对城市这个复杂的事物知之甚少，虽然与城市本身的内在复杂性有关，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形成正确的有关城市的概念。像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等学科都在各自狭窄的学科范围内定义城市、分析城市、理解城市。但是，城市再也不能按照我们目前的学科结构来定义，我们应该打破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城市。然而，要理解城市就必须形成一个充分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必须建立在社会想象和地理想象结合起来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城市中的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的复杂性。

哈维主张，对空间的理解间的本质仍然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空间既可以看作是绝对的，因为空间具有一个我们可以感知的具有容积的结构，它可以独立于物质而“自我存在”；空间也可以看作是相对的，因为空间是仅仅存在于物体间的相互关系之中，因为物体以相互关系的形式而存在。然而，“空间本身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相对的或关系的，它可以依据实际情况称为其中的一种形式或几种形式”，所以“合适的空间概念问题只能通过与空间有关的人类实践加以解决”。^②换句话说，空间并非是一个绝对的形而上的范畴，而是一个既可以塑造社会关系同时又被社会关系塑造的社会关系概念。所以，对源自空间本质是什么的哲学问题没有哲学答案，其答案仅仅存在于人类实践中。这样，“空间是什么的问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3.

②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3.

题”就被“不同的人类实践是怎样创造和使用不同的空间概念”的问题所取代，而要理解都市生活、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的主题也必须按照这个逻辑加以理解。因此，哈维主张，如果要研究城市问题，那么就必须把社会进程和城市的空间形式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应在社会想象和地理想象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

为了进一步分析探讨空间的属性，哈维还对空间进行了分类。早在1973年出版的《社会正义和城市》一书中，哈维就把空间分为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相对空间（relative space）和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在三十多年后出版的《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一书中，哈维又对空间的这三种分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在他看来，绝对空间就是牛顿和笛卡尔所理解和代表的空间，也就是几何学意义上的欧几里得几何空间和地图学及其工程技术学领域中所实践的空间；相对空间是指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非欧几里得几何空间的空间；关系空间主要是莱布尼兹所理解的空间，主要是把空间理解为一种过程、一种关系，任何事物都不能外在于界定这些事物的时空过程而存在，所以，关系空间不仅包括空间的内在关系，还包含空间的外在影响等因素。哈维认为，对“一个事物处在那一种空间中”的问题不能做简单的判断，它可能处于其中的一种、两种类型，甚至三种类型之中。在空间的这三种类型中，哈维深入研究和探讨的是作为关系的空间，因为关系空间是哈维探讨空间社会建构的入口和基础。在他看来，关系空间既克服了实证主义把空间理解为绝对空间的弊端，与此同时，关系空间又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理解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关键。

哈维在列斐伏尔把空间分为物质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实践的‘网格’理论”，进一步说明了空间的社会属性。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中，物质空间的实践主要是指物理的和物质的流动、转让和相互作用；空间的再现主要是指有关空间的符号、意义、代码和知识；再现的空间主要是指有关空间的社会发明，尤其是人工环境、绘画、博物馆等。但是哈维认为把空间实践的历史归纳为经验

的、感知的和想象的三个维度，还不能正确地理解空间的社会意义。为此，他提出还应该增加“可达性和距离性”、“空间的占有”和“空间的支配”这三个新的维度。按照哈维的理解，“可达性和距离性”证明了“距离摩擦”在人类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因为距离是生产和再生产任何一个系统中成本的一部分，人类只有克服这个“距离摩擦”才能适应社会生产和社会的交互作用；空间的占有主要说明空间被个人、阶级，或其他社会团体占据的情况；空间的支配则反映了个人或团体如何支配空间的组织，如何进行空间的生产，以及如何通过占用空间的方式行使最大程度的对他人或团体的控制。所以，哈维坚信，这个网格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资本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塑造作用和决定作用。

因此，哈维极力赞赏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空间和时间都是社会构造物”的观点，并且指出，许多人类学家都达成了“不同的社会创造了性质有所差别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有关空间的共识。对此，哈维还作出了四点澄清和补充：第一，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构造物并不是无缘无故地产生，而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各种形式中塑造的，人类在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遭遇着这些时空形式；第二，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同样地依赖于文化的、比喻的和知识的技能；第三，空间和时间的社会构造物，与任何个人和制度皆需回应的全部客观力量一道发挥作用；第四，客观的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定义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①

哈维还对人类时间空间的历史做了总结，认为人类历史历经了“相对辩证的时空观——基督教的时空观——工业化时期的时空观”这三个阶段。在中世纪及其以前，人们观察空间和时间的的方式是相关的和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空间和时间并不“在经验之外和之前存在；它们只是在经验自身中给定的，它们成为经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不能把他们从生活之

^① 参见大卫·哈维：《贯穿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弹性积累：对美国城市中“后现代主义的反思”》，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95页。

网中分离出来”。^①但是，伴随着从异教信仰想基督教的转变，中世纪后人们的空间观念经历了一种彻底的结构转型。这时，时空性不可分割地同宗教和道德概念联系在一起。基督教打破了时间的循环世界观，并代之以一种更具末世论意味的观点。基督教的时空观认为，存在着一个开端、顶点和终点，这种时间是线性的和不可逆的。而进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新的时空概念其特点表现为“暗含在工业组织中的时空网络”，它主要是资本主义通过征服、帝国扩张或新殖民统治所强加的。如欧洲列强通过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从而把完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强加到土著人头上，并且因此永远改变了这些人口再生产得以发生的社会模式和框架。所以，哈维指出，殖民“不只是指建立一种欧洲势力，而且是传播一种政治秩序，这种秩序把新的空间观点、新的形态或人格以及新的创造真实经验的手段刻写在社会世界之上”。^②

哈维坚称，空间的社会建构还体现在不同阶级、性别对它的争夺中，以及时空中的生态学和市場学的对抗中。时空观点上的阶级、性别、文化、宗教和政治差别常常成为社会冲突的舞台，而这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不同的阶级视角支配着社会计算的不同时间视野。他以《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的“工作日”为例进行说明。他指出，对公平时间的理解，工人和资本家的立场大不一样。资本家是根据他们的目的而延长或歪曲时间观念的，他们认为一天的公平工作量由一个工人第二天能回来工作所需要的恢复体力时间来衡量；而工人则认为，这种计算方法忽视了不间断的劳苦和导致人的寿命减少，公平的工作时间应以整个劳动生涯来计算。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从市场交换法则立场来看，两边都没有错，但

① 大卫·哈维：《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② 大卫·哈维：《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是不同的阶级视角支配着社会计算的不同时间视野”。^① 并且资产阶级还借助于一整套监视机构和监督体系来保证他们的所谓公平的时间。这生动地体现在被当作“理想的习艺所”的工厂之中，为了根除工人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资本家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工人进行超负荷的劳动，每天应当劳动 14 小时以上。所以，“这种时间规训至关重要地取决于与众不同的监视空间的建构”。^② 由此可以看出，在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规训的理论方面，马克思远远地走在了福柯的前面，只不过马克思是从时空统一的角度看待资本家对工人的规训和管理的，而福柯是从空间的视角来分析人的规训理论的。

第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根据性别角色对时间作出相当不同的理解。男性时间主要与生产联系在一起，然而女性时间则主要地与再生产，与“类、生命与死亡、身体、性别以及象征的持存”联系在一起。同样地，空间的用法和定义也是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争夺的领域。生态学家从广泛的社会行动空间概念出发，关注全球变暖、酸雨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强调可持续发展，做到在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生态环境之间保持平衡；而经济学家从利益和市场出发，坚持对社会资源尽可能地利用以便发挥出它的最大经济效益，这明显是一种短期的时间观念和短视的观点。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性别对时间的理解和感悟有着较大差异；而不同学科和学派对空间关注的重心和角度也不尽相同。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建构

哈维重点分析和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时空结构，在他看来，

① 大卫·哈维：《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1 页。

② 大卫·哈维：《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1 页。

“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①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其特有的时空概念和相应的物质实践活动，资本主义的时空概念是与资本主义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有关资本主义时空的精神观点和物质实践的建构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的时空建构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颠覆了中世纪的时空结构。中世纪的时空结构的最大特点在于线性的等级化的特征，但是，随着文艺复兴之后的地理大发现、环球航行、牛顿的时空概念、透视法学说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中世纪的时空结构遭到极大的颠覆。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同时地理知识也越来越与财富、权力和资本联系起来而成为一种有特殊价值的商品；而以牛顿为代表的时空概念是一种泛神论的观点，这极大地挑战了中世纪的绝对的中心化的权威和教义；透视法学说在以光学科学和个人能力的基础之上，强调按照某种“真实的感觉”去表达所见之物，这与神话或宗教所附加的真实形成了反差，与此同时它标志着艺术与建筑实践突破了各种工匠和乡土的传统，走向了创造性。

其次，资本主义的时空观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和规则来定义的时空观。他指出：“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带来了对时空观点的根本性再定义，这就使得根据全新的社会原则来重整世界秩序”。^②小时是13世纪的发明，分与秒则迟至17世纪才成为通用的度量标准，而现在又发明了毫秒、微秒甚至更细的分类。这些计时单位的发明与生产、交换、商业和管理中对效率的关注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时空建构的特点是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相

① 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想象学的反思》，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② 大卫·哈维：《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联系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发达的商品经济中的商品交换是以金钱或货币作为交换中介的，而这种经济特征也根本地改变和确定了社会生活中时间的意义。自14世纪欧洲进入商业社会以来，时间的量度以商业运转为中轴，工人到工厂做工、商人到市场进行交易都以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时空特征为准绳。所以哈维指出：“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同质的、普遍的时间概念，对于利润率（亚当·斯密所说的时间过程中资本股票的回报）、利率、计时工资以及对资本家的决策来说很基本的其他重要性的意义。”^①

最后，与计时的历史一样，资本主义的空间观也是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最初，制图学的历史主要涉及的也是根据明确地规定的数学原理改进空间测量和再现的方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和推广，贸易和商业、财产和领土权力等利益在重塑精神结构和物质实践中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样，地理知识明显地成为军事和经济权利的至关重要的工具，地图与货币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而且资本主义的空间观的变化和发展与以交通、通讯为主要内容改革的空间关系的重组和剧烈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收费公路、运河、铁路、汽船和电报、无线电和汽车、集装化运输、喷气式飞机运输、电视和远程通讯等，已经改变了时空关系，并促成新的物质实践和新的空间再现模式，测量和区分时间的能力也已经革命化，首先是日益精确的计时器的生产和传播，其次是对生产速度、生产的协调机制以及人、货、信息等运动速度的密切关注，在人类事务中，客观时空的物质基础已经成为快速移动而不是固定的数据点”。^②

所以，“资本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安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剥削方式，因此寻找新的时

① 大卫·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4页。

② 大卫·哈维：《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空客观定义”。^①哈维还深刻地指出，内含于资本主义发展运动法则之中的时空特征在于“朝向周转时间的加速（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世界全都倾向于变得越来越快）和空间视野的收缩”。^②哈维把这种时空特征称为“时空压缩”，其确切含义是指“这个词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过程。而“时空压缩”根源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③

不难看出，哈维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时空建构的历史条件，正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时空不同于其他社会的重要特点。这为其分析评判资本主义，特别是对从资本逻辑的视角分析城市空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基石

一、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纵观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可以看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就好似一根红线贯穿其中。它既是哈维整个城市空间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其城市空间思想中一个首要的核心的概念，还是其追求的激进的解放政治学和辩证

① 大卫·哈维：《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129页。

② 大卫·哈维：《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③ 大卫·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0页。

乌托邦的理论支撑点。在谈到自己研究方法时，哈维多次强调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实证主义不同，他采用的是一种辩证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也就是他所称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至于为何要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指出：“我们必须界定出激进的引导愿景：探索超越物质必然性的自由领域，开启通往创造新社会的道路，寻常民众也能握有力量，按照自由的形象及对立利益的相互尊重，来创造自己的地理和历史。”^①他真正想做的是“拣选一些非常基本的地理概念——空间、地方、时间、环境——并证明它们在任何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认识的核心。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量历史地理唯物论，还需要具有一些辩证法的概念”，^②因此他“采取的整体立场是一种辩证的、历史地理的和唯物主义理论，因为这种理论要以某种方式应对诸如整体、个别、运动、静止等问题。这种理论能够把其他形式的理论包含于其中而对其本身几乎没有任何损失”。^③不难看出，哈维所建构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综合了时间、空间和辩证法这三个要素。

哈维认为，西欧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转型的过程也是地理思想和实践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过程。哈维还据此归纳了资产阶级时代地理实践的六个面向，来说明和论证他的主张。第一，对航海和领土权界定的关切推动了制图和地籍调查技术；第二，世界市场的确立和发展推动了各个地方间商品的交换；第三，生活方式、经济形式和社会再生产的地理变化的细密观察成为了地理学的重要任务；第四，把世界划分为几个资本主义强权势力的范围引发了严重的地缘政治问题；第五，地理学家越来越关切资源的利用和人口、产业、交通等空间分布合理化问题；第六，资产阶级时代的地理知识越发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④就地理学的未来前景来说，

①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③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9.

④ 参见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63页。

他坚持认为：“地理学家目前面临的困境和替代出路，同样根植于社会转型的冲突性过程。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有关我们学科的转型或稳定化的提案，都是相对于更广大社会变迁过程的立场。有关我们的学科将往何处去，以及它如何能重新建构以迎合当代挑战和需求的争论，必须察觉到这项基本事实。”^①可见，哈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来分析传统地理学的转型与改革的，他极力主张进行地理学科的转型与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

哈维虽然把空间、地方和环境作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但他也十分强调时间范畴的重要性。哈维认为地理学探讨的核心问题虽然是空间问题，但地理学与时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地理学的现况，以及转化地理学的提案，必须牢牢奠基于对历史的认识。地理知识的角色与功能，以及这种知识的结构，都与时俱进，涉及且回应了持续变化的社会型态和需求。对于我们学科历史的认识，无法摆脱社会的历史，地理学实践正镶嵌于社会的历史中”。^②因此，无论是地理知识形式还是内容都必须从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基础和现实实践来加以理解。

哈维之所以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期望能够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来解决长期困扰地理学科内部诸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区域特殊性和全球变异的系统化研究、独特的视角与普遍的视角、量变与质变”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矛盾和问题。在哈维看来，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当下地理学是无法解决地理学内部这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的，于是当今地理学陷入了这样一种尴尬困境：“既缺乏学院认同和深度，群众基础又薄弱，在这两难困境里的学院地理学，未能在学术分工里建立起有权力、声望和尊严的位置。它的存活逐渐取决于培养非常专门的技能（如遥测），或替强大的特殊利益团体生产专门知识。大政府、企业和军方提供了一系列特定职务，让地理学家

①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可以方便的匍匐进入。这门学科学术发展，现在受到了彻底屈服于强大特殊利益团体的威胁。”^①同时哈维又声称，相较于实证主义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是更科学的方法论，但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没有对空间地理环境给予足够的重视而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此，只能诉诸一种新的理论，那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再融入空间、地理、环境等重要因素在内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唯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才能胜任对空间、地理尤其是城市空间的分析和研究。

实证主义是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开创的一个哲学派别，其中心论点是强调必须是透过观察或感觉经验来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超越经验或不是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知识，不是真的知识；其目的在于反对理性主义、建立一种客观的知识。哈维的学科基础是地理学，而在传统的地理学中，实证主义是作为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被广为接受的。即使在哈维的早期地理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对哈维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不过1973年《社会正义和城市》出版后，哈维更多地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思想逐步转移到辩证的、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他逐步地认识和体会到地理学知识是一种社会情境的产物，而且城市生活的实质是一系列社会关系。

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目的在于对人类认识历史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以单一的时间视角把握社会认识历史的历史决定论进行升级和改造，但他也并没有一味地从自己固有的地理学科的空间视阈出发，而是主张从一种时空统一的角度来把握社会认识历史。我们知道时间和空间是把握社会和认识历史两个基本维度，但是在学科区别中则形成了历史学和地理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各个学科各执一端，要么强调时间，要么强调空间。所以地理学强化空间的给定性，而历史学则强调历史的生成性。这种对立不仅是方法的对立，也是历史观和政治实践立场的对立。正是基于这种时空结合的考虑，哈维指出：“我的目标是重构理论，

^①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166页。

使空间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基本要素整合其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特别地，把‘空间的生产’，或者更一般地，把‘自然的生产’所意味的东西加以理论化……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是可能的。”^①可见，哈维的理论目标就是扭转长期以来忽略空间的传统，将地理、环境、空间等要素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中并对之进行提升和改造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而这种升级后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即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还是辩证的，而居于其中核心内容就是空间的生产。

空间长时间被忽视和压抑的状况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得到明显扭转。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以列斐伏尔 (Lefebvre, H.)、曼纽尔·卡斯特 (Castells, M.) 和哈维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和空间的著作，并对整个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些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 1971 年出版的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1972 年出版的曼纽尔·卡斯特的《城市问题》、1973 年出版的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和哈维的《社会正义和城市》。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时间和空间结合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将城市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视角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理解。

从哈维的相关城市空间著作中可以看出，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主义是如何生产了自己的地理”这个问题。不过哈维在分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时，与马克思的起点有所不同。马克思是从商品的价值出发，从而揭示隐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关系，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的；而哈维是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出发来分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因为他所关注的重点与马克思有所不同，哈维关注的重点是作为使用价值的资本主义地理景观，分析使用价值是如何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构成资本主义特殊的地理景观的。由此可见，“正是借助使用价值和固定资本问题的分析，哈维抓住资本积累 / 阶级斗争这个中轴，形成一套对资本主

^①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 页。

义空间关系构型进行分析的框架，并由此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改造使之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①

围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总的特征和核心内容，哈维在不同场合多次做过阐释和论述。

在《后现代的状况》中，哈维并没有像许多后现代思想家那样一味地排斥时间强调空间，而是从时空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升级的四点纲领：（1）强调把差异和“他者”当作把握社会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恢复种族、性别和宗教等方面社会组织的重要性；（2）必须把形象生产和话语生产作为分析象征秩序再生产和转型的重要方面；（3）充分认识到社会行动中的现实地理学，即辩证对待时空的关系；（4）应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作一种无限制的辩证的探究方法。^②从这些纲领中不难看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作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和替代解放政治学而存在的。

1984年，哈维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纲领的五个重要任务：第一，建立一种大众的地理学，远离偏见，反思各种真实的矛盾和冲突，同时能够打开一个新的交流和共同理解的（知识）通道。第二，建立一种应用的人民地理学，不把它归之于狭隘的和有力的特殊利益，而是建立在其概念上的广泛的民主性之上；第三，接受科学的诚实性和非中立性之二元方法论承诺；第四，把地理学的敏感性整合到源自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通用社会理论之中；第五，定义一种政治事业，这种事业以历史的地理的眼光关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③由此可见，哈维一改传统的地理学中实证的中立的传统，强调要建立一种大众的人民的地理学，从而

① 胡大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载张一兵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② 参见大卫·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41页。

③ 参见胡大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载张一兵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5页。

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地理，为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找到出路。

哈维还具体地探索了将传统地理学升级改造为一种激进地理学、批判地理学和人民地理学的具体措施。首先，要把地理学知识与人文主义融合起来，对于“自然与人类资源的不明智使用、环境劣化，以及（人口、产业、运输设施、生态复合体等等之）空间分布的低效率或不正义的关切”等一系列人文问题要纳入地理学研究的视野。^①其次，要发挥地理知识的潜能，因为“地理知识拥有大多尚未实现的潜能，来表现希望和向往，以及恐惧，基于相互尊重和关切而寻求普遍的理解，以及在一个有鲜明地理差异的世界里，搭建起更稳固的人类合作基础”。^②再次，让地理知识成为表现乌托邦愿景的媒介，并通过此媒介更有助于实现理想社会的建立和美好城市空间的创建，因为在哈维看来，“依照这种自由和尊重他人的精神来建立地理知识……开启了创造另类地理实践形式的可能性，紧系于相互尊重和利益的原则，而非剥削的政治。地理知识可以成为表现乌托邦愿景的媒介，以及创造另类地理形势的实质蓝图……它们可以成为接合多样人群正当且经常有所冲突之期望的媒介，并因而镶嵌于另类政治中，无论那是透过非政府组织或政党，还是社会运动而发动的。它们可以提供有效的手段来动员世界的知识，以便达成所有学问和科学一向渴求的解放目标”。^③最后，应把地理知识运用于政治行动中，摒弃传统地理学远离社会的传统创立一种激进的批判地理学，而批判地理学就是要“找出地理知识生产的原则和机制，努力理解地理知识如何构成，并运用于政治行动中。它利用这种理解来质问，不同形式的地理知识如何及何时曾部署于何种类型的政治行动中。简言之，它认识到政治力量和不同类型的地理知识之间的动态连结”。^④

①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340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0页。

③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0页。

④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1页。

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哈维描述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话语六个话语特征，分别是：第一，“图绘空间”（mapping space）的话语行动是任何知识结构化的先决条件；第二，图绘是一种具体表现力量的话语行为；第三，社会关系总是空间性的，且存在于某种空间性的生产框架之中；第四，物质实践改变空间体验，全部空间知识都源自那种体验；第五，制度是或多或少地持续着的被生产出来的空间；第六，想象（思想、幻想和欲望）是全部可能的空间世界的肥沃的资源，是那个世界预先构造（虽然内在地）不同话语、权力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制度结构和物质实践的全部样态。^①

虽然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哈维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始终有几方面的核心内容包含其中。一是要把空间、地理、环境等要素整合进时间、社会、历史中，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二是发挥地理学知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潜力，将地理学升级改造为激进地理学、批判地理学和人民地理学；三是要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作为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根本的方法论，从而为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和美好城市空间的建立找到出路。

可见，哈维不再满足于他所谓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单一的“时间”历史的向度，而是要把“空间”的维度植入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建构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并将之作为分析和解读城市空间的理论基础。事实上，我们从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和解读中可以看出，哈维不仅把城市空间理解为由各种物质基础设施构成的自然空间，而且还把城市空间视为一种包含有各种政治经济关系的矛盾综合体。也就是说，哈维是从经济和政治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进行分析、解读和评判的。

^① 参见胡大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载张一兵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页。

二、作为城市空间理论基础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正是由于对传统地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极度不满，哈维才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思想资源和方法资源，主张从时空统一的角度来发挥地理学的潜能，尤其是要把地理学知识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发挥地理学知识在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正是在此背景下，哈维才提出和发展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应当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既是哈维城市空间的理论基础，又是哈维分析和探讨城市空间的方法论。凭借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哈维探讨了“资产阶级如何生产自己的地理”这一核心问题，并特别聚焦了资本主义城市这个特殊区域和空间的“空间生产”问题；在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探讨和分析中，哈维具体分析了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和城市空间生产的内在机理和辩证关系，并由此引申出剩余价值及利润的攫取、资本对空间的影响与重塑、人与自然的矛盾、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不平衡发展与居住差异等体现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特质的现实问题。

哈维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分析探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与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爱德华·索亚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一样，也十分强调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受资本逻辑的影响、控制和决定，在逐利性的推动下资本不断地形塑和重组城市空间；另一方面，城市空间又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用列斐伏尔的话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再是在空间中的生产，而是空间自身的生产，形形色色的空间生产不断塑造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进行了一系列独特的分析，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资本与城市空间关系的分析；对资本循环、资本积累的考察；对城市空间生产的矛盾和危机的探讨；对时空压缩和弹性积累背景下的城市空间特点的阐述。

第一，资本与城市空间关系的分析。哈维把资本与空间作为理解把握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两个核心范畴，认为资本与空间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资本与空间各自有其自身的逻辑。就资本逻辑而言，主要体现为资本必须带来利润和剩余价值，资本必须不断的运动才能确保其增殖，资本本质上体现为“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空间的逻辑来说，主要表现为空间受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影响及空间自身的生产已然超过在空间中的生产。虽然时间和空间是把握人类实践活动的两种主要方式，但是在对社会历史考察分析中一直强调时间的重要性，时间大有盖过空间的绝对优势。但哈维坚持主张，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空间、地理、环境的地位越来越凸显，空间不应再视作屈从于时间的范畴，而至少具有与时间同等重要的地位。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如今已完成了“在空间中的生产”向“空间自身的生产”的过渡。哈维强调指出：“在一般的金钱经济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实质性的联结系列。”^①因此，在考察社会历史的时候，应该从时空统一的角度来把握。而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资本与空间具有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资本在塑造、影响和改变城市空间，正是在资本逐利性、增殖性的驱策下，城市的基础设施、住房、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不断地进行更新和改造，而城市空间的更新和改造体现了以资本为主导和决定性地位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本身也在生产和再生产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增殖的社会关系，换言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在不断强化和固化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者的社会关系。

第二，对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考察。从资本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主导性和决定性基本逻辑出发，哈维指出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是资本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具体运作和运动形式，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涉及劳动力、商品和货币资本的流动。资本要想增殖和获利就必须不断地

^①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2页。

运动，而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就是资本运动的具体体现。资本不断积累的动力来自于利润或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持续追求，同时也受竞争压力的影响和推动。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资本要获取剩余价值尤其是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就必须不断增加资本的总量，从而为保证利润的获取和较为有利的竞争地位。哈维用“三级循环”理论来概括说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资本的循环运动。他指出，发生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流动和流通是资本的第一级循环，也就是一般商品生产的那部分资本；那种流入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形式的资本流动是资本的第二级循环；那些用于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军事领域和国家机器的投资是资本的第三级循环。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考察具体展现了资本对空间的塑造和影响，体现了资本对空间生产的决定作用。

第三，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矛盾和危机的探讨。哈维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过程是在矛盾危机和冲突中进行的，这主要表现为经济危机、不平衡地理发展和阶级差异三个方面。而城市空间中的经济危机和不平衡地理发展，又是资本循环不畅通和资本积累不顺畅尤其是资本的过度积累的产物。随着资本第一级循环中过度积累趋势的出现，资本家会在第二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但是到了一定时期后，第二级和第三级循环中又会出现过度积累的情形。因此，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陷入一种“依靠资本积累来解决经济危机却又因为过度积累而陷入更深重的经济危机”的矛盾中。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地理发展具有内在的关系，一方面不平衡地理发展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又必须以不平衡地理发展为前提。在城市空间生产中，不平衡地理发展导致了社会空间极化、居住差异和居住不平等现象的出现。拥有资本和权势的人占据和分享了更多的空间，以汽车为本的城市交通规划和城市向郊区的蔓延扩展迎合了这些人的需求和贪欲；而没有资本和权势的人则占据十分狭窄和窘迫的空间，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性化需求也难以满足。不平衡地理发展还体现在资本对好地段和空间的青睐，资本不断涌入那些能够带来更多剩

余价值的区域，这些区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观，而那些不能带来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地方则无人问津，落入颓废和萧条的境地。城市空间生产的矛盾和危机还体现为资本家与工人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上。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集中过程是和资本家财富的积累、权力的延伸相伴随的，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生活的日益窘迫和弱势无力。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在考察分析资本积累的对抗性质时就指出了无产阶级在空间占有分配上与资产阶级严重的不平等的事实：“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①

第四，对“时间—空间修复”背景下城市空间特点的阐述。哈维所说的“时间—空间修复”，其要义是指资本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的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方法。哈维认为，资本主义进行“时间—空间修复”的重要原因在于应对和解决城市空间生产中的过度积累问题。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会出现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形式出现的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要为这些过剩资本和劳动找到出路，就必须诉诸不动产和固定资产的投资以延长资本周转的时间，同时还要采取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等手段。哈维认为，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缩减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在时空上体现的基本法则。“‘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深深地嵌入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中，并伴随着空间关系中虽然常显粗糙但却持续的转型，这些转型刻画了资产阶级时代（从收费公路到铁路、公路、空中旅行，直至赛博空间）的历史地理特征。”^② 所以，“资本主义总有这样的冲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7—758页。

②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动：加速周转时间、加速资本循环并因此使发展的时间范围革命化”。^① 在哈维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由福特主义向弹性积累的转变，资本主义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出现了新一轮的时空压缩。福特制是一种采用把劳动分工细化和合理化，使工作流向固定空间（工厂）的工人从而提高效率的生产方式。福特制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长期繁荣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的等级制、投资项目的庞大、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市场的饱和等弊端和缺陷的出现，福特制越来越难适应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现实，转而被弹性积累所取代。弹性积累恰恰弥补了福特制的缺陷，具有“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的特征。弹性积累在时空压缩上变现为“个人与公共决策的时间维度已经缩小了，而卫星通讯和正在下降的运输成本使得日益有可能把各种决策很快传送到更为广阔和多样化的空间里去”^② 的特点。

哈维主张把空间地理因素融入时间范畴之中从而提出和建构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以此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来分析、认识和考察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浓烈的时代气息，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说，作为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为我们正确地认识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的各种现象和社会的历史人物等事关社会本质和规律的方面提供了最为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但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僵化的、封闭的理论，而是一种实践的和革命的社会历史理论，它也该随着社会历史实践的不断变化而有所调适和改变。较之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处的时代背景，当今社会历史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的突

①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7 页。

②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92—193 页。

飞猛进、全球化时代的开启、世界历史进程的加速、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微观权力及微观叙事的凸显。这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自觉地丰富、完善和发展其自身的理论。哈维注意到了当今世界社会历史发展中空间地位的凸显和空间生产尤其是城市空间生产带来当今社会深刻变化的现实，从而提出和建构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这无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还是对观察分析当今的社会现实都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和独特贡献。但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也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和偏见。历史唯物主义以时间为轴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并不排斥以横向和空间的维度来认识社会和历史。只不过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空间的角度应服从于时间的视角。马克思也同样坚持“只有将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与历史”的观点，只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像哈维那样无限地拔高空间的地位和作用以至于空间超越时间成为一种盲目的“空间崇拜”、“空间决定论”和“空间拜物教”，这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化和偏执化的思想。如果按照这种思想去认识社会分析历史，那么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会更多，也不能对社会历史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和把握。

第三章 资本逻辑视阈下的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研究城市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引入对城市问题的分析,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分析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关于这一学派研究的主题,哈维作了总结:“他们试图理解城市的政治经济含义、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及其与以行业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传统研究重点)的关系。将城市视为生产、利润实现(通过有效的消费需求)、劳动力再生产的地点(其中家庭与社区机构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住房、医疗、教育、文化生活等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而发挥关键作用),对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和认真的探索。城市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资本与再生产等)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人工环境,社会组织的空间形式(实现生产和再生产)和劳动与功能分工的特殊表现,也被进行了研究。总的命题为城市化是资本主义所有方面的对立统一体。”^①可以说,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研究的主题也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哈维才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经济视阈的分析、政治视阈的考察。

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空间是如何被塑造、如何被生产的,始终是哈维关注的焦点和主题。从资本逻辑的视阈来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充分体现了商品的特性,是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必须服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规律;资本主义城市

^① 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7—28页。

空间又是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的结合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空间的塑造和生产服从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需求，正是在这两者的推动下才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而在各种资本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尤其是从福特制到弹性积累转变的过程中。

第一节 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又具体地体现为各种商品的集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被商品经济开发的空間所剩无几。正如路易斯·沃斯所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次级关系取代初级关系，血缘关系纽带弱化，家庭的社会意义衰落，邻里关系消失，社会团结的传统基础破坏殆尽……事实上，没有被商品经济开发的人类需要已经所剩无几”。^①而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商品具体表现为住房、车站、码头、学校、图书馆、医院、商店、库房、办公室、剧场、博物馆、公园、交通道路、给排水系统、城市街道等空间设施，也就是哈维所称的人工环境的“第二自然”。在哈维看来，这些空间实质就是商品，是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结合体，这些空间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目的就是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被特权阶级和势力团体所垄断和控制，因而租金就成为了这些特权阶级和势力团体的重要收入和控制其他阶级阶层和团体的重要手段。具体地讲，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的综合体。

^① 路易斯·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载孙逊主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页。

一、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体现商品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体现商品的自然属性。而交换价值指的是当一种产品在进行交换时，能换取到其他产品的价值，它是指物凭借着一种明确的经济关系才能够产生出的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体现为：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商品内部矛盾外在表现的统一体，商品的价值是交换的内容，使用价值是交换的形式。哈维高度评价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理论在分析研究城市空间中的作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辩证关系值得认真思索，因为它既为土地使用的地理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又在从空间角度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土地使用问题的两种方法之间建构起了一座桥梁。”^①

因此，哈维在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也继承了马克思分析商品的基本范畴，把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这个特殊的商品也看作是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不过，与马克思把价值作为解读的起点所不同的是，哈维则把使用价值作为解读的起点，并把它置于一个显著的位置。因为，哈维认为，那种把“价值视为社会关系的产物、把使用价值视为自然之物”的观点是对马克思的线性理解。事实上，使用价值也体现着丰富的社会关系，“使用价值是由现代生产关系塑造的，并且反过来改变这些关系”。^②这样，哈维就解决了作为使用价值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为什么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关系的难题。

在哈维看来，空间是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各种具体形式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57.

^②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7.

的空间都必须建立在一定面积实体的土地之上，所以对土地这个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探讨就显得具有非常特别重要的意义。哈维主张应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联系和统一的角度来分析城市土地使用理论，他激烈反对当代城市土地使用理论中把分析重点“要么集中在使用价值的特点中，要么集中在交换价值的特点中”的片面倾向。因为哈维认为，“一个足够的完整的土地使用理论需要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交换的社会过程”。^①

哈维着重对土地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土地及其之上的设施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土地及其之上的设施不能随意移动。土地及其之上的设施都有固定的地点，这个绝对地点赋予了拥有土地的人具有垄断的权力，他有权决定那个地点的土地的使用。没有任何两个人或物占有完全一样的地点，这是物质空间的一个重要特性。

第二，任何人都离不开土地及其设施这种特殊的商品。不占有一定的空间，人类不能存在；不占用一定的地点及其那里的物体，人类就不能工作；没有一定的居住之所，人类就不能生活。因此，没有一定数量的这样的商品是不可能的，这就为这类的商品设定了一个严格的界线。

第三，相对来说，土地及其之上的设施的商品交换频率不高。在某些商业设施类型中（尤其是与固定资本投资有关的）、在许多公共设施的类型中（比如公路、学校和医院等）以及在房地产市场中，土地及其设施并不是经常作为商品来进行交换的。虽然在房产市场的房租领域，土地及其设施作为商品交换的频率相对要高一些。因此，这种特殊商品形式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辩证关系并不是同一程度地获得了体现，在城市经济中的各个领域它们也并不是按照统一频率发生的。

第四，土地具有永恒性，完善的周期也是非常长的。对个人或社会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62.

来说，土地及其之上的设施的使用权提供了储存财富的机会。许多作为资本的商品都具有这个特性，但是从历史上看，只有土地及其结构才是储藏资产的唯一重要的储藏室。

第五，虽然市场交换不时地发生，但是土地及其之上的设施的使用会经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对土地及其之上的设施来说，它也具有商品这方面的特性，但是，它的交换和使用的频率是非常低的。因此，要为相对较长一段时间来购买土地及其土地之上的商品需要一笔较大的资金。^①

哈维以竖立在土地之上的住房为例，概括了住房的使用价值的具体表现。住房是庇护所，能提供一个不受干扰的独处的地方，一个易于上班、购物、接受社会服务和交朋识友的人口和平台，一个具有物质的、社会的和象征特征的社区和邻里；但与此同时，住房的占有者具有垄断使用一定数量空间的特权，住房也是一个接近污染源、拥堵、犯罪和危险的相对空间。所有这些用途的总和就构成了拥有住房的人的使用价值。但是，由于居住条件不同，不同的人住房的使用价值就不一样。就是同一个居住地对同一个人来说，使用价值也并不是恒久不变的。每一个个体和群体对住房也有不同的使用价值。所以，只有把住房的特点和居住者的特点结合起来进行考虑，住房的使用价值才有意义。

哈维还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角度出发对房地产市场中的众多角色进行了分析，指出不同社会角色都拥有对房屋的独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第一，房屋的占有者。他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和需求对房产的不同方面进行消费。房产拥有者主要关心其使用价值并相应地采取行动；但是，就房产作为价值储藏的设施而言，交换价值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房屋占有者可以通过修缮房屋以便能更好地使用，或者对房屋进行改变来增加它的交换价值。房产拥有者会在以下两点上特别考虑其交换价值：一是在

^① 参见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157-159。

购买时和维修时会考虑他们经济承受能力；二是通过交换价值来获取使用价值。

第二，房地产经纪人或地产中介。他们在房地产市场上主要是获得交换价值，主要是通过买卖房产或充当中介人提供房产服务来获取利润。他们几乎从不关心房产的使用价值，在房地产市场中，他们充当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同时，他们还要获得一定的利润。在房地产供应市场中，他们力求增加产权的交易量以使其业务增加，从而获取利润。产权交易的手段既可能是道德的，也可能是不道德的。房地产经纪人或中介通过鼓励市场行为从而在被动协调的房地产市场中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第三，房东或地产拥有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把交换价值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些部分出租的房东或地产拥有者会同时考虑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作为专业的房东或地主来说，仅仅把房产作为一个交换的手段——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钱和利润。他们会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第一种策略是通过直接购买房产，然后再将其租出去获得一部分收入；第二种策略是通过金融抵押来获得房产再将其租出去，再用租金的收入去偿还贷款。第一种策略是当前收入最大化，第二种策略是使财富增加最大化。无论采取什么样策略，专业的房东或地主都将房产当作交换的手段而不是当作使用价值的手段。

第四，开发商和房地产建筑商。他们主要是通过建造房屋为他人创造新的价值，从而为自己实现交换价值。在实现自己的交换价值之前，购买土地、建造房屋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参与这一过程的公司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必须要实现利润。所以，他们必须形成房产的使用价值后才能确保其交换价值。他们有多种方式达到这一目的，比如通过郊区化，或者较低程度地通过房地产的修复或再开发等手段。如同经纪人或中介对增加产权交易感兴趣一样，地产开发商和建筑商对增长、修复和重建感兴趣。这两种群体都对他人的使用价值感兴趣，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交换价值。

第五，金融机构。由于房地产独特的特点决定了金融机构的重要作

用。房地产拥有者、土地所有者及其地产开发和建筑所需的资金主要依赖于银行、保险机构、建筑协会等其他机构的资金。一些专门机构专门锁定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从根本上讲，金融机构通过为这些部门获得使用价值而创造金融机会，从而获得交换价值感兴趣。但是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了不动产开发的方方面面（比如工业、商业、住宅等方面），从而通过对金融的控制有助于分配土地的用途。这样的决策通常与获利能力和规避风险的能力是一致的。

第六，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主要是通过政治过程参与到房地产市场中。那些对消费者缺乏使用价值的房产，政府会直接介入其中。通过公关行为来生产使用价值（比如提供公共住房）是一种直接的参与行为；但是许多干预过程是间接的，比如通过提供税务减免来保证获取利益或规避风险这种方式，来帮助金融机构、开发商和建筑商获得交换价值。但是，政府有时也会对房地产市场其限制和调控作用。就政府安排许多服务设施、设备和易于通行的交通线路来说，这些都会间接地通过塑造居住环境来提升住房的使用价值。^①

由此可以看出，哈维正是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空间商品——土地和房地产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不同的阶级、阶层、势力集团和群体，为了满足各自对空间商品使用价值的追求，在空间商品价值的基础上而进行空间商品的交换。所以，围绕空间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就成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一个主旋律，而对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势力团体和群体来说，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实现空间商品的剩余价值这个宗旨服务的。

^① 参见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163-166.

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的结合体

要正确地分析城市空间尤其是城市土地使用理论，租金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概念和问题。而且租金的概念在城市空间资本向度的分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哈维认为，要分析城市空间中土地使用的租金，必须以马克思的有关租金理论为基础。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租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租金概念的较为详尽的概括和综合。虽然大量的经典著作中所讨论的都是农业土地的地租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些论点仅仅适用于农业而不是城市土地使用领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地租的概念来分析城市空间。哈维十分认同微观经济学中“租金是生产中稀缺要素的回报，而土地在本质上与劳动和资本并无二异”的观点。因此，在农业中的租金概念，可以同样适合于对城市空间的分析。

哈维对马克思把地租划分为三种类型的观点持一种赞成和认可的态度，即地租可分为垄断地租、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他认为这三种地租类型同样适用于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地块分析。

第一，垄断地租。垄断地租的出现之所以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垄断价格是由购买者的意愿和购买者的能力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价格或产品的价值决定的。凭借垄断价格，土地所有者就可获得垄断地租。在农业中，这种租金形式并不很重要。但是，垄断价格在城市土地和产权的情形中就变得非常关键，这种垄断价格又是与所在土地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紧密相关的，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区域，这些地方房屋和土地的租金只能用“垄断地租”来加以解释。

第二，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级差地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财产私有的背景中形成的。级差地租的概念是与李嘉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只是考虑到了源于土地肥沃程度的差别，而很少考虑后续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所带来的回报的差异。级差地租显然不能进入生产成本或生产价格，因为它是凭借某种优势情形而获得的超额利润。马克思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表明不同地段土地的肥沃

程度不同，其剥削的特点也不一样，与此同时，由于所投入的资本不同也能产生不同的级差地租类型。哈维在继承马克思有关级差地租的有关思想时，还从关系空间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进行了独特的解读，认为“级差地租在关系空间中获得意义，它是由不同地点的生产力差别所构成的，它也可以被空间地整合进交通成本的关系之中。似乎，不了解关系空间，就不能定义级差地租”。^①

第三，绝对地租。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是指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垄断，租种任何土地都必须交纳的地租。绝对地租形成的条件是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或社会的资本平均有机构成。绝对地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和由此决定的缴纳地租的必要，使农产品必须在生产价格以上按其价值售卖。

在马克思看来，不管租金采用的是垄断地租、绝对地租还是级差地租，它们都是以土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垄断为前提和基础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存在是靠生产方式的私人所有的手段来维持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不能破坏私人财产制度。对此，哈维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有着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并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和发展的角度对其作了分析和总结。他指出：“马克思将租金视作不同方式和条件的产物。对所有租金类型来说，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②因此，“资本主义愿意为生产付税或租金，并将其作为价格的一部分，这也是为其自身的存在提供法律基础。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税收或租金进入生产成本里面就成了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这一点与级差地租有区别”。^③

哈维认为，租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实现形式还是有所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81.

②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78.

③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82.

区别。垄断地租和绝对地租在当今比以前更加重要，这部分源于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了，且城市在地理上表现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如今，个人或阶级的垄断地租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由于所处的地方、活动的具体形式、消费收入群体的特点、获得租金的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所支配的公共政策等这些方面都有其特点和差别，因而它们的实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从空间的本质和财政收入流通这两个角度来考察城市空间中租金的本质，是哈维租金理论的一大亮点。

哈维认为，要正确认识租金的本质，还必须把对租金概念的分析 and 空间的本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因为这两个概念具有特殊的联系。私人财产的垄断特权源自于某种方式的制度化的绝对空间的特性。在社会活动领域，绝对空间是作为垄断租金的基础而出现的。虽然绝对空间是通过私人财产的垄断特权来获得抽取税收和获得垄断租金的，但是绝对空间是在不同地点的不同活动区域与空间的关系特性的相互作用中，作为一个指导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原则而出现的。相应的，关系空间在不同地段的租金价值中也起着主导的作用。哈维一直在反复提醒我们，城市空间并不是绝对的、相对的或关系的，这三种情况都依赖于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因此，在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应当更加注意把社会分析和空间分析搭配起来、协调起来，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要把空间类型的分析和地租类型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哈维还主张只有将财政收入流通与资本流通相区别，才能正确分析和认识城市空间中的租金。在哈维看来，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有的财政收入形式——工资、企业的利润、利息、税收、租金等等——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都有其来源；但是，一旦被分配后，这些财政收入就可以自由地流通，因而就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次级剥削形式。因此租金和资本流通一样，也很容易从财政收入中攫取。地主不会关心其租金到底来源于那一种形式，但是在理论研究方面作出这两种形式租金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详细考虑财政收入的流通，就不能理解

这种租金形式的社会意义”。^①

因此，按照哈维的理解，作为财政收入流通的租金是与社会意义息息相关的。由私有财产授予的垄断特权始终是地租的基础。但是，租金不仅仅是资产阶级从剩余价值中的扣除，工人和一些资产阶级成员，比如金融家、教授、退休的商人或其他地主，国家以及其他文化宗教和教育组织都有可能获取租金，所以租金都是从各种财政收入的流通形式中获得的。而且土地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形式、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任何人只要有积蓄就可以投资并获得租金，并且可以投机于土地价格。即使是工人，他只要有一小块土地和一笔资金也可以进行土地方面的投资和投机并获得租金。在城市空间的现实中，拥有小块的土地和财产交易及租金往往成为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上层上升跃迁的主要渠道。因此，租金主体的多元化打破了地主阶级独霸天下的局面。由此可以看出，租金获得了较之传统意义上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哈维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租金理论，认为其可贵之处在于，他把看似一样的东西分解成各个部分，并且将这些部分与社会的其他结构联系起来。哈维指出，马克思有关垄断地租、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概念包含了经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所有思想，其有关地租的思想和理论达到了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哈维认为马克思的租金理论是不完整的，也有尚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因为马克思只讨论了资本的流通而把对财政收入流通的分析排除在外。因此，在分析探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不能简单采用马克思的范畴来分析整个土地和财产市场的复杂性，更多的东西应该包含进来，尤其是面对这种无耻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对有关财政收入流通的分析就应该纳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地租理论分析中，尽管它始终与资本流通有关并以资本流通为基础。因为通过对租金是如何从财政收入流通和资本流通中获取的仔细考察会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土地市场功能的现象；与此同时，财政收入流通视角的分析又不会损伤马克思对地租理论深刻的结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98.

构性洞见。

与此同时，哈维还指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租金面临着两难的矛盾和困境。一方面，当使用决定价值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租金作为一个引导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配置手段，具有社会的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当价值决定使用时，土地的分配使用则是在投机盛行的预兆下发生的，这是一种人为导致的稀缺性，这就失去了生产和分配组织的高效率。一般来说，社会政策应当鼓励前者而抛弃后者。但遗憾的是，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实践中，私有财产的垄断权可以通过无数策略在它的经济形势中得到实现。租金不以这种方式获得，也会以其他方式获取。社会政策，无论怎么制定，在面对这些无限的策略时也是显得非常无助。正是这种客观原因使得资本主义的城市形式显得同质化和均质化，不管这些城市在那个地方，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区生活模式以及法律及其行政制度有多么的不同。

三、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

由于哈维长期对《资本论》进行持续的阅读和研究，因此他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把握得非常精准和到位。他把社会剩余界定为“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为某种特殊社会目的而进行的生产中，超过劳动力的生活费用和再生产的那部分劳动力”；把剩余价值定义为“在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表现出来的剩余劳动”。他指出，马克思有关剩余价值的概念主要出现在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实现形式有三种：租金、利息和利润。剩余价值的数量依赖于有必要满足劳动力的社会和生理需求的数量。

在城市出现和起源中哪一方面的因素起决定作用，这始终是不同学者争论的主题。对此，哈维不主张把社会剩余当作城市出现的绝对有效的因素，因为“对城市化要依赖于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在空间的某一点的集中，因此完全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社会剩余被使用，但它仍然处于分

散的状态”。^①也就是说，生产剩余的能力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不是城市出现的唯一条件和充分条件。对城市的出现来说，从互惠主义的经济结合方式（哈维所理解的互惠主义的经济结合方式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占有和分配特征）转向分配制的经济结合方式（分配制的经济结合方式主要是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占有和分配特征）的条件非常关键，这些条件有助于剩余产品集中在少数地方和少数人的手中。但是，只有市场交换模式出现和比较发达的条件下，才会导致剩余价值的持续集中，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城市才会出现。所以说，城市化是伴随着市场交换这种经济结合方式以及生产方式的等级制和差异途径而出现的。

但是，哈维也不得不承认，城市的起源和出现与生产剩余的能力和剩余产品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哈维眼里，城市化的出现和对剩余产品的剥削和占用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他总结道：“如果剩余价值被当作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可以用剩余价值的创造、占有和流通来进行分析。”^②

在探讨城市起源问题时，哈维的观点与马克思基本是一致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社会分工的视角对城市的出现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城市的出现与社会分工和生产剩余的能力及其剩余产品出现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③而城市是伴随着从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即部落所有制形式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26.

②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31.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521页。

向第二种所有制形式即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过渡而出现的。正是在这两种所有制转换的过程中，社会分工逐步扩大和发达、生产剩余的能力逐步提高、剩余产品日益丰富，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城市才得以出现和逐步发展。在部落所有制中，人们的谋生手段主要是狩猎、捕鱼和畜牧，此时的分工仅限于家庭中已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但是，在家庭这个社会结构逐步扩大的过程中，由于人口的增长、战争及其贸易的发展等因素导致了奴隶制的逐步形成。而在古典的公社所有制中和国家所有制中，孕育着动产所有制和不动产所有制等反常的对立的所有制形式，随着这些反常的对立因素的逐步扩大和发展，社会生产剩余的能力也日益提高，剩余产品也日趋增多，于是，“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后来，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出现了。在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①

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剩余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前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而逐步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颠覆了封建的政权，建立了代表广大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利益的政权，这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政权保障。工业革命引起了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使以机器为主的工厂制取代了封建社会时期的手工工场，这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这样城市扩张的动力也不断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化和大量的人口向城市转移，于是，城市这个特殊的空间就与剩余价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城市既是一个生产剩余价值的地方，也是一个榨取剩余价值的地方。从此，城市就成了资本积累最为重要的空间和领域，地租、利息、商业利润、建筑环境的生产和国家的权力与职能等等都沦落为资本积累的仆人和奴隶，它们自始至终都屈从于这种资本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导的逻辑。从中世纪城市中以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巴洛克规划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城市过渡过程中，经济力量逐步转移到了重心位置，重商主义也逐渐成为国家政策的主导和重心。资产阶级必须打破一切中世纪的条条框框，于是象征古代城市封闭特征的城墙被拆除了，从这以后，城市扩张的动力主要来自商人、金融家、地主和房地产开发商。

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剩余价值获取的必要条件就是对城市基础设施持续不断地投资，因为“如果先期不具备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条件，那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核心的特征的复合增长率，将没有办法实现”，而且“作为既有环境的构成要素，上述范围广博的基础设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循环和积累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必要物质基础”。^①那么在城市空间中对城市基础设施不断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哈维看来，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率无疑是最为直接、最为重要的动机和目的，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融资的力度必须与一定的经济复合增长率的速度相适应，从而确保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剩余价值的获取和实现。因此，无论是小型企业还是行业巨头，都把技术和组织创新不仅视为一种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更将其视为一种竞争手段和企业生存的基本技能。

那么，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实现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是什么呢？哈维给出的答案是技术和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哈维主张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是缓解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资本和自然之间以及实现剩余价值和利润矛盾的重要举措。哈维认为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完美地诠释了资本主义企业为实现超额利润而密切关注技术和组织创新的动因。因为“那些采用了先进技术设备或企业组织形式的资本家往往可以获得比其竞争对手更高的利润率，并且最终脱颖而出”，^②对此，哈维认为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相关段落对此作了深刻的阐释——“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7 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0 页。

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①

哈维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资本主义与所有其他的生产模式都完全不同”这个问题，他认为答案在于“人类对创新的永恒的、狂热的追求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这种狂热才能发展成为人类演化的核心驱动力。绝大部分既有的社会制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保守的，它们倾向于维持现状，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压制人们对变革和新理念的渴望”，^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变革和创新成为社会创造财富和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和生存技能，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私人财产权、个体主义和自由市场及贸易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组织创新的最大特点在于国家的积极参与和不遗余力的支持。国家不仅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来为技术和组织创新提供制度保障，而且大量的政府机构都投身到技术和组织创新这股浪潮中来，“政府机构的很多部门，涉及医疗、食品、农业、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各个领域，以及相对更传统的军队和监察部门，在准公共科研院所的支持下，对资本主义重要产业的技术及组织方式的创新，发挥了相当强的影响力”。^③

那么，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和组织创新的作用呢？哈维认为，需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眼光来分析和看待这种现象。他主张这种技术和组织创新兼具创造和毁灭两种功能，是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就创造性而言，技术和组织创新不仅带来了资本积累的呈几何级数增长，找到了过剩资本吸收的新的途径和领域，带来了丰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而且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③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术和组织创新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就毁灭性而言，技术和组织创新导致投机性活动越来越强，从而为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在所有的技术和组织创新活动中，哈维认为最饱受诟病的就是金融创新。因为在金融领域，普通大众不得不遵循所谓的“专家法则”，“这一法则完全不考虑如何保证普通公众的利益，而是处心积虑地利用专家手中的垄断权力，为雄心勃勃的交易者赢得巨额红利”，^①而民众自身却陷入盲目受专家支配和摆布的黑幕之中。通过金融创新后，期权和衍生品交易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资本规避监管和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动状态，并最终引发了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

从哈维对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组织创新的分析和批判的路径来看，基本上遵循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获取的层层递进和不断深入的过程。从资本的逐利性和扩张性分析开始，马克思认为生产剩余价值获取剩余价值是每个资本家的最终目的，而剩余价值获取的手段遵循的是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再到超额利润这样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剩余价值获取手段的幕后推手和动力就在于大规模的采用先进的机器、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资本家能够在残酷的竞争中获得相对的优势地位并最终获取超额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谈到了协作这种组织创新对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的作用。所谓协作，是指“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劳动形式，^②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形式“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③而协作的重要作用在于“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④协作给资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页。

本主义管理职能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①

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剩余价值的内在联系，这从另一种角度佐证了哈维的观点。

首先，资本无孔不入，它就好比一种化学溶剂，对城市空间的各个阶级、阶层、群体和个人都进行渗透和影响。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抽象的市场代替了中世纪城镇上具体的市场。在抽象的市场中，人们进行交易的目的是孜孜不断地追求利润，从而积累更多的资本以在城市空间中追求更多的利润和价值，资本的主人所信奉的只有贪婪及其对金钱和利润的迷恋。正如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对现有城市结构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到郊区去，避开市政当局的一切束缚和限止，要不然就彻底破坏老的城市结构，或使城市密度增加到远比当初设计的为高。新的经济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城市的破坏和换新，就是拆和建，城市这个容器破坏得越快，越是短命，资本就流动周转得越快。”^② 所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发展的最终产物就是一个孜孜求利的经济。于是，“资本主义破坏了城市生活的结构，把它放在一个新的不具人格的基础上，即放在金钱与利润这个基础上”。^③

其次，城市空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充分利用来作为商品开发，土地得到高度利用。那里可以用的土地越少，那里的租金就越高，于是城市空间成为谋求利润的场所。“人们住得越拥挤，房地产主的收益就越大，而房地产主的收益越大，土地的资本价值也越高，如此恶性循环下去。”^④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②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页。

③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32页。

④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因此，城市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当成一个公共机构，而是被当作一个私人的冒险事业，为了个人的一己利益而不惜牺牲公众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利益。

最后，新的商业精神特点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新的商业精神兼具“正规和可以计算”及其“投机冒险和大胆扩张”的特点。从17世纪开始，资本主义把城市空间中的建筑地块、街区、街道都作为可以买卖的抽象的单位，城市当局日益失去对土地的控制能力。城市土地成为像劳动力一样的商品，土地的市场价值成为其价值的主要表达形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城市的不断扩张是以牺牲城市文化和记忆历史为代价的。反映在城市规划上，就是用标准化的部件来规划城市。城市空间被当成可供售卖的物质团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城市规划表现为向外的漫无目的的蔓延。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城市规划就是以“棋盘格”为特点的城市规划。从商业原则来看，这种规划适应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价值转移、加速扩张和人口剧增的要求，也符合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和团体的利益诉求。这些都是棋盘格规划相较其他城市规划所具备的优点。

但是，在芒福德看来，这种规划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造成了大量的城市空间的浪费和城市运转的低效率，因为在这种规划的城市空间中，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商业活动的需要，每一个区或地段只考虑土地利用效率，并千方百计地提高土地价格；而且这种城市规划为城市日后的有机发展健康发展和长远发展留下了许多后患，这也为城市空间中某些既得势力集团进行提高地价、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等行为提供了机会。关于什么是合理的城市规划，刘易斯·芒福德早就对我们提出了忠告，他说：“规划天生是个综合的过程，包括许许多多需要、目的和功能的相互影响，而私人企业家搞的规划只是为他自己有限的目的搞零敲碎打的修改。”^①

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发展的现实来看，剩余价值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像河流、道路和交通这样的城市动态系统，也就是那些生产、处理和吸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441页。

收城市剩余价值的经济技术和制度条件。我们从城市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便捷的交通更容易移动、榨取和集中一定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城市空间中良好的交通设施能够对剩余价值的移动、榨取和集中起到促进作用。如果缺乏一定的交通条件，必然会对城市空间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集中带来严重的滞后作用，甚至从根本上讲，会威胁城市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交通成了实现剩余价值和追逐利润的目标。为了使交通变得更为便利和快捷，往往建立长长的大街、直线型的大道，而不惜牺牲居住区居民的利益。这样，过分发展的交通网虽然增加了特权阶级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群体的剩余价值，却造成了城市的过分拥挤和对广大普通居民利益的损害。

应当说，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剩余价值的分析是相当有见地的，他的分析和论述深刻地反映了当今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现实和本质。为了实现城市空间中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呈现出盲目扩张的态势。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不但在地面上向水平方向发展，而且还表现为以电梯、摩天大楼、地下通道、隧道、地下商场、车库和地铁等为代表的向上或向下的垂直发展。总之，力所能及地、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寸空间来创造和增加城市空间中的剩余价值。这样，城市空间发展的方向就呈现为“一方面向四面八方扩大，一方面向高空发展”的两种并列态势。虽然这种城市空间扩张模式带来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和利润，但是这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城市的膨胀和拥挤，城市也越来越成为污染严重和公共危害比较突出的区域和空间，这一系列困扰人类发展的城市问题亦对城市的有机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第二节 作为资本主宰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哈维将城市化视作资本地域分布的特殊情形和吸收过剩资本的重要途径，在城市化过程中吸引和聚集了相当大比例的劳动力和资金。因此，

他主张大都市始终是货币经济的所在地，作为货币转换形式的资本，它深刻而全面地渗透进了城市空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城市的物质景观和精神生活日益被资本的强势逻辑所主宰。现代社会学家齐美尔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精辟地指出：“货币经济统治着大都市；它已经代替了过去的家庭生产和物物交换；它日益减少了由顾客订货的工作数量。显然，实用主义态度与货币经济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货币经济在大都市占主导地位。”^①与齐美尔这种思想如出一辙的是，哈维把理论关注点聚焦于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过程，认为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及其生产是受“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内在法则支配的，哈维将资本作为一种塑造城市人工环境的决定性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独特的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与此同时哈维也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一、“为积累而积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基本法则

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一个由众多不同元素所构成的复杂的人工环境 (build environment)，这些元素主要有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仓库、下水道、住房、学校、办公楼、商店和公园等等。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实质上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人工环境要素所组成的人为构建的“第二自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各种人工环境的生产、创造、交换和消费的过程。而这种独特的物质景观是由资本所塑造的，因而它必须受资本的控制，必须遵循资本积累的根本法则。

哈维坚持主张，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必须结合资本积累的相关理论来进行分析。“为积累而积累”这个规则是由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竞争所强化的，这不以资本家的个别意志为转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推

^① 格奥尔格·西美尔：《大都市和精神生活》，载孙逊主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2 页。

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采用至少不低于社会平均效率的劳动过程。但是那些积累速度越快的资本家容易把那些积累率慢的资本家排挤出去。对个别资本家来说，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永恒的动力，那就是在劳动过程中通过增加相对社会平均的剥削率来提高资本积累率。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在不断的城市化过程中得以塑造的，而城市化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因此，哈维强调指出，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城市化，不能离开马克思《资本论》那样极富洞察力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有关资本积累的理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剩余价值形成的过程，也是资本利润形成的过程，这种通过资本积累过程获得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又不断地投入到更大的资本积累过程中，以求获得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这一过程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地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哈维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城市化的研究就是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城市化的过程既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流通的物质基础产生，又关乎劳动力的转移、商品和金融资本的流通、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变换，以及以经济利益为轴心展开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等方面的内容。因此，为积累而积累是支配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基本法则。

虽然个别资本家之间存在着残酷的竞争，但是所有资本家有一个共同需求，那就是为资本的更好积累创造条件。由于资本所建立的生产系统是建立在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物理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个生产系统又通过大城市中心的聚集活动，促进了企业和集体规模经济中日益增加的劳动分工。所有这些就意味着要创造一种人工环境，作为一种物质基础设施来服务于生产。通过为生产创造人工环境，生产资本的运用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同样的结论也适合于消费人工环境中的投资。因此，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必须创造出为其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提供物质基础的和作为使用价值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要创造出大量的人工环境。

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城市的发展？进一步讲是什么力量在不断地积累资本，从而在这个特殊的空间和地域中获取利润

及剩余价值？对此，哈维从城市建设中的获益者的角度来分析和解答上述问题。他认为，“尽管城市化进程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在背后依然隐藏着一股重要的力量，不管是研究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过程，还是探讨资产阶级权力的演化过程，这股力量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①那么，是哪些具体力量在推动资本的不断积累？在哈维看来，主要有土地所有者、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这三股力量。对土地所有者来说，“他们可以从土地价值的急剧增长中获益，也可以从土地租金及土地上所包括的‘自然’资源的价格上涨中获益”，^②而地租和房产价格的上涨主要由对土地的投资情况和空间关系的改变情况所决定和影响。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他们主要是以资本在地域扩张的直接力量的面目出现的，他们积极投资于土地、房地产、矿山及原材料等项目。投机性是房地产开发商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他们主要对城市空间中的房产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当城市空间可资利用的资源有限时，他们会把目光投向郊区。对政府来说，它是土地所有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的依靠力量，“房地产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往往通过行贿、对政客的竞选宣传活动提供资金等方式，来确保政府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③而城市化对证据来讲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当前各国政府为了支撑它们衰败的经济，能够选择的刺激工具中的重要一种”，而且，“正是通过地域的扩张，土地所有者（和开发商、建筑商，当然还有金融从业者）在解决了过剩资本吸收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这个阶级的地位”。^④

哈维认为，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的详细分析揭示了一个中心矛盾，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③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

④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178页。

这为我们认识城市空间中的人工环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一方面，固定资本提升了劳动生产力，因而有助于资本积累；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使用价值的固定资本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把自己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只有这样投在固定资本中的投资才能够全部得到偿还，哈维把这个时间称之为“分期偿还时间”(amortization time)。如果在旧的固定资本分期偿还结束以前，出现新的和更具生产力的固定资本，那么旧的固定资本的交换价值将会贬值。阻止这种贬值的趋势会妨碍生产力的增长，因而也会阻碍资本的进一步积累。由此可以看出，对新的和更具生产力固定资本形式的追求——受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驱动——加速了旧的固定资本的贬值。这种矛盾和两难困境在交通领域内体现得最为明显，一方面，资本家为了克服空间距离，不断地创造出各种方便快捷的交通设施来“以时间消灭空间”，这就大大地加速了资本积累；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不能移动的交通设施及其嵌入在这些空间结构中的附属设施又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巨大障碍，于是为了迎合更快的资本积累又不得不破坏这些交通及其附属设施。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得不在保存人工环境中过去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与为了进一步为积累打开新的空间不得不毁坏这些投资的价值的两难之间进行协调”。^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斗争，在某个特定时刻建构的适合于自己条件的物质景观，又不得不摧毁它。所以，人工环境中的矛盾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它所产生的历史地理景观中的一种具体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在塑造和推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的潜在紧张关系之中存在着两种矛盾。第一个矛盾，空间只能通过生产空间来克服。因为减少周转时间的竞争导致了超越空间障碍和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压力。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变革、劳动分工和技术的变化以及对资本家和劳动者来说地点需求的变化，这些都持续地使空间关系和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地理景观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只有把一定的生产力镶嵌在一定的空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25.

间中，空间障碍才有可能得到克服。由于镶嵌在空间中的死劳动（资本）最终成为克服空间的障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为了生产和发展，资本主义除了毁掉其中的一部分外别无选择。

第二个矛盾，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只能通过空间修复来解决，但是这样做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把它的矛盾转移到了更大的范围内，并且赋予这些矛盾更大的范围。资本的过度积累和劳动力只能通过地理的扩张得到吸收，但这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新的环境和空间里得到再生产，这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危机。

但是，这两个矛盾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互联系。一方面，资本主义为了克服其过度积累内在矛盾，它的空间修复的需要越强烈，通过空间生产克服空间障碍的紧张关系就越深；另一方面，过度积累越快，地理扩张的步伐就越快，地理景观转变的速度也就越快，以至于为了给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新的地理空间构型让道，那些包含着死劳动（资本）的地理景观的价值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些地理景观中的越来越多的资本不得不被摧毁。为了生存和发展，资本主义日益需要各种层次的毁坏。

“为积累而积累”这个支配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基本法则，还必须克服人工环境投资中所包含的独特矛盾。人工环境中的投资是按照一定的逻辑运行的，人工环境中必然会出现过度积累和贬值。如果国家在促进大型的公共工程中没有发挥主导作用，个别资本家一般又对人工环境投资不足，就有可能出现过度积累的情况。这就表明，过度积累能够通过金融和国家机构或在信贷系统内创造出一种虚拟资本的形式，弥补人工环境中的资金不足，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度积累问题。但是进入人工环境投资的流动要依赖于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存在，也要依赖于把这些剩余价值和劳动投入经营的机制。所以要保证这些投资的成功，那么其投资必须具有生产性。如果这些投资不具有生产性，那么，附加到人工环境上的交换价值将不得不下降、减少甚至完全丧失。金融系统中的虚拟资本将面临这种问题，金融机构和国家机构也将面对这种财政困境。人工环境中资本的贬值并不必然会损害使用价值，因为这种作为贬值资本的物质资源可

以作为商品自由地交换，这就有助于为重新建立资本积累再次奠定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了资本积累的原因、过程、实质和前景，这构成了哈维分析探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积累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

资本家之所以要不断积累，其原因在于对资本逐利性的追求、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冲动以及应对残酷竞争的需要。因为“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资本家的动机“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①为此，资本家就不得不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再生产过程的资本，而且这种再生产过程是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不但要把剩余价值转化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还要最大限度地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转为资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资本家）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②因此资本家尽可能节省剩余价值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而尽最大努力地扩大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和再生产部分的部分。对此，马克思用形象的语言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③

那么，资本积累是否是无限制的和没有边界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否能够利用资本积累的规律而永恒的延续和存在下去？马克思从资本积累趋势的角度给予了否定的回答。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依靠资本的强制奴役劳动者的社会制度，而奴役和剥削的手段主要依靠资本的集中来进行，这势必会导致资本愈来愈集中少数资本巨头手里，从而导致垄断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在马克思看来：“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6页。

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①而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②

从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资本积累的原因、特点和矛盾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分析方法对其影响至深。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资本积累矛盾的分析，基本上沿袭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矛盾理论。哈维的创新点在于他是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塑造、变化和面临的矛盾来入手考察资本积累的，这也是他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要体现。

二、金融资本：形塑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决定性力量

城市化与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关系，是分析探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不断被塑造和变化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关系。城市空间代表了资本投资的一种场所，资本投资与城市空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资本投资改变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的具体用途，资本对城市空间的塑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特定的城市空间又为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增殖提供了有利条件。哈维主张城市化是吸收剩余资本的重要空间和地域，因为只有资本的支持下，各种工程和城市基础设施才能得以开启，而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取利润，这是资本逻辑的内在性使然。在所有的资本中，金融资本无疑是塑造城市空间最为根本的决定性力量。在哈维看来，金融资本的不断壮大和创新是与政府机构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抵押债务的证券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化、通过创建衍生品交易市场分散投资风险等在内的金融创新活动，它们无不心照不宣地（现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这导致大量的过剩流动性进入了城市化过程及世界各地环境改造进程的各个领域”。^①

哈维在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社区和工厂的分析与研究中得出结论——组织生产和实现社会价值的最终权力存在于金融资本家的手中，因此，“有必要弄清楚金融资本对工业生产和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施加霸权性权力的资本主义内在转化过程。在此我能做的就是为这一内在转化的逻辑提供一些空间的线索”。^② 哈维所理解的金融资本是指生息资本和资产阶级权力集团的结合，他指出：“有两个关于金融资本的概念：第一个是生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是指资产阶级中制度化的权力集团。其中的任何一个概念都不完整。我们必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③ 从哈维对金融资本的理解可以看出，他是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相关理论。

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金融资本的形成规律最早是由马克思通过揭示货币经营资本的规律而得到阐述的。从马克思对货币经营资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金融资本内在形成的原动力在于社会分工对资本裂变的推动。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正是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才导致了货币的产生。当货币进入商品生产领域以求实现价值增殖和创造剩余价值时，货币就转化为了资本。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货币资本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形态发挥其独特的职能。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产业资本的一部分，进一步说，还有商品经营资本的一部分，不仅要作为货币资本一般，而且要作为正在执行这些技术职能的货币资本，不断处于货币形式。现在，从总资本中有一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84.

③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320.

定的部分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分离出来并独立起来，这种货币资本的资本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完成这些活动。”^① 马克思这里所指的这种货币资本就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主要职能就是为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服务并要瓜分其剩余价值，这也是现代金融资本产生的雏形。

早在 1910 年，希法亭就提出了金融资本的概念并对其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② 希法亭将通过这种途径转化成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称为金融资本。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希法亭的关于金融资本的概念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没有把垄断这个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因为“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产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③ 由此可以看出，金融资本是在垄断的基础上，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哈维把金融资本理解为生息资本和资产阶级权力集团的结合，也正确地把握了金融资本这个概念的实质。

金融资本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运动中的货币资本转化形式，它具有职能资本的属性。但另一方面，金融资本还具有非职能资本的属性，具体体现为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提供专业化、产业化的金融服务。从剩余价值的角度看，如果说产业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商业资本是实现剩余价值，那么金融资本则是为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实现提供必要的信用条件。

哈维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金融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1 页。

② 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52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13 页。

不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是关注的焦点；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晚期，各个方面的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工业资本家擅长于直接生产，而不能控制和管理生产过程中的总体性，所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资本（通过工业的、金融的和政府的机构运作）已经以一种霸权性的力量的面目出现了”，^①这对城市生活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致使都市生活经历了一个转换过程。以前是表达工业资本家的生产需求的，现如今转而表达了金融资本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而这个金融资本是由国家支持的通过生产过程总体性出现的。

哈维把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积累资金的通道主要归结为两种。一是通过直接意义的生产，即以工厂为基础的剥削来积累资金；二是通过新的消费方式和社会需求的生产来积累资金，这主要体现为以社区为基础的剥削。但是，当金融资本力图管理和控制整个生产过程时，它并不在乎积累资金来源于通过降低工资的手段而来的直接意义上的生产，还是通过操纵消费领域的间接生产。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金融资本对城市化的意义在于，它催生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新的社会需求的生产，因而城市领域也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场所。

关于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所起决定作用的实证分析，哈维在对拿破仑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空间改造的分析中有过精辟的论述。

在第二帝国时期，巴黎金融主要操纵在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上层银行界和以佩雷尔兄弟为代表的货币底层结构的手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保守立场截然不同的是，佩雷尔的主题是资本的联合，即对未来进行庞大的投资。第二帝国时期的主要问题是要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在政府的支持下，佩雷尔兄弟成立了动产信贷，这个机构逐步演变成为一家投资银行，它持有各家公司的股份，并为这些公司的大规模发展筹集必要的资金。为了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力，动产信贷还兼并了许多金融机构，在1852年12月成立了为土地和不动产作抵押的土地信贷这个金融机构。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88.

在政府支持下，通过佩雷尔兄弟推动下的金融机构兼并和重组所成立的新的金融组织对巴黎的城市空间改造有着极大的影响。正是依靠动产信贷和土地信贷等金融机构提供的强大资金支持，奥斯曼的大规模改造巴黎城市空间的计划才得以顺利实施，也才有里沃利街、香榭丽舍大道、卢浮宫饭店、歌剧院这样规模宏大的建筑。在哈维看来，“这些组织对巴黎的转变有着极大的影响。的确，如果金融机构不进行重组，则转变将不可能维持原先的步调，不仅是因为巴黎需要贷款……也因为奥斯曼的计划所开启的空间需要金融力量去开发、建设、占有以及经营”。^①因此，佩雷尔兄弟成为了奥斯曼改造巴黎和重塑巴黎城市空间的得力助手。

但是，哈维在肯定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改造所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金融资本潜在的风险与矛盾：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竞争激烈的内部矛盾的回应金融资本形式，其本身是不稳定的，而且被矛盾所围绕和围攻着。虽然把货币作为一种独立之物来对待是必要的，但是在这种只追求财富的形式而不追求财富的内容的过程中，会损害价值的生产。货币的这种异化的又至高无上的权力，虽然有助于发挥金融资本作用的机构和制度的创建，但是它不是和价值的生产连接在一起的。正如哈维所深刻指出的那样，“货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权力的最高表现，本身就成为了贪欲、贪婪和欲望的对象”。^②正如哈维在分析第二帝国时期的金融资本在城市空间改造中所显现出来的投机性和风险性时所强调的：“信贷体系通过资本联合而合理化、扩大化与民主化，但它却存在着不受控制的投机风险，除此之外，所有储蓄金都被吸收到一个集中而等级化的组织体系中，这使底层的人更容易受到具有金钱力量者独断专行、反复无常的伤害。”^③2008

① 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②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7页。

③ 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从现实的角度印证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寄生性和欺骗性。正是针对在当今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注重虚拟经济忽视实体经济的现状，哈维深刻地指出：“事实上，努力实现价值但不生产价值的这种恒久趋势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主要的矛盾。”^①

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金融资本与城市空间的塑造变化互动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对社会的统治和剥夺的重要特征。应该说，哈维的分析框架和基本逻辑也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蓝本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资本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是以货币的权力为前提和基础的，资本的权力是货币权力的扩展和延伸。货币是商品交换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抽象的、独立的、控制生产者和交换者的一种独特力量。从商品生产者的角度来讲，只要把其私人劳动转化为以货币形式回收为目的的社会劳动，其商品生产活动才能算是成功的。因此，货币成为了一种超越其他所有商品的一般价值符号，谁拥有和占有货币，谁就拥有支配控制他人的权力。结果，货币的出现就是那种商品的内在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转化为了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于是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目的，交换价值才是最终目的，每一个商品交换者都期望能从交换中获取最大的利润。这样，货币就获得了似乎是无所不能的权力，人们对货币也就顶礼膜拜起来，马克思把这种对货币的迷恋或崇拜称为货币拜物教。

怎样理解货币拜物教这种“神圣”的权力，马克思认为“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②因此，要理解货币拜物教就得理解商品拜物教。要了解商品拜物教就得对商品的内在本质有所认识，马克思认为，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88.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① 由于生产者不懂商品的这个奥秘，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② 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实质。因此，货币拜物教指的是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也具备与普通商品一样的“用物的外观或物的关系表现劳动的社会规定或社会关系”的特点，货币也因而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外衣从而导致人们对它的盲目崇拜。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权力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权力更是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权力，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对社会的剥削和掠夺表现从未有如此之甚。现代金融资本是建立在以银行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信用制度基础之上的，最突出的表现是“银行收集、集中、分配货币，将闲置货币转变成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它也由货币资本中介变成了能动的社会资本总管理者”。^③ 握有金融资本的银行，通过为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贷款从而将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来获取利润。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持有金融资本的银行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制造和控制票据、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形式来大规模攫取剩余价值和利润。金融资本不断扩张和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终会导致金融寡头的出现。金融寡头也通过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和创造及控制虚拟资本的方式赚取利润和剩余价值，所不同的只是相较于一般的金融资本其剥夺程度更甚、操控范围更大、社会影响更深。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③ 陈人江：《金融寡头何以能掠夺和统治社会——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视角》，《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三、“三级循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资本循环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要实现剩余价值和利润，就必须不断地运动，也就是资本必须不断地循环和周转，一刻也不能停止；否则资本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哈维关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正确把握住了马克思的关于资本运动的精髓和实质，但也有其自身的内容和特色。

资本的第一级循环。哈维把马克思所讲的那些发生工业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动和流通称为资本的第一循环（Primary Circuit），也就是用于普通商品生产的那部分资本。哈维主要通过《资本论》三卷中的内容考察来分析资本的第一级循环。哈维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主要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也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创造过程，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维持和继续，资本积累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主要考察了资本在扩大再生产模式中生产和消费的比例问题，在生产和消费间必须要维持一个合适的比例，否则就会潜藏着危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主要分析了利润率下降趋势及其制约因素，这就导致了个别资本家和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指一种过度积累的趋势，它主要表现为商品的过度生产、利润率的下降、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的出现。因此，在哈维看来，在资本第一循环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矛盾，那就是资本过度积累所形成的过度积累危机。

资本的第二级循环。哈维把那种流入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形式的资本流动称为资本的第二级循环。哈维创造性地把固定资本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和为生产提供物理框架功能的资本，后者就是他所称的人工环境。他认为在消费方面，也有一个同固定资本平行的结构，一些项目局限于消费过程，而另外一些为消费提供物理框架，哈维把后者称之为消费中的人工环境。资本的第一级循环和第二级循环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处于第一级循环中的过度积累资本为资本进入第二级循环提供了可能和前提；与此同时，资本的第二级循环又恰恰是解决资本

的第一级循环中出现过度积累问题的有效办法。从资本的趋利本性来看，当第一循环中的工业资本回报率下降时，资本就会自动从第一级循环进入第二级循环。1945年以后美国出现的郊区化，就是资本从第一级循环进入第二级循环的生动体现。郊区化开辟了新的投资方向、刺激了其他工业产品，比如汽车和石油等的需求，不仅如此，郊区化对消费资金项目的投资还发挥了保持政治稳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个别资本家发现这种转换的障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些领域的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很难用普通的方式定价，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工环境又是由资本家集体使用的。由于这些障碍的存在，个别资本家不能为这样的生产提供集体需求，因此，“进入第二级循环的资本流动的条件就是存在一种功能资本市场，或许国家愿意为人工环境中的长期大规模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由于货币及其信贷的生产是一个相对自治的过程，所以“金融机构和国家机构不得不作为一个神经中枢，来管理和调节资本的第一级循环和第二级循环的关系”。^①

资本的第三级循环。哈维认为，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资本流通过程必须包含资本的第三级循环理论，它既包括科学和技术领域内的投资，还包括像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军事领域和国家机器的投资。由于资本第三级循环需要的资金数目非常庞大，纵使个别资本家怎样重视，他都很难把资本投入到第三级循环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家只有将自己组织成为一个阶级——通常通过国家政权代理人的形式——才能找到投资于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渠道，才能找到提高劳动力数量和改善劳动力质量的渠道”。^②由此可以看出，第三资本循环主要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是私人资本利益驱动的直接后果。资本家被迫从自己整个阶级利益出发，通过国家机构的干预加大第三资本循环的投资。^③

哈维还对资本的第二级和第三级循环中投资的生产率问题进行了分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7.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8.

③ 参见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7页。

析,认为其关键因素在于这种资本是否具有生产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资本家——经常通过国家代理——对生产条件进行投资,其目的在于有利于资本积累、有利于作为一个阶级的再生产、有利于持续维护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这就涉及“生产投资”的问题,因为生产投资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一般来说,投向第二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的投资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这样的潜力。但是,问题在于是否具备拥有潜力实现的条件和手段。对新机器的投资是最容易考虑的情形。与新机器的采用有可能具有生产性,也有可能不具有生产性一样,投资在科学和技术上的资金同样存在具有生产性和不具有生产性的可能。因此,现代资金投资规划的主要依据在于资本的第二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中的某种资本形式是否具有潜在的生产性,这也就关涉到资本第二级和第三级循环中经济危机的产生这个问题。

哈维敏锐地指出,伴随着资本在在城市空间中的循环和周转,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必将出现经济危机。随着资本的第一级循环中过度积累趋势的出现和压力的进一步加大,资本家把资本投入到第二级和第三级循环中来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这种运动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但是这种过度积累的趋势是不能根除掉的,在资本的第二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过度投资的趋势。哈维分析到,“这种过度投资与资本的需求相关,而与人们的实际需求没有关系,这种过度投资的价值毫无疑问不能得到完全的实现。因此,在资本的第二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中就出现了危机”。^①就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来说,这个危机采用的是资产价值危机的表达形式。长期的过度生产导致了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项目的贬值——这个过程影响了人工环境,同时也影响了生产和消费的持久性和耐用性。因此,这些领域中的资本进一步流动仍然不能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

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经济危机,但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哈维认为有效需求的不足也是引发城市空间经济危机的一个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2.

重要因素。商品最终只有通过消费的方式才能交换出去从而实现剩余价值和利润，因此消费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哈维看来，“在一个丰裕的社会，‘消费者情绪’和‘消费者信心’不仅仅对资本积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日渐成为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支点”。^①而广告产业和郊区化的生活方式无疑是推动和扩大城市空间消费的最大推手和动力，这带动了汽车、空调、家具、住房、别墅、高速公路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在资本逐利的不断推动下创造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商品，可社会的消费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远远跟不上商品供给的速度。因为，商品的消费和需求主要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对资本家来说，为了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应对残酷的市场竞争，他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消费和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对依靠工资过活的工人阶级来说，仅仅依靠购买日常生活的工资难以带动城市空间的有效需求和消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扩大需求带动消费的作用，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全球范围内也出现了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当“当有效需求不足以吸收、消化生产出的产品时，就会引发所谓的‘消费不足危机’”。^②

哈维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经济危机，他主张再投资活动的顺利开展是防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要条件。而再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有赖于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必须马上将他们昨天赚取的金钱投入流通过程，用作新增资本；第二个条件是昨天的过剩产品与今天的再投资之间存在的时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合；第三个条件是吸收的信用货币必须用于购买已被生产出来的额外的工资产品以及生产资料。^③但是，哈维认为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往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7 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8 页。

③ 参见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1—112 页。

往是成问题的。一是资本积累的扩张会遇到障碍，剩余产品难以被有效吸收；二是在货币信用体系内部，由于对货币体系缺乏信心，各种大小规模的货币和金融危机会随时爆发。所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再投资活动会受阻，从而会引发经济危机。

哈维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危机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局部危机，它影响某一部门或某一区域或者某些调停机构，导致这种危机出现的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是这些危机都能够在这些部门、区域或机构中得到解决；第二是转换危机（switching crises），这包括资本流通的再组织或再结构，或者为了给生产资本开辟新的渠道对调节机构进行再结构，这又分为部门的转换危机（导致资本的分配从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分）和地理的转换危机（指资本从一个地方转向另外一个地方）；第三是全球性危机，它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中的整个部门、整个区域，其程度有大有小。比如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贬值、科学和技术中的危机、国家支出中的财政危机和劳动生产中的危机，这些危机都在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中的所有区域或绝大多数区域表现出来。

但是，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带来巨大破坏性的同时，客观上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不合理的理性主义者’，它们是一种不平衡的表现，危机会促使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分配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理性化。危机也可能促使工业结构的理性化”。^①

纵观哈维的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不难看出他的分析视野和分析框架基本上没有脱离开马克思《资本论》的视阈。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详细考察了商品的流通时间、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同时马克思还特别关注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流通中的差异与特点。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运动主要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内进行，相应的资本循环的全部时间是由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构成的。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预付价值增殖的最大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2.

化，资本会尽可能地缩短生产时间和趋向劳动时间，为此就必须最大限度地缩短流通时间。剩余价值的获取量还取决于资本的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具体讲，剩余价值与资本的周转时间成反比、与资本的周转次数成正比。马克思还注意到，资本的不同性质在循环和流通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集中表现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异上。以机器、厂房、设备等劳动资料形式存在的固定资本其价值转移是分期、分批和分次进行的，因此，资本循环和流通的周期比价长。而以原料、燃料、辅助材料和劳动力形式存在的流动资本其价值转移是一次性的，这部分资本循环和流通的时间比较快。可见，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周转的理论为哈维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三级循环理论提供了分析的理论参照和架构。

哈维的城市空间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也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维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无法克服的重要矛盾必然导致其生产是无政府主义的，而资本家要实现其整体利益的一个基本保证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平衡，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利益的引诱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其结果就是必然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和危机的发生。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分析遵循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原理。随着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其生产关系越来越容纳不了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重要体现形式就是经济危机。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那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坚信，危机必将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经济危机无疑是具有最大破坏性的，它会带来生产下降、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失业率高升、通货紧缩和社会经济陷入瘫痪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哈维对城市空间经济危机的分析也遵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危机理论分析的逻辑。二者是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作为社

会整体危机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经济危机，既具有一般危机的共性，更具有城市经济危机特殊的个性。哈维的城市空间经济危机的微观分析正是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危机的宏观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节 作为弹性积累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历经了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也就是从“刚性”的生产模式向“弹性”的生产模式的变化和过渡。哈维把这个时间具体到 1972 年，他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因为在他看来，正是从那时候起，“由于滞胀那令人窒息的迟钝而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滞胀使长时间的战后繁荣无力地走到了尽头——开始逐步发展出一套表面上完全不同的全新资本积累体制……它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劳动过程、劳动市场、产品和消费方式等方面惊人的灵活性”。^① 所以，在哈维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的这个宏大背景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呈现出了一系列的新特点。

一、从福特制到弹性积累

福特主义 (Fordism) 这一词最早起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按照他的理解，福特主义主要指的是 20 世纪中期以后，一种基于美国后来逐步扩展到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新的工业生活模式。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较低产品价格作为竞争手段的刚性生产模式。按照调节学派的观点，福特主义关键性的基础是从一种

^① 大卫·哈维：《贯穿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弹性积累：对美国城市中“后现代主义”的反思》，载薛毅主编：《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4 页。

以粗放型为特征的资本积累战略，向一种以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密集型资本积累战略的过渡。更为重要的是，哈维认为要完整地理解福特制，还必须包括与这种刚性生产模式相呼应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正是福特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结盟和联合，才维持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有效需求，才能卓有成效地调节着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良性循环。

但是到 20 世纪末期后，伴随着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福特主义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已不复存在、劳资矛盾日益突出、劳动生产率和利润降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等等。于是，后福特主义的时代来临了。

后福特主义 (Post-fordism) 是指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 (弹性) 的生产模式。后福特主义在许多方面具有与福特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比如持续的产品和工艺创新，企业组织在利用市场方面呈现出多级分包网络的特点，在技术创新的长期战略上表现为制造业、银行和国家的合作分担。后福特主义主要表现为两种主要模式，一是建立在中小企业之间动态分工网络的“弹性专业化”模式，二是以大企业为核心并控制多层次分包企业网络的“精益生产”模式。从实质上讲，这两个模式都强调对泰勒制的劳动分工和严格的管理控制的解除，都注重发展有高度专业技能和充分自主控制权的雇佣劳动，都突出生产人员对生产过程具有足够的自主控制权，等等。

以斯科特 (Scott, A. J.) 为代表的许多城市学研究者都把从福特主义走向后福特主义的工业组织的这种转变视为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变化之一。斯科特认为，美国的都市化进程历经了“由福特主义理念主导的规模生产”到“后福特主义‘弹性生产’模式崛起”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阶段，前一阶段是以底特律、芝加哥和匹兹堡的钢铁汽车产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后一阶段是以洛杉矶的国防和航天工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型产业。

从哈维论述的弹性生产的内容可以看出，他是十分赞同斯科特的关

于美国都市化进程转变的观点的。哈维认为弹性生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从福特主义时代的全日制劳动人员转向了非全日的、不定期的、非固定的劳动人员，由此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变，家庭劳动、手工业劳动和服务型劳动呈现生长和上升的态势，而传统工厂中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日益下滑。其次是由劳动力市场转变所导致的都市经济空间的变化，小批量的生产和经济规模开始压倒大批量的生产和大规模的经济。最后就是体现在消费文化的变化上，那就是对时尚的关注和追逐。

哈维所理解的贯穿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弹性积累，从实质上讲，指的就是后福特主义时期或后工业社会时期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资本积累模式和生产方式。正如工业生产造就了工业社会时期的城市空间的特殊地理和特殊社会风貌一样，后福特主义时期或后工业社会时期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又呈现出另外的地理景观和社会景观。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构和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后福特主义和后工业社会时期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经济特征表现为制造业的地位日趋下降，而服务经济、白领职业和信息技术日益发展和居于主导地位。

哈维把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经济政治体制和资本积累制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认为从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刚性”资本积累模式向以后福特主义为代表的“弹性”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所以，哈维“把城市过程的转变看成是迈向弹性积累的政治经济行动和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化美学趋势的一个关键的整合点”。^①

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制不断克服内在矛盾以使自己在城市空间中的剩余价值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出，后福特主义实质上是资本

^① 大卫·哈维：《贯穿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弹性积累：对美国城市中“后现代主义”的反思》，载薛毅主编：《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页。

主义历史上的一次生产方式的自觉调整。

二、弹性积累背景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经济

在福特主义理念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经济表现出大规模生产的特征，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推动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向工业生产规模不断增加的方向的发展。在福特主义的生产体系中，最为明显地突出了时间对空间的优势。这种生产体系力图将生产过程与材料、运输过程完美地结合起来，同时还通过生产内部的流水线作业的方式使得空间结合过程所需的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由此，福特主义大规模的生产被视为已达到了大型和规模经济的极限。

伴随着资本制城市空间弹性积累体制的建立，城市空间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新的积累方式反映了传统福特主义方式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经济的危机，同时也表明那种在资本、劳动和政府间三方达成的社会契约“规模模式”的解体。哈维把这种发生在城市空间的转变称为从福特主义到“弹性积累”方式的转变。正如爱德华·索亚所指出的那样：“当代文献充斥着弹性专业化、弹性生产体系、弹性积累的资本主义方式、弹性时代、弹性劳动管理关系、弹性技术甚至作为后福特主义工业城市空间代名词的弹性城市。”^①

哈维从城市竞争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弹性积累。他认为正是由于提高了的城市竞争才使弹性积累牢固地确立了下来。由于城市间相互的竞争，这便打开了使得新的、更灵活的弹性劳动过程更易于置于其中的空间，从而使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能够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更加灵活自由地流动。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更改场所的成本也减少了。与此同时，不同城市的市政府的相互竞争使其不断进行改革并投资建设会

^① 爱德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议中心、大型体育场等休闲中心、迪斯尼世界等娱乐中心、市中心的消费中心等基础设施，所有这些都积极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从“刚性”资本积累模式向“弹性”积累模式的过渡。

哈维还强调指出，在弹性积累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在生产领域，伴随着去工业化浪潮的出现，大量的工厂倒闭，大批的产业工人失业。这些失业的工人尤其是蓝领工人被迫在城市中自谋生路，于是，城市社区中一个工厂的倒闭往往就会使这个社区陷入穷困的境地。哈维把这种社会现象称为“非正式化”，他认为“非正式化”的本质和形式主要取决于“商品和服务寻找当地市场的时机、劳动力储备大军的质量（技能和才智）、性别关系（因为女性在组织非正式经济方面发挥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小规模企业主技能的存在，以及权力机构（像工会这样的管理和监督组织）是否愿意容忍常常超出法律之外的实践”^①等等因素。这种“非正式化”浪潮对低收入社区的传统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它打破了这种类型社区长期以来的互助制度，因为在寻找各类生计的强大压力下，低收入社区呈现了巨大的劳动力储备，从而使这些社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具有企业化的性质。因此，工资下降、福利减少、带薪休假时间的缩短、兼职工作日益增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些现象都是弹性积累背景下城市空间阴暗面的反映。

在劳动力领域，弹性积累下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表现为城市劳动力两极分化的加剧。一极是处于劳工体系核心部分的高工资工人，这些以白人、男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为代表；另一极是处于劳工体系外围部分的低收入和低工资的工人，这些以黑人、女性和就业条件较差的群体为代表。这些处于外围部分的工人不仅会遭受就业的不稳定性和劳动力过剩的影响，而且还会面临诸多的经济压力，比如住房市场上被迫用按揭的方式获取居住权、服务渠道上的不畅通和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和失语等。

^① 大卫·哈维：《贯穿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弹性积累：对美国城市中“后现代主义”的反思》，载薛毅主编：《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5页。

哈维还坚持认为，在弹性积累背景城市空间中的消费领域，与福特主义这种刚性积累模式中标准化统一生产和标准化统一消费形成对照的是，产品更加细分和微分以满足各种不同层次和群体的消费对象的需要。哈维把那种迎合富人和上层人士品味和审美喜好的消费称为“象征资本”的消费，他借用布迪厄对“符号资本”的定义来界定“象征资本”。布迪厄认为“符号资本”是证明主人品味和特性的奢侈品的聚集。但哈维明显地觉察到了“象征资本”的实质，认为“‘象征资本’是通过文化和品味的领域来用于隐藏经济差异的真正基础”。^①这种“象征性资本”消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城市空间的人工建筑环境中，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居住面积的大小不再是其唯一的要求，他们还通过对房屋的象征性处理，比如通过开发商的设计花样或者通过自己对居住空间的独特的象征性装饰，来获得自己身份的认同和接受。

在社会调控或社会控制模式上，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弹性积累相一致的是对福利政策的冷落和疏离。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是新保守主义和私有化社会思潮，它们把私有化视为神圣合理的，强调自由发展，无视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如果任由社会福利这张“安全网”被撤掉的话，那么城市空间中的经济的萧条和衰退、广大平民百姓的穷困潦倒和大量的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就不可避免了。这时的城市空间就成为了一个供少数人占有、分享和支配的空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一个高度危险和充满冲突的空间。

作为马克思空间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的爱德华·索亚，他对弹性生产的分析也为我们理解哈维的弹性积累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索亚从技术的、组织的以及空间的三个广泛和相互影响的方面来研究弹性生产。他认为，新技术主要在生产线上、即时传送系统、降低存活费用、节省成本、劳动策略和使用电脑等方面来促进弹性；在公司

^① 大卫·哈维：《贯穿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弹性积累：对美国城市中“后现代主义”的反思》，载薛毅主编：《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页。

组织方面，通过公司兼并组织形成的专业化大集团，在兼并成功时便弹性扩张，在兼并失败时便关闭，这不会对其他部分造成消极影响：在空间方面表现为由技术和组织所推动的城市空间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的重建。^①

总的来说，福特主义的城市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群同质的城市，在这种城市空间中，规模经济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的是大批量生产和消费、社会经济上明显的层级结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福特主义的城市空间却是一群异质城市，其特征则表现为较小的规模、较大的内部差异和两极分化。

第四节 思考与启示

一、对资本逻辑的反思

放眼世界，城市已然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行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资本主义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从欧美到亚洲拉美甚至非洲，城市化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景观，同时城市化也成为推动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引擎和主要推手。城市化不仅改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也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城市这个独特的空间和地域中聚集了各种生产要素、各种社会资源和各种权力关系，也集中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城市之所以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幕后是资本逻辑在起主导作用。哈维对资本逻辑在城市空间中的主导作用有一个形象的描绘：“当城市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生活主要体现为消费、旅游、购买奢侈品、发展文化和知识产业、永无止境地追求场面经济的世界中时，生活质量只能是有钱人才有权利追求的

^① 参见爱德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226页。

东西。”^①更为重要的是，哈维还深刻地指出了资本逻辑对城市空间的副作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世界，强调占有性个人主义和金融投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道德观，已经成为人性社会化的模板。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世界，推崇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正逐渐成为它最大的特征。”^②哈维用“创造性破坏”这个独特术语来说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独特性。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拓展和发展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是成功与失败、建设与破坏、发展与倒退、创造与毁灭共同交织的过程。

何谓资本逻辑？它的实质和主要特征是什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上述问题作了深刻的解答。马克思认为，资本虽然是以生产要素呈现出来，表现为一种物的特征。但是，透过物的外观深入到资本内部深处可以发现，资本实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作了形象而深刻地说明：“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③进一步说，资本体现的是一种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正是通过资本所特有的力量才将作为“死劳动”的生产资料和作为“活劳动”的劳动者融进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之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主要表现为一种价值增殖过程，换言之，资本必须实现增殖。资本逻辑是由资本的本质和特征所决定的。资本逻辑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实现价值增殖”的逻辑；二是“剥削、奴役劳动”的逻辑；三是“扩张渗透”逻辑。

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实现价值增殖”的逻辑。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运动的最终目的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1 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4 页。

和归宿就是实现价值增殖。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一个脚注对资本的逐利性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动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①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建立在资本这个支点之上的。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的终极目的，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再到商业资本这样一个产业资本的循环的过程，始终都是围绕怎样为剩余价值生产准备条件、怎样生产剩余价值、怎样实现剩余价值而展开的。从资本流通的公式“G—W—G'”可以看出，资本运动和循环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预付资本的增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实现资本与科学技术的联姻。正是通过资本与以技术工具为核心的理性的合谋才实现了资本更大程度的增殖和盈利。尤其是在城市空间的塑造和变化过程中，这种特征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城市化运动中，资本与科学技术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共同形塑了城市空间，与此同时资本也实现了价值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资本“奴役、剥削劳动”的逻辑。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线索和重要钥匙。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重要体现就是雇佣关系，之所以资本家是资本家、雇佣工人是雇佣工人，最为重要的缘由就是看占不占有资本，占有资本的一方可以通过握有资本的权力来奴役剥削没有资本而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马克思用劳动异化观点来表明资本对劳动的这种奴役和剥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概括了劳动异化的四个主要体现：一是劳动产品和劳动者之间的异化，因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①二是劳动行为和劳动者之间的异化，劳动本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个重要体现，但是在异化劳动中，“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②三是人的类本质与人之间的异化，从应然状态讲，“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是“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③四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因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④

资本的“扩张渗透性”逻辑。资本要实现增殖和剩余价值最大化，就必须不断循环运动和周转。从资本形态扩张来讲，最初资本运动的典型形式是工业资本，通过不断发展逐步扩展到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地产资本、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从资本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性来看，资本几乎介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到人们的价值观念等等都深深地打上了资本的烙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的全面渗透和侵蚀作用给予了深刻的揭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⑤从空间关系的拓展来说，资本冲破了民族、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国家、地区、种族、宗教等形形色色限制，已经演变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的行为。早在 16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预见到了资本的这种全球性的扩张渗透性特征，他们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

怎样去认识和评价资本逻辑是正确对待和利用资本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对资本逻辑采取的是一种辩证分析和一分为二的态度。在他看来，资本是一种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力量，利用资本实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从而改善人类生活状况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资本自身所固有的奴役劳动和对社会生活不良渗透与侵蚀的副作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取代封建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资本起到了关键性的革命作用，这就要求“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②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对生产力的发展最鲜明的体现就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阐述深刻地说明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奴役，揭示了人听命于资本、机器和工具的屈从地位和命运。同时，马克思还揭示了无节制地利用资本所必然导致的充满这个社会肌体的恶性竞争、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像梦魇一样难以摆脱的经济危机，而且对资本和货币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还会导致扭曲的价值观、露骨的拜金主义和奢靡的享受之风。

那么，如何对待和利用资本？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对待资本的态度应该是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对于受资本全面宰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讲，是不可能找到这条出路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并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 页。

会代替它，才可能找到一条合理利用和限制资本之路。

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并行着资本逻辑和空间生产逻辑，两种逻辑共同主宰和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变化与发展。因此，探讨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逻辑的关系是了解城市空间运行规律和运作条件的重要线索。

一方面，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逻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资本逻辑促成了生产要素在空间的不断积聚和集中，促进了空间生产的发展和壮大。所谓空间生产，主要是指空间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空间由原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到空间成为生产本身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占有空间、生产空间、交换空间、分配空间和消费空间构成了空间生产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环节。从空间生产的主要内容和环节可以看出，其幕后的操纵力量就是资本的力量。首先，资本促成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在特定空间的高度集中，依托这种集约型的经济模式从而带来该空间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和社会的长足进步。其次，在资本的不断增长和获利的诱惑下，资本不断地对道路、铁路、住房、公园、旅游景点和城市基础设施等空间进行生产和改造，并从中实现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后，资本不断扩张冲破了地域、民族和国家的限制从而带动了空间生产的范围不断扩大，各个民族地区和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趋势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增强，全球化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并最终促成了世界历史的生成。

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还呈现出一种背离性和矛盾性的态势。在资本最大限度地增殖和盈利的驱策下，空间生产呈现出过度生产的趋势。这种由资本驱动的过度空间生产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危害。一是空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是社会生产不可持续造成代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使人类承受了巨大的资源压力，也让人类为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二是导致了巨大的生态危机，表现在水资源的污染、空气质量的下降、资源的枯竭、水土的流失、植被的破坏、物种的消失、自然灾害的频发、极端气候的频现等各种生态危害。三是带来交通的拥堵、旧城的破坏、人际关系的疏离、城市特色危机丧失、城市发展模式单一化、重经济效益轻社

会效益、对空间资源占有分配的不平等、城市缺乏包容性等诸多的社会问题。

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逻辑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正确妥善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既要利用好资本做好城市空间的改造和升级，为城市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与此同时，还要限制约束资本避免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危害，要对资本进行合理的引导和调控。

二、对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使放在世界的范围来看，中国城市化的力度、规模和速度都是惊人的。城镇化率高低、城镇数量多少、城区面积大小等指标是反映城市化程度的几个重要指标。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城市化率为10.64%，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城市化率为17.92，改革开放35年后的2013年城市化率为53.73%。换言之，中国现在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和居住在城市。从这几个时间节点反映的城市化率来看，中国城镇化的速度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以下几个数据能够说明上述结论：“从城市人口看，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120年，美国用了80年，中国仅用了22年。从城镇数量看，据近100年的统计，美国城镇数目大约是每20年增长1倍。在中国，1978年全国共计有小城镇2176座，到2000年猛增至20312座，有近90%的小城镇是改革开放后建成的，平均每年增加超过了820个。”^①再从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来看，“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从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18万平方公里，增长78.3%；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4.05万平方公里，又增长85.5%。从倍数来讲，2010年是1990

^① 刘士林：《中国式城市化：走出一条和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光明日报》2013年2月18日。

年的两倍以上”。^①

那么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在推动如此大规模、高速度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来看，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增加了7.28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13年的30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增加了35.45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是与改革开放的逐步扩大和加深的进程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有其必然性。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快速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口聚集在城市以满足更美好生活的愿望。同时还要看到推动城市化进程除了人民群众的期盼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变量，那就是市场化进程的逐步加大和政府的积极主导与参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发展和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主体参与到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来，不仅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而且也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前进。在考虑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时，政府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随着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目标和任务，而城市化无疑是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最佳选择。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巨大动力。

但是，当我们看到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的合理性时，还应看到在这种城市化进程背后潜藏着的隐忧，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城市发展模式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与挑战。概括起来，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亟须改进的问题。

第一，单向度发展模式。单向度、简单化和片面化是中国城镇发展模式的突出特征。首先，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发展经济、追求GDP增长。在此理念指引下，中国城市化出现了“大跃进”现象：圈地抛荒现象不断涌现，城区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工业开发区、高科技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名目繁多的功能区不

^① 杨敏：《规划为何这样痛》，《决策》2012年第9期。

断开建。但是在这种单向度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大跃进”的扩城运动中，暴露出了产业结构单一、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缺乏、资源浪费严重、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生态承受能力脆弱、就业率偏低、基础设施和民政福利投资薄弱等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现象莫过于大造新城和滥建新区，“日前有调查显示，144个地级城市竟然要建200个新城新区，圈地造城、围海造城、削山造城等更是蜂拥而起”。^①这种疯狂的造城运动，完全违背了城市建设的规律和市民的实际需求，从而导致了“空城”、“鬼城”、“睡城”等现象的频频出现。其次，把城镇化简单地等同土地城市化。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国有土地，既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又为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有学者曾估计，在中国或许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要远高于人口城市化的程度。这无疑是一个危险信号，要知道，中国的人力资源比较丰富，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土地资源却稀有得多。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的人口大国，如果任由土地被城市化过程所吞噬、守不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那么势必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基本的民生保障构成巨大的威胁。而且这种过度依赖土地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会带来“土地财政依赖症”，所谓土地财政依赖症是指“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双重考量和追求，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卖地冲动’，其财政支出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甚至是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债务偿还的主要渠道”。^②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的情况是非常惊人的，从“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债务总额”的绝对值，即此类债务总额来看，排名依次为北京、浙江、上海、四川、辽宁、湖北、广东、重庆、山东、天津、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北、广西、黑龙江、陕西、吉林、海南、山西、甘肃，江苏未公布数据。从土地财政依赖度，即“土地偿债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占比”来看，排名依次为浙江、天津、福建、海南、重庆、北京（估算）、江西、上海、湖北、四川、辽宁、广西、

① 本报评论员：《坚决遏制“盲目”造成之风》，《人民日报》2003年9月3日。

② 刘德炳：《哪个省更依赖土地财政？》，《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第14期。

山东、江苏、安徽、黑龙江、湖南、广东、陕西、吉林、甘肃、河北、山西。^①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雅各布斯主张，多样性才是生命的灵魂，城市发展模式不能是单向度的摊大饼式的无限扩张，而是要充分考虑各个区域、各种人群、各种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城市发展模式没有定式，城市发展要遵循不同的国情、市情、民情，要注重城市发展的个性与特殊性，不能搞整齐划一、千城一面。雅各布斯认为城市单向发展模式的幕后主宰是资本的力量，因为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遭遇了“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成功的多样性”的厄运。有学者也指出：“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致命弱点在于城市功能性的残缺和混合效用的匮乏，断裂的社会结构与城市形态无法将城市内部有机地联系起来，突兀空洞的建筑物如幽灵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原子化的大众挣扎徘徊于越来越封闭的生存空间，从而显露出多样性的衰竭。”^②

第二，重经济、轻人文。唯 GDP 论英雄的城市发展模式必然会导致城市化过程中重经济、轻人文的现象。什么是理想城市？自从有了城市以来，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虽然不同的人答案各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理想城市的内涵绝不是单一的经济向度，它必然包含人文的向度和精神的维度。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物质需求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和全部；精神生活和人文关怀也不能被忽略和漠视。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是一个独特风俗习惯、思想自由和情感丰富的实体”。^③ 无独有偶的是，美国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给出的城市的定义是：“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

① 刘德炳：《哪个省更依赖土地财政？》，《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第14期。

② 袁瑾：《我们究竟该如何进行城市建设》，《博览群书》2009年第9期。

③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

更是文化的归极 (Polarization)。”^①可见,城市的本质不仅仅在于它的物质外壳和经济发展,更在于文化、思想、政治和伦理的内核;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不能仅仅关注外在的表象,更应深入了解城市的本质和内涵,从而更好地建设城市、发展城市。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轨迹:由古代“以政治、军事为根本目的”的“政治城市”到现代“以工业、商业为核心功能”的“经济城市”,再逐渐转向当代“以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城市”。^②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大致经历了由“政治城市”向“经济城市”的过渡和转型。现阶段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于“经济城市”的阶段,这个阶段城市的主要特征是以经济发展作为最重要的考量指标,它必然会带来城市建设中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千城一面”之风盛行,从而违背了城市的本质和城市居民多方面的需求。那么,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之路在何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给出了答案,《规划》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的目标任务——“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深厚、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这表明了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中国的城市建设要实现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不能把城市发展过程仅仅视为产业集聚、人口集中、经济发展的过程,这是一种“以物为本”、“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城市建设应该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和轨道上来,应该更多的关注人的民生需求、人际交往、身心和谐、文化认同、情感归属、权利平等享有等方面领域和问题。

第三,重建设、轻规划。城市化包含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过程。一方面,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依据和实施准则。城市规划是根据所在城市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文条件等客观因素,对城市的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布局作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② 参见刘士林:《为什么要“注重人文城市建设”》,《光明日报》2014年5月19日。

的一种综合部署和统筹安排。拥有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并对其认真贯彻执行是城市健康合理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条件，这既可以发挥宏观调控的手段从而避免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还可以促进城市空间中不同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保障，并确保每个市民对公平正义的享有。另一方面，城市建设是城市规划的实施和落实。好的城市规划毕竟只是一张蓝图，要将这幅美好蓝图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必须通过城市建设这个实践环节。

很遗憾的是，在如今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很多城市并没有妥善地处理好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辩证关系，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重城市建设、轻城市规划。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城市规划制定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纵使有了城市规划，但缺乏约束性和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行力，城市规划往往因政府、企业、利益集团和开发商的利益而改变。最典型的现象莫过于昔日的地标建筑说倒下就倒下的情况，如山东滨州的“中海航母”、沈阳的“绿岛体育中心”和“夏宫”、杭州西湖的第一高楼、南昌的“五湖大酒店”，这些昔日耗费上亿甚至几十亿的所谓地标建筑和形象工程，无论是昔日的建设还是后来的拆除，都充满了随意性，很难寻觅科学规划的踪影。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考察时强调，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因此，做到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对城市规划的执行力是我们城市建设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现在，是时候反思和总结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了。应该变单一化的粗放型的城市发展模式，要把城市经济增长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自身特色有机结合起来；应该改变重经济、轻人文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应更多地考虑人的政治权利、文化权益和身心健康和谐等多方面的需求，在城市化过程和城市建设中既要考虑效率，同时也要关注公平；应该改变重建设、轻规划的城市发展模式，妥善处理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关系，尤其要注重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法律性约束力，要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勇气和魄力。

第四章 权力逻辑视阈下的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以1985年《意识和城市经历》(*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的出版为标志,哈维的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如果说在前一个时期哈维主要关注的是资本逻辑视阈下的城市空间的话,那么后一个时期其研究的重点则是倾向于权力逻辑视阈下的城市空间。所以,在哈维看来,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资本逻辑视阈的城市空间分析是围绕“资本积累”展开的,商品、资本积累、资本循环、金融资本和地租等构成了其理论主题;而权力逻辑视阈下的城市空间探讨则是围绕“阶级斗争”这个向度进行分析的,矛盾、斗争、城市社会运动成为其主要的议题。按照哈维的理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的枢纽和中心,也是压迫与反抗的革命中心和权力中心;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分化过程既伴随着空间的分化更伴随着社会的分化,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就是各种矛盾的综合体,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具体表现,是资产阶级在城市空间中对垄断租金的不断寻求和实现。

第一节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的矛盾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矛盾分析方法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最根本的认识方法。据此,马克思分析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走向消亡。

哈维秉承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和实质，用以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矛盾和冲突。哈维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经济特征表现为“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城市经济就是一种空间经济，城市空间就是创造剩余价值、集中剩余价值和榨取剩余价值的特殊区域。但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因此“揭示这些有关内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空间生产的矛盾”就成为了他的主要理论任务，因为“只有借助这些矛盾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历史地理景观的独特性质，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才能够重新建构理解有关城市化、区域发展和不平衡发展地理等现象的理论”。^①

哈维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构成的一个矛盾集合体，正是这些矛盾的相互作用和辩证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变化运动和发展。

一、人与自然的矛盾

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面临的首要 and 直接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城市化的不断扩张和发展中，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的自然在进行物质能量的变换和交换，其中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创造性破坏”的特点。“创造性破坏”是哈维描述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术语，它包含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城市化过程中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61.

人类通过特有的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界，获取所需的物质和能量，这是一种人类所特有的“创造性”活动，通过这种“创造性”活动城市化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另一方面，这种“创造性”活动在给人类带来短期物质利益和丰厚回报的同时，却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矛盾，人类陷入了不可持续发展和难以为继的自我“毁灭”的结果当中。

哈维具体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创造性破坏”的突出症候：资源的耗竭、土地被不断的占用、土地荒漠化、沼泽的干涸、动植物栖息处所的改变、植被的锐减，等等。哈维强调指出：“当下正在发生的人为引起的环境变革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规模更大、风险更甚、影响更深远、意味更复杂（物质上、精神上、美学上）。”^① 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哈维认为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就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和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存在的重大误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是改造客观世界和影响客观世界最为重要的一种群类，也是对自然环境影响最为深刻的族群。这就不可避免地增长人的自信和自大，把人类自身作为万物的中心，把人类自身作为主宰万物的客观的主体力量。正是这种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导致了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为所欲为和毫无顾忌。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必然会导致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即认为自然界是可以利用、战胜甚至是可以征服的。人类作为主体，可以任意占有、利用、处置和分配自然界，而不顾自然界自身规律和承受能力及自我修复能力。

哈维认为，在有关当代环境运动和生态运动的各种思想中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相互矛盾和相互抵触的主张，因此有必要对各种思潮进行一番审视和分析评价，唯有在此基础上方能揭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人与自然矛盾的特征和实质。这些思潮包括启蒙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观、马尔萨斯传统、生态现代化思想、“明智利用”和私有财产保护、环境管理的标准观点、环境正义运动。

^①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6 页。

第一，启蒙思想。哈维指出：“当代生态学思想常常把这类问题以及许多当代环境难题的根源追溯到启蒙运动的自大和错误导向，归因于其下述观念：自然是供利用的，并且对自然的统治是切实可行的计划。这种观点迫切需要详细审查。”^①如何看待和衡量启蒙运动和生态问题及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哈维坚持主张，必须结合启蒙运动中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目标来理解。启蒙运动是以追求人类解放、恢复人的理性和实现自我解放为目标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哈维看来，“统治自然”的主题是从属于这些目标的。因为无论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集体计划还是实现自我实现的个人计划，都把利用自然、统治自然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而就恢复理性的权威来说，由于那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把理性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因此自然也就成为了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奴仆。尽管启蒙运动的主张、原则和目标与人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哈维坚定认为，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是人类发展永恒追求的目标，而在这个伟大征途中启蒙观点是不能抛弃的。在这一点上，哈维认为他与马克思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因为“当马克思把支配、科学以及逐步解放生产力等观念联系起来以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目标的时候，他确实与众不同。对马克思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以如下方式来发展自然持续生产所需要的自觉力量：打破阶级特权和压迫，把个体的创造性力量解放出来，从而通过自然的生产来生产他们自身”。^②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观。哈维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给予了“支配自然”的意识形态迎面痛击。法兰克福学派是从启蒙思想所追求的目标与社会实践现实的矛盾和冲突的角度来批判启蒙运动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一个最独特的观点就是：对自然的外部统治必然会导致对社会内部的统治。随之而来的恶果就是“这样便产生了恶性循环，把科学和技术束缚在日益增长的控制和日益增长的冲突的致命辩证法中。主宰自然的诱人前

①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②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景——社会和平、物质充盈——仍未实现。真正的危险，即控制所带来的破坏将转到控制工具本身（科学和技术），是不能低估的。科学和技术作为螺旋式上升的对内部和外部自然的控制的主要因素，它们受非理性动力支配，这种非理性动力会毁掉它们本身文明合理性的成果”。^①哈维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观的最大缺陷在于不再把工人阶级当作当代历史当事人和主体力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在寻求替代性的行动地点时就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但是哈维也看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在对统治自然思想的批判中所蕴含的积极意义，认为它触碰到了环境—生态政治学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对科学作为一种解放力量的质疑、对工具理性霸权的挑战和对人的统治压迫的关注，等等。这些积极合理的要素都成为构建积极环境—生态政治学的合理养料。

第三，马尔萨斯传统。哈维认为马尔萨斯的生态匮乏和自然极限的观点是对具有乐观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想的直接矫正。而马尔萨斯自然观的主要论点在他的《人口原理》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说明，哈维将其概括为“食物对于人的生存是必要的，两性之间的激情是必需的和永恒的。他把这两个基本原理置于资源有限性的世界语境中，并推论出著名‘自然法’：人口增长（几何序列）对生存手段（代数扩张）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产生贫穷、疾病、饥荒、战争以及‘人口过剩’的普遍趋势。”^②哈维敏锐地捕捉到了马尔萨斯自然观的矛盾性：一方面马尔萨斯对穷人的命运采取了一种非常冷漠的态度，认为穷人陷入饥荒、疾病和贫穷是不可摆脱的宿命，因为穷人的口呈几何级数增长，马尔萨斯甚至反对给穷人提供福利，认为这只会导致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和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而另一方面，马尔萨斯却对由资本家、官员和地产利益集团构成的上层阶级的作用进行了热情的颂扬，他从资本积累的持续性和有效需求的扩大化入手分析，认为只有地主、官员、资本家这些非生产阶级不断扩大消费能力才能有效解决资本

^① 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②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的持续积累和有效需求的不断扩大问题。

针对马尔萨斯的这种矛盾性，哈维指出：“这种有效需求理论与人口理论不大吻合。它似乎不合逻辑地（如果不是完全令人厌恶的话）主张，以控制人口对资源压力的名义对社会最底层阶级的消费权力进行遏制，同时却通过有效需求理论主张上层阶级应该尽可能多地消费。”^①而且哈维还注意到，马尔萨斯这种矛盾的自然观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还很有市场，正是在这种矛盾的自然观的指引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掠夺，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丑恶行径现在十分猖獗，我们看到把上层阶级的‘消费信心’以及对借贷消费的热衷描述成维持资本积累的基础，而下层社会各种形式的福利却被大量削减，因为这些东西被视为对增长的有害消耗。在国际范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告诫其余的国家，他们的人口增长如何构成对资源的压力，同时又劝诱他们自己的上层阶级沉溺于无节制的奢侈消费之中，将之作为对‘可持续’增长的必要贡献，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矛盾”。^②

第四，生态现代化思想。哈维认为生态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就是“经济行为系统地危害了环境（‘自然’的失调），因此，社会应该对于环境调节和生态控制采取一种主动的姿态。预防比补救更可取。这就意味着，应该用一套更加系统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及调控实践来取代专门的、分裂的，及官僚的国家调控方法”。^③哈维比较赞成生态现代化思想的主张和理念，因为生态现代化思想把可持续发展置于核心，这回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哈维认为生态现代化思想的积极作用还在于它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对立和矛盾，二者可以实现共赢。在承认生态现代化思想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哈维也指出了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可持续发展’修辞就被附加到必须尊重自然界限的增长经济学的理想之中。通过诉诸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世界较贫困地区对更高工资或更

①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②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163页。

③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页。

快速经济增长的要求被驳斥，并由此把注意力从根深蒂固的阶级和帝国主义特权之更加无常的法则中转移开来。”^①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技术、经济实力掠夺和管理全世界的资源。

第五，“明智利用”和私有财产保护。在哈维看来，这是一种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名来反对生态现代化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生态现代化运动是政府主导的集体干预行为，这与自由主义奉行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按照哈维的理解，“明智利用”运动捍卫私有财产不受政府干预和约束的论据有两个：一是工作（因此也就是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权利必须优先于“自然的权利”；二是一般土地使用法必然会不公正地对待地方和私人决定。^②哈维对“明智利用”和私有财产保护思潮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他指出：“既然财产所有权的模式在生态上是混乱的，在社会上是不平衡的，那么就绝对没有什么理由相信，靠它的基本常识就能提供处理环境正义问题所需的全部智慧，更不用说它能考虑到生态上可持续的发展了，即使这种发展以最赤裸的资本主义形式进行的。”^③所以，囿于一己之利的私营业主必然不具备环境生态保护的集体意识。

第六，环境管理的标准观点。按照哈维的理解，这是一种与生态现代化思想相对的一种思潮，它主张环境关注不能妨碍经济增长，事后干预是处理环境问题的一般方法。哈维指出，环境管理的标准观点主要考量以下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只有充分证明市场失灵导致了严重损失且这种损失是能够量化的；二是要用货币化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来权衡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在做这种权衡时必须坚持经济增长优先于环境质量的原则。哈维认为标准观点的致命缺陷在于：第一，维护了私有财产和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权利；第二，对环境正义的关注严格地服从于对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关注。因此，“人类广泛地改造环境的被默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把标准观点转化成与傲慢的支配自然论点同谋的

①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8页。

② 参见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41页。

③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42页。

教条)。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好地为资本积累、经济效益和增长来管理环境”。^①

第七，环境正义运动。在哈维看来，环境正义运动的话语体系有别于生态现代思想和环境标准管理观点，这主要表现在环境正义运动的以下五个方面的主张：其一，在防范环境危险时能够确切地感觉到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其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权力形式会动用专门的或专业的话语而否认和抹杀环境方面不平等的事实；其三，以自然命运和生物中心话语作为自己话语体系的核心；其四，受环境不平等影响至深的是那些处于边缘化的、无权的和受种族歧视的人士和群体；其五，环境正义运动的话语体系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象征视角。^②哈维认为，环境正义运动重要的贡献在于它透过“公平市场”的现象发掘到了环境运动中不平等事实的根源，那就是“任何问题一旦按照货币交换的不对称（特别是以成本效益分析）来安排，穷人和边缘人也就输掉了比赛。货币始终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形式，是规训社会关系的工具，而非中立的、用以计算‘提高福利的利益’一般等价物”。^③哈维极力主张，环境哲学和环境决策应当把环境正义思想作为一个重要的向度和资源融入其中以丰富和提升自己。

哈维在对各种有关生态环境思潮进行一番分析和评介后，直面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他认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陷入不能自拔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为指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哈维追溯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源头——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是“由洛克、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而由李嘉图和穆勒进一步发展的启蒙运动的产物”，其主要特点在于“它把市场自由及其看不见的手——推动技术变迁并把科学动员成生产技术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看成一种工具，它把从需求和需要中解放出来的不断增

①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2页。

② 参见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42—445页。

③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46页。

长的社会生产力与通过市场选择而自我实现的个人能力结合起来”。^① 在哈维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经济改革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理论基础，也是当今资本主义和权力制度所推崇和信奉的哲学。这种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必然会导致高度工具主义的自然观，即“把自然看成是资本财产的组成部分——供人类开采的资源……把统治自然看作解放和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为了按照人的意图来控制自然，为市场交换而开采它，甚至根据人的设计来教化它”，并且“它同时掩盖了社会关系以及随后而至的对劳动者的统治，把与自然关系这个宇宙问题纳入为了人类福利进行稀缺资源恰当配置的技术话语”。^② 所以，资本主义的自然和环境生态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循环、资本积累和资本对利润永恒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霸权话语体系和生产实践中环境保护生态维护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和海市蜃楼。对此哈维深刻指出：“土地伦理在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无望的追求，在这个社会中，货币共同体压倒了一切。”^③

在评析介绍各种生态环境思潮和揭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环境生态问题之后，哈维指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西方的话语体系存在两个重要缺陷：一是以丰饶的乐观主义和完全的悲观主义两种极端形式呈现的矛盾话语体系，二是自然与社会、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完全对立和割裂的思想。在哈维看来这两种认识缺陷势必会阻碍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环境生态问题的真正解决，据此他提出了两点主张：一是要坚持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二是要倡导生态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坚持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哈维极力宣称，人类的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一个最主要的认识根源就在于对自然与社会、历史与地理关系理解上的机械性。由于人是处于一定时空中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地理结合体中的人，所以在认识人类的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时必须从那种原子论和机械论的观点中解放出来，应坚持自然与社会、历史与地

①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页。

②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48页。

③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

理相互作用、有机融合的思想和原则。因此，哈维主张在分析解决城市空间的环境生态问题时必须正确认识处理社会与生态变迁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巩固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道路之一便是生态政治，为维持这种改造，需要那些特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①另一方面，“人类行为不可能被看成外在于生态系统规划的东西”。^②因此，“社会的和生态的计划如此纠缠在一起，以至于每种社会的（包括文学的和艺术的）计划亦是一种有关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计划，反之亦然。”^③哈维主张，在解决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态环境问题时也应该秉持这一原则，如果“把城市的历史地理学排除在全部环境历史地理学核心之外，我们将为这种话语习惯付出沉重的代价”。^④

第二，迈向一种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性非但不能解决环境生态问题反而会加剧环境生态问题。因为，一方面“可持续性、生态匮乏和人口过剩等概念都同资本逻辑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与此同时，“货币循环和剩余价值的榨取已经成为主要的生态变量”。^⑤因此，必须找到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并借此根本解决当今世界的环境生态问题。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现实迈向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哈维认为有两个原则必须坚守：一是要肩负对人类和自然的共同责任；二是要坚持集体的行动。人类社会要发展和进步，必然要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环境并使之朝着有利于人类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定程度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接受和提倡的；但是哈维提醒我们，在坚持为人类负责和对人类责任的同时不能忘记对自然的责任，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他用恩格斯的名言“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

①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页。

②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

③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④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

⑤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

我们进行报复”^① 告诫我们人类一定不要为所欲为。要迈向生态主义社会政治学，哈维认为集体主义的原则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哈维看来，当代环境困境的产生源于由富人、资本家、有权人士共同形成的霸权阶级规划的结果，而这种霸权规划又是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哲学和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因此，集体行动必须寄托在工人阶级、边缘化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与人群身上。

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

哈维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对立关系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资产阶级和劳动者的矛盾和冲突。对哈维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关系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力关系，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力关系应被视作资本主义社会中影响阶级结构的主要力量。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对立阶级：一个是力求获得利润的资本家，一个是通过剩余劳动来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广大劳动者。这种权力关系是通过市场经济模式来直接加以表达的，在这种权利关系中，劳动权利具有商品的特性，这虽然意味着劳动能够在市场上自由地买卖，劳动者也有权处理自己的劳动；但是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工作，始终摆脱不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我们从剩余价值理论中知道，对劳动力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因此，资本家的积累形式依赖于对劳动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采用。在就业领域，劳动者之间也是相互竞争的，同时，劳动过程也是处于资产阶级的控制和命令之下。在这种无序竞争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可以随意地加大对所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和暴力行为。个别劳动者是无力抵抗这种剥削和暴力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劳动者自己组织成为一个阶级，并依靠阶级整体的力量来抵制资本的剥削和压榨。所以阶级之间的矛盾解释了资产阶级历史中的动力问题，在许多方面，它也是理解资本积累过程的关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因此，对这种生产方式的拥有和管理给予了资本对劳动的特权，雇主控制了生产的手段；国家分配工资和利润的比例是由代表劳动的一方和代表资本的一方之间的阶级斗争结果决定的。然而，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本和劳动间的权力关系需要广泛的制度、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支持，这其中的大多数都是通过国家制度得以提供和管理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空间的资本积累就是劳动力的积累。关于城市空间中的劳动力积累，哈维提出有两个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的内容。

一是与资本主义积累有关的劳动力的数量方面。一般来说，劳动剩余越多，资本扩张的速度就越快，对资本来说，它就更容易控制工厂中的阶级斗争。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工业储备军（*industrial reserved army*）的原则是马克思最有见地的思想，劳动力的迁移、资本的流动以及各种各样的流动过程都表现了对相对过剩人口的需求。但是在哈维看来，这还不够充分，还应该考虑在标准生活条件中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因为它反映了整个文化的、历史的、道德的和环境的因素。对真实的工资需求和整个资产阶级的支出来说，这些成本的改变或生活标准定义的变化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意义。通过购买工人阶级劳动力而形成的内部市场的规模也是与资本积累有关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消费习惯对资产阶级来说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兴趣。

二是劳动力质量方面。它不仅包括技能和培训、心理态度和顺从程度、各种各样的职业道德和占有个人主义，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破碎和分裂，这些破碎和分裂是由于劳动和职业的差异以及由于种族、宗教的原因导致的。工人阶级组织社会等级的能力和意愿主要依赖于阶级意识的创立和维持，还依赖于阶级团结。面对资产阶级经常采用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克服这些破碎和分裂的斗争对理解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动力来说是非常根本的。

但是，哈维强调劳动者也有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权力，他将其概括为十一个方面：生活机会的权利，政治联合和“善”治权利，生产过程中直接劳动者的权利，人的身体的不可侵犯性和完整性，豁免权或变动权，体

面和健康的生活环境的权利，集体控制公共财产资源的权利，尚未出生的人的权利，空间生产的权利，包括不平衡地理学发展在内的差异权，人们作为类存在的权利。^①

同时，哈维也注意到，劳动质量有其自身的特点：劳动质量一旦获得，它不会像其他形式的投资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定会减少；劳动生产力如果得到合适的关照，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其结果就是，每一个劳动市场更具个性和特点，因为在城市区域中，社会政治发展的长期过程增加了劳动质量的独特复杂性。但是，通过去技能化、过度工作、恶劣的劳动关系、失业等方式所导致的对这些劳动质量的剥夺，就像土地的开采一样，会导致对主要生产力的损耗。一夜间，合作的特性会被转化成暴力冲突的特性；科技技能会被丧失；种族和性别的特点有可能被转化成劳动市场和工作地点中的冲突。当然，问题在于竞争的内在法则驱使单个资本家采取剥夺的策略，有时甚至会损害自己阶级的利益。这种结果是否能够得到避免，主要依赖于劳动供给和需求的内在条件，依赖于通过劳动力或资本转移而实现的对劳动力储备的补充的可能性以及在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家管理劳动市场的能力。

因此，在某一个城市劳动市场里，一旦劳动力剩余被耗尽，资本家为了创造之前从未有过的工业储备，只能到其他地方去寻求节约劳动力的创新。这就导致了劳动力使用条件的变化，比如减少对工作日长度的社会和法律的限制，增加对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剥削率等，或者从其他地方把整个剩余劳动力输入进来。在实践中，资本家很好地运用了这些策略。即使劳动成本的少量增加和对劳动组织的较小威胁，也能导致个别积累策略的主要变化。但是，由于这些策略会威胁劳动的安全，因而很容易引起反抗和斗争。

按照哈维的理解，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不是在资本家的控制条件下生产的，而是在

^① 参见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246页。

一个家庭的单元中生产的；其次，决定劳动力交换价值的还包含一系列道德、环境和政治的因素；最后，对资本家来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很难用数量来精确地确定，因为劳动过程是内在的、流动的和创造性的。劳动质量始终具有“异质的特殊的地理的特点”。因此，每一个劳动市场都是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在这样的条件下，城市劳动市场是怎样运行的？哈维认为必须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就意味着劳动人口的扩张，会随着生产手段中组织和科技革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那么，劳动力剩余是怎样生产和得以维持的？哈维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的总法则”提供了一种答案。正是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的共同作用产生了劳动剩余和工业储备大军。科技所导致的失业，使得资本家能够在最小的劳动力供给和最小的需求条件下进行生产。劳动储备的条件又依赖于由社会经济和政治革命所决定的福利传统。然而，能够适应新的科技和新的组织形式的能力又取决于劳动质量的可调适性。虽然这个“总法则”非常有用，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城市劳动市场的动力，在哈维看来，我们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个“总法则”进行一个更为详细的考察。

第一，在城市劳动市场的地理空间中，不同经济规模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同。那些在生产线上具有较低障碍或更易具备扩张能力的资本家更容易被吸引到大的劳动市场上来，因为在大的劳动市场中的相对较小的劳动剩余，单独为他们的启动和扩张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储备。在这里不存在日常劳动力供给的僵化性和固定性。但是，这也会导致一种反作用，表现为在大的劳动市场中，大量的资本家被集中起来使劳动力的供给达到了上限。在没有移民流入和人口增长的情况下，这就拉升了工资水平，同时也激发了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这也就包含着对特定劳动力需求的转变。但是大型的劳动市场也给了资本家代替劳动力的充足的机会，因此，又再一次强调集中的优势。对在劳动力范围内一小部分精英来说，对特定技能的需求或许会减少，但是其他素质，比如纪律性、工作态度、对权威的尊敬、忠诚和合作等，就变得更加重要，而且这些素质很难得以确

保。当然，在狭窄意义上的技能重要性的弱化，并不意味着技能就不重要了。因此，劳动质量的灵活性和弹性是城市劳动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在城市空间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某些分割和断裂。在地理差异的次级市场中，如果某些类型的工人，如住在内城的黑人和郊区的妇女，深陷于交通缺乏之中，如果不同的社会群体因为其收入不同，也就具有不同的交通模式可供选择，那么地理的连贯性就会受到破坏。代替的原则也就被技能的本质所塑造，而这种技能分配又是与城市区域中劳动过程的复杂性相关的。最后，还有诸如失业、就业不足或潜在的就业人口等形成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这种剩余劳动力通常储藏在城市的劳动市场中，虽然他们的移动会引起某些特殊的问题。在所有的这些方面，资本家不得不适应劳动力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比较固定的这个客观事实，这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结构。

哈维把“劳动者自我保护的本能”视作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一大特色。劳动者正是通过自我保护来确保日常的或长期的劳动力(labor power)的再生产。在这背后，存在着诸如家庭组成、性别、家庭血缘关系、个人的网络、社区团结和个人抱负等复杂的条件，这些是资本家不能直接控制的，虽然这里存在着许多资本家可以间接控制和影响的道路。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具有个人和集体的表现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公开地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比如，一些工人或许会把个人的迁移搬迁看作是个人经济改善的一种手段，而另外一些工人则选择待在原地，以便在城市区域中，为自己生活的改善而进行集体的组织和斗争。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围，这可以“从差别的工人阶级的文化”这个概念中得到理解，这个概念把个人主义的要素和集体主义的习惯、对工作生活及其消费的共同态度、社会进步等联系在一起。而且，工资的提升、工作机会的增加并不是人口迁移的唯一动机。迁往大的城市劳动市场的社会心理动机，或许与其同样重要。大城市劳动市场所提供的自由、异化、希望和冒险的特殊混合体，也是非常强的动机。同样的方式，资本家也是因为城市中的经济规模比较大，才被吸引到大的城市劳动市场中来，

因此，个别劳动者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被吸引到城市中来或吸引到大的劳动市场中来。劳动选择的范围和代替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但是，“这却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劳动者个人，由于按照自己的个人利益行事，就在特定的劳动市场中生产了劳动的剩余，这就损害了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①在某种程度上，个别资本家也以同样的方式参与了同一类型的行为，因而而在城市区域中就产生了增加经济活动规模的巨大压力。但是，对于具有阶级意识的劳动组织来说，它们为了保持现有的工资水平和工作生活条件而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迁移，这也对它们形成了不小的压力。它们或许会通过垄断某种工作或对新来的移民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还存在这样的情况，种族、宗教、性别的差别，往往被作为一种控制或有选择性地新的劳动供给整合进旧的城市劳动市场的手段。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是为了说明“劳动市场的分隔是由劳动者想管理控制劳动力供给的欲望造成的，正如雇主力图分化和统治劳动者一样”。^②

在哈维看来，劳动者自我保护的本能会对劳动质量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工作习惯、对权威的尊重、对他人的态度、首创精神和个人主义、自满和忠诚等等，这些都是影响劳动力生产和参与反对资本家统治斗争的重要因素。在城市的劳动市场中，这些品质并不是以整齐划一的形式呈现出来，相反通常都具有高度分化的特点，都倾向于生产特殊的结构的僵化性。作为社会政治发展的长期历史产物，这种僵化的结构具有长期的相对的不灵活性。但是，这些品质会被调整和更改。劳动者能够自我教育，提升他们自己的意识，通过激烈的政治行为，努力把他们所获得的利益带给他人，从而形成有利于次级群体（sub-group）的特殊品质。个别劳动者的动机和雄心，再加上他们的集体行为，在劳动品质的转化中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不依赖于资本家本人动机的。这种自我和集体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32.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32.

改善的动力是资本家必须适应的，而不是由资本家所支配的。

就城市空间中的劳动力价值来说，哈维主张必须将劳动力价值视作不仅是阶级限制的过程，而且也是积极阶级斗争的结果。大量证据表明，20世纪劳动市场的地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连贯的等级体系，这个等级体系是由国际的、国家的、区域的和城市劳动市场所构成的。在这个等级体系中，城市劳动市场是一个根本的分析单元，同样的原因，城市中的劳动力市场是阶级斗争和劳动力发展演化的重要地点。政治过程需要从城市到国家然后又由国家到城市的这样一个不断传输的过程，因而这个过程是异常复杂的。国家规范和管理有可能集中在几个领域，因而对城市劳动市场有着不同的影响，而不是产生完全一致的结果。由于阶级意识、流动性和资本家所处的法律压力方面的不同，这些影响也会因为地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通过上述对劳动与资本的对比分析，哈维发现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劳资矛盾具有了新的变化形式和特点。城市虽然是一个雇佣劳动者阶层在资本循环的时间之内进行生产的一个凝聚体，劳工阶层的地位和命运没有获得根本改变；但是通过创造工人阶级在其中拥有一种相对自由的存在，工人变得难以监控的各种空间，城市中心的去工业化、工作场所和家庭的新的分离、城市与日俱增的住宅隔离，基本上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格局。^①因此，城市的劳资对立和矛盾不再像以前那样使得阶级结构都异常简单，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由于经济环境和生产条件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变化，用哈维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工场和工厂时期反映的是一种工会意识，而在城市空间中则是一种与城市社区相呼应的城市意识。换言之，城市意识是与城市经历相适应的，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塑造了特殊的城市意识。

对于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不同学派和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读视角，而哈维是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角度来解读这场危机

^① 参见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的，他强调指出：“对于我们当前所经历的这场危机，一个粗略性的观点是：尽管表面上看起来问题出在信贷体系和国家—金融节的技术和组织方式，但实际根源却在于与劳方相比资方被赋予了过多的权力，并凭借这些权力压低工人的工资，进而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虽然这一问题暂时被世界某一地区由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及另一地区新生产能力的扩张所掩盖了。”^①而且哈维还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来看待资本与劳动关系，他认为正是“通过创造失业、去工业化、吸收更多外来移民、将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革新，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势力确实得到了强化”。^②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贯穿《资本论》的一条红线，也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方法。正是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中，马克思看到了它们所代表的两大阶级的对立，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正是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中，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这个核心概念，并围绕这个概念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剩余价值的分配；正是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中，马克思才得出了资本主义不能摆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这个根本矛盾、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的结论。

马克思驳斥了那种“把资本的利益和工人利益看作是一致的”的和“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当作是不必要的人为的祸害”的自由主义观点。在这些自由主义人士看来，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同时也对工人阶级利益造成了损害。对此，马克思不无嘲讽地说道：“资产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断言，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千真万确呵！如果资本不雇用工人，工人就会灭亡。如果资本不剥削劳动力，资本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力，资本就得购买劳动力。投入生产的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7 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0 页。

资本即生产资本增加越快，从而产业越繁荣，资产阶级越发财，生意越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越高。”^①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制约一样。只要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他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这就是一再被人称道的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共同性。”^②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根本对抗的和不可调和的，要打破那种认为劳资利益协调和一致的观点，应该清醒地看到工人与资本家利益的对立性和斗争的艰巨性。

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和不可克服的矛盾，马克思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指出：“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③

马克思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分析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基础；二是机器化大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三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必然会导致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

就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言，马克思认为它是奠定在资本与劳动对立之上的。首先，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产生的重要条件。对此马克思指出：“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存在还是不够的。为此首先必须有下列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方是价值或货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创造价值的实体的占有者；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占有者。”^①其次，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实现剩余价值的首要条件。马克思通过考察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分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与剩余价值实现的内在必然联系，他论述道：“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他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②最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理解工人消费本质的钥匙。马克思认为工人的消费分为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属于资本家的生产消费和在生产过程意外发生的属于工人自身的个人消费。但即便是个人消费，也是资本把工人的生活资料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像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③

马克思对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分析的独特视角在于，他是从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角度来对待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机器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和标志，这种生产方式也势必会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从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这三个方面，来揭示机器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独特影响。

第一，机器化大生产把妇女、儿童也纳入了劳动力的范畴。因为“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④所以妇女和儿童也成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8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0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3页。

使用机器的最佳人选，于是资本扩大了雇佣工人的范围和绝对数量。这种影响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力，因为雇佣工人人数的增长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工资的下降和工人实际收入的降低，但资本家却可以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而获取额外的剩余价值和利润。

第二，机器化大生产强化了资本延长工作日的动机。马克思指出：“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末，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他人劳动的贪欲。”^① 机器化大生产对工作日延长的另外一个压力还在于机器的无形损耗。关于机器的无形损耗，马克思认为：“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② 因此，资本要想减少其无形损耗就必须尽可能地缩短机器总价值的再生产时间，而延长工作日无疑成了最重要的选择。

第三，机器化大生产强化了工人的劳动。马克思认为机器化大生产在加剧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的同时也加大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抗程度，这势必会导致工人阶级争取工作日的斗争。但是马克思清醒地看到工作日的缩短不但没有减轻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反而强化了劳动者的强度，这是因为“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这一特殊类别工人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自然也会增加”，而且“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466页。

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① 马克思还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来分析机器化大生产对工人劳动的强化，他指出：“强制缩短工作日，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在缩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达到的程度。”^②

马克思对资本与劳动矛盾的分析的独特贡献还在于，他考察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过剩人口及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和“资本与劳动矛盾”的内在联系。首先，马克思指出机器是作为工人的对立面出现的，机器必然会排斥劳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③ 其次，马克思认为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是资本积累运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趋势是资本的不变部分与可变部分的比例会不断发生变化，而且主要表现为不变资本比例的不断上升和可变资本比例的不断下降，也就是说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在资本积累上体现的本质规律。随着等量资本推动更多劳动趋势的逐步加强，过剩人口越来越多，产业后备军规模越来越大。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表现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④ 最后，马克思认为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必备条件。一方面，“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1—472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728页。

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另一方面“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①归根到底，劳动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只能是听命于资本、服务资本的奴仆。

从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资本与劳动矛盾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他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核心的线索——“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并据此分析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劳动力的特点、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产业后备军和过剩人口的形成等相关理论直接成为哈维分析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哈维关于资本与劳动分析缺乏一个重要视角，他忽略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带来的影响，进而没有深入到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对资本与劳动矛盾带来深刻变革的分析。

三、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两大阶级力量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作为城市空间的主宰者和控制者，享有对城市空间的绝对占有权和支配权。但是，在哈维看来，资产阶级之间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产阶级间又会形成一定的垄断，而垄断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哈维探讨了资产阶级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认为资产阶级内部之所以会产生矛盾主要是由“竞争”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法则决定的。因为在交换领域，每一个资本家都必须遵循价值规律，都必须在自由和平等的世界上进行交换。然而，在表面是自由和个性的世界上，实际上包含着强制和服从。但是，“从资产阶级的个别行为转换到整个资产阶级的共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8页。

同行动，这个过程既不是完整的，也不是完善的——这并不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交换过程始终采取的是个性化的形式。结果就是，每个资本家都按照自己的私人利益行事，这就造成与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相矛盾的结果”。^① 比如表现在劳动力领域，竞争促使每一个资本家是如此地延长和强化劳动过程，以至于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被严重地损坏了。单个企业所造成的整体结果就是危及了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积累的基础。

资产阶级在城市空间中竞争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获得额外利润，因为企业对额外利润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最为根本的。而额外利润的获得既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组织，也可以通过占据有利的地点来获得。因此，哈维坚持认为，“竞争的内在法则迫使资本家去寻求更高的技术和更加有利的地点。这就给予了生产、交换和消费强大的技术和地理动力”。^② 虽然，技术的变化和地点的更换是需要成本的，明智的资本家只有在额外利润超过成本时才会考虑技术的变化和地点的转换与变化。但是，竞争的存在并不让每个资本家都保持那样的理性。个别资本家看到了由科技的更新和地点的变换所带来的无穷利润的机会，在其引诱下，资本家会进行大量的投机，而投机就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对其自身或整个资产阶级来说，这都可能是灾难性的行动。但是，无论是技术还是地点的变化，都会受资本的周转时间的控制和阻碍。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周期，而且投入不同周转的比率也不一样。生产时间和周转时间越长，地理的和科技的惰性也就越大。只有当包含在固定资本中的价值被完全弥补之后，新的技术和地点才能够被获得，也就是说，要想一部分价值不被贬值，只有在它的生命周期之前完全地得到使用。这些生命周期越长，这样的生产系统就会变得更容易受伤害。任何日常劳动力的退出（比如在城市劳动市场中的罢工、外出移民或去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对那些使用大量固定资本的资本家来说，都会招致危险。任何新的方法的采用、新的生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2.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36.

产线的引进或新的配置的投入，都会使资本家正在使用的生产系统和固定资本处于危险的境地。这些问题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资本家在没有稳定的劳动市场和额外投资更新有保障的情况下，就不会采用长期投资。

因此，哈维得出结论：面对由空间中的残酷竞争带来的灾难性结果，资产阶级对城市空间中的科技和地点垄断就成为必需的了，而且这也是确保长期投资的一种主要手段。毕竟大多数资本家都愿意处于竞争之外，而不愿意直面竞争。于是“对额外利润的追求就分成两个主要来源：一是通过竞争的渠道，为了暂时的收益而寻求新的技术和地点；二是通过对技术和地点优势的排他性需求而获得的垄断”。^① 所以，资本家一旦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就会强化自己的垄断特权，尽力阻止竞争的渗入，采取力图封锁具有特殊品质的劳动力供给的通道、限制资金等流入、垄断市场的出口等措施来达到这一目的。

这样，资产阶级不得不在科技和地点优势中进行权衡，但是，资产阶级很难达到“空间平衡”，反而会对城市空间经济造成愈来愈严重的破坏。虽然，先进的技术可以补充较差地点的不足，相应地，较好的地点也可以弥补技术的不足；然而空间竞争的范围是由科技决定的（通过规模经济或商品的范围），与此同时，适当的技术又依赖于输入输出市场区域的规模（更不用说劳动供给的流动了）。因此，通过科技变化发展的手段来寻求额外利润，与从地点中来寻求额外利润，这二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即使没有额外的投机，竞争也会立即引起空间构型和科技的变化，这使得“空间平衡”不大可能。所以，“空间经济越是朝向平衡性的方向前进，资本积累和对额外利润的追求对其破坏也就越是厉害”。^② 与此同时，随着垄断权力逐步扩大，资本家生产的地理景观就趋向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这会对城市中的地理景观带来“创造性破坏”，因为固定资本需要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37.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37.

分期偿还，原有的地理景观会面临贬值的压力。即使在分期偿还的时间之外，科技和空间变化的节奏也会放缓下来。当然，问题在于那样的固定资本与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不一致，这就有可能形成危机。这样，过去科技综合和空间构型的突然中断往往会导致以前的资本大规模地贬值，也会中断以前的垄断特权。

哈维认为，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还表现在与由空间界定的城市劳动市场相关的方面，这主要表现为资本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互矛盾的措施。因为空间中的聚集经济（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使得这些公司非常贪婪，他们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保持对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动力供给的垄断特权。他们有可能采取积极的步骤来保存劳动质量，为了获得劳动合作而与劳动需求妥协让步，把他们自己的一些资源置于提高劳动质量的推动力之后，虽然资产阶级总是关注着对自己有利的能为自己带来剩余价值和利润的那些方面。另一方面，空间或技术的竞争促使他们无情地从一种劳动市场转向另一种劳动市场，而全然不顾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剥夺的结果。在城市区域中的劳动力，他们会遇到对劳动力“创造性破坏”所付出的代价，包括劳动骚乱的爆发和引起可怕的阶级斗争。

但是，哈维也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对技术和地点这些要素的垄断，基于这些优势的对额外利润的追求是有限的。虽然在生产的地理景观形成中，技术和地点之间的交替使用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是，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在劳动的空间和技术分工上会形成垄断特权。然而，资本积累的过程要求破除这种垄断特权。这样在资本积累和垄断特权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而这只能通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才能解决，这就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贬值。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景观就在垄断控制的停滞和竞争性增长动力的破坏之间蹒跚行进着”。^①

哈维强调指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也即资产阶级和劳动者的矛盾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39.

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难以克服的根本矛盾，这必然会促使资本家寻求建立一种统治阶级联盟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来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能够维持和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由竞争所导致的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也加剧了形成阶级联盟的需求。然而城市空间中统治阶级联盟的形成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建立在以城市空间中“结构性一致”这种趋势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才促进了统治阶级联盟的形成和发展，进而对城市空间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一致”的趋势

哈维认为，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关系推动了城市区域中“结构性一致”。一方面，劳动者与工人阶级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结构性一致”。作为自由的劳动者可以依靠他们的技能、竞争程度、分割形式和需求的层次在社会决定的通勤范围内寻找工作的机会。他们能够自由地惠顾或购买各种各样的设施、服务、房屋等。对某些个人或家庭来说，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或许并未相连，尤其是那些处在边缘的劳动者有可能在一个市场区域工作，而在另外一个市场购物；而且诸如技能、身份系统及其各种劳动市场的分隔等因素，都会阻止城市区域中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生活标准和社会供给（Social provisions）的平均化。但是从整体结果来讲，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还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作和消费的城市区域而存在，正如哈维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有一个特点需要考虑，那就是工作和消费机会是潜在统一体这个规则，所有的偏差也是围绕这个准则运行的”，^①于是在商品和劳动市场中的市场区域系统中，劳动者就把他们的工资转化成为了一定形式、一定标准和一定类型的消费。

而另一方面，相对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来说资本家会形成更强大的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40.

“结构性一致”。技术混合体 (technological mix) 为资本家提供了一个控制劳动者的主要手段, 通过这个手段, 资本家可以调节剩余劳动的生产、工资的水平 and 范围以及工作的结构和等级。对城市区域中达成“结构性一致”的种类来说, 采用新技术的斗争是非常关键的。由资本家或劳动者展开的维持或提高劳动数量和质量斗争也非常重要, 因为它们共同决定了技术可能性的范围。合作和一致也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对资本家和劳动者来说, 尽管处在资本的整个统治之下, 但是, 这些斗争具有对工作和生活标准能够提供某种程度的稳定和安好的好处。在城市区域中, 居住 (accommodation) 发挥了一个十分关键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为生产和消费给予了一定居住区域一个相对稳定性的结构方面。虽然资本家可以选择在城市区域中、也可以在城市区域外去购买和销售商品, 但是对在这里运作的大多数资本来说, 内部市场的数量和质量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城市经济中, 其趋势就是生产和消费领域具有非常强大的重要联系, 而且这种联系越是紧密城市经济的动力就会变得越是强劲。工作地点和生活空间中的社会关系里的“结构性一致”趋势, 也依赖于生产和消费领域技术革新的同步推行。这种一致包含了生活标准、生存的质量和方式、工作满意度、社会的等级以及对工作生活娱乐的态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在生产领域, 即使在面对过去投资分期偿还的障碍和压力下, 竞争、阶级斗争及其合作生产的需要等因素都推动资本家不断地进行革新和创新; 在消费领域, 由于样式、风格、追求地位、个人占有主义或对社会进步的诉求等不断变化, 也在不断地进行变革和创新。这样, 家庭中狭隘的血缘关系就被工作地点中整个的社会关系所代替, 相应地, 在工作地点中的改变对家庭中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家庭的联系、亲属关系以及性别和年龄关系适应了工业组织的新形式, 与此同时, 雇主也随意地把这些家庭关系作为控制和合作的手段。这些劳动力的质量通过工作和生活经历共同得到了提升。

资本和劳动的再生产需要大量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 这种需要又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城市劳动市场中的“结构性一致”的趋势。物质基础

设施是指以像道路、桥梁、下水道、房屋、学校、工厂、购物中心等建筑环境形式镶嵌在土地之中的那部分设施，它们共同作为一个人类创造的、用以支持生产和消费的特殊空间资源的复合体。相较物质基础设施而言，社会基础设施这个概念很难界定，它们不像建筑环境那样固定在空间之中，它们有多种方向，而且每一个服务种类的市场区域都非常模糊，在规模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它们吸收了大量资本，它们的整体作用就是巩固城市区域中“结构性一致”的这种趋势。但是，和城市区域中形成的结构性层次相伴随的是，这些社会基础设施的提供也倾向于组织上的等级制，因而在这个等级制中充满了冲突。所以，“社会基础设施的再生产就充满了私人的和阶级压力的奇特混合，社会习俗和传统、政治过程都包含在这个等级化组织的国家设备之中”。^①

由此可见，哈维通过对物质的或社会的基础设施的考察，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了有关城市区域的概念。第一，城市区域是一系列的商品和劳动市场的相互叠加和渗透；第二，城市区域是一套交叉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力；第三，城市区域产生了简单的生产和消费的结构一致；最后城市区域也是一种包含有一定物质和社会资产的生活社区，其本身就是长期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这个过程的产物，这些资产规定了社区的价值，正是通过对这些资产合适的维护、提升、调配和使用，劳动力生产才被持续地保存和增加扩大，与此同时，才确保了资本的再生产和扩张。

哈维指出，在城市区域中，“阶级联盟的目的是保存或提升既得的生产 and 消费模式、占统治地位的技术复合体、一定的社会关系类型、利润和工资水平、劳动力的素质、企业的管理技能、社会和物质的基础设施及其生活和工作的文化特质”。^②但是，阶级联盟始终是不稳定的，它的空间范围总是模糊的，通常在内部存在某种程度的分隔，比如城市和郊区的分割。对其他城市区域来说，它的姿态有可能是防御性的，也可能是侵略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1.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48.

性的。

从内部看，利润的追求、资本的积累及其在这之上展开的多层面的阶级分裂和阶级斗争等因素，提供了不安的社会动力。面对这种情形，内部的劳动分工和外部的压力使得阶级联盟很难被整合为一个整体。当面对未来的规划时其差异就更明显了。不同的利益朝着不同的方向推进，每一方都声称自己的前进方向就代表着公共利益。资产阶级中派系分裂的差异（比如在金融、商业、生产者、不动产和土地的财产利益之间，或在地方性生产者和跨国组织之间的分裂）与工人阶级中的派系分裂不相上下（像在男人和妇女之间、熟练蓝领工人白领工人和不熟练的蓝领白领工人之间、就业的工人和失业的工人之间、不同的阶层之间的分裂）。这就使得在阶级联盟行程中很难达成一致的阶级利益。更为糟糕的是，个人具有多重角色并朝着不同的方向被“撕碎”，工人有可能同时是房主、消费者、父母和投资者，他们有可能在十分不一致的角色中参与阶级联盟。也没有哪一种阶级联盟能够在不损害另一角色中的阶级联盟的前提下而有利于现有角色的阶级联盟，这是一个异常两难的境地。所以，“城市和区域政治的大部分艺术，就在于在各种群体和利益集团之间找到一种权衡成本和利益的方法，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对统治联盟的最大支持还要包含竞争和垄断特权”。^①

从外部条件来看，阶级联盟稳定性也承受着两种外在压力。首先，所有的经济机构或组织都会面临“是待在原地寻求地方发展，还是迁移到那些利润、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生活方式、环境质量和未来机会显得更好的地方”这个选择。对所有这些经济机构或组织来说，这个压力并不是完全一致和平衡的。根据不同阶级和阶层所具有的特权、它们所拥有的资产及其所受地域的实际限制，不同阶级和阶层具有的地理移动搬迁能力也有所不同。银行和金融投资家拥有对大多数地理性移动资产的控制权——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51.

货币，但是他们也被深深地束缚在城市区域中，因为他们具有大量的地方性的债务；跨国公司似乎能够快速地将自己的生产安置到其他地方，但有时候由于它们在原来地方具有固定资本、地方劳动素质和基础设施的特殊混合，所以它们也很难移动；受广泛亲属关系束缚的工人或许利用这些亲属关系来移动而不是局限于原来的地方。这些例子都表明，“关于支持或者放弃、建构或损害某一阶级联盟的决策，必须通过解决这种复杂的冲突的关系才能够作出阶级联盟的决策。同一个集团利益会有可能损害他们所积极支持的另一个集团的利益”。^①

与此同时，阶级联盟形成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外在的破坏性压力。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这种压力一方面体现为迁入劳动力的低成本及其劳动素质的不同、外部资本对本地生产和零售的接管、本地一旦生产出来就对外进口的商品、货币资本的涌入、财政收入的再分配等等这一系列因素，都改变了阶级联盟中的参与力量的平衡。另一方面表现在阶级联盟内部的谈判和协商中，动员外部关系的能力和可能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交涉力量。相对于那些缺乏这种力量的组织来说，那些能够轻易号召外部帮助的阶级和阶层（比如那些在罢工中能够提供资金支持的工会、那些能动员外部力量来镇压平息骚乱的资本家）就更具有优势；相反地，那些由于在本地不能获得满意需求而迁移到另外地方的组织，比起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组织，处于一个相对较强势的位置。

这样，“阶级联盟形成的含混性和不稳定性为相对自治的城市政治的出现，创造了一个政治空间。角色和方向的含混性、个人群体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再加上资本积累的破坏性力量（比如增长、技术的变化、阶级冲突、过度积累的危机），这些都使社会关系永远处于流动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并经常使它们陷入一种社会转型的模糊不清的紧张之中”。^② 尤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51.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53.

其是在经济危机中的特定地域发生贬值所导致的冲突出现时，阶级联盟的力量显得非常重要。它也可以在其他城市区域形成政治性的联盟，这就建构了政治权力的区域或国家的形式。但是，在城市区域中形成的阶级联盟是资本主义景观中一种强大的塑造力量。在地理空间中资本积累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展开，又反过来塑造了它们在这些基本方式中的动力。

哈维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每一个人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都参与和维护了阶级联盟。所有的经济机构和组织都占有空间，都具有控制他们周围空间活动的兴趣。而且，城市经济中“结构性一致”的生产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兴趣去找到政治手段去影响这种“结构性一致”所采取的形式。但是，有些人的兴趣比其他人的兴趣更大。比如在建筑环境中的投资，如果不破坏就不能够移动；如果要保持这些大量资本投资的价值，那么，一定层次上的生产和消费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因此，拥有这些资产的人，既包括资产阶级、金融机构，也包括拥有这些所有权的上层工人，他们都极力保护其资产和生产消费模式，以使其增殖。又比如，在维持郊区的持续繁荣方面，所有这些阶级都有着既定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护其共同的利益共同参与到阶级联盟中来。尤其是在具有更大固定性的资本和劳动中，土地和财产的主人、开发商和建筑商、当地政府以及那些拥有抵押权和公共债务的机构，都会从形成阶级联盟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中获得更多的实惠和收入，所以，相较于临时的劳工、巡回的商人和漫游的跨国公司来说，他们能够更好地防范地方贬值的威胁。鉴于此，哈维感叹道：“在城市区域中，围绕着保护和增加不可移动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这一原则而结成的阶级联盟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所有的阶级和阶层都有兴趣参与到这一政治游戏中来。”^①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路易斯·沃斯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个体意义上的都市人已经变得软弱无力，只有加入由兴趣爱好相似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49.

的人结成的群体才能实现自身的完满”。^①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统治阶级联盟如果想在资本主义系统中得以保留并成功地再生产它得以存在的条件，那么它就必须与资本流通和资本积累的基本逻辑相适应。无论是精神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任何统治阶级联盟都不得不是资产阶级阶级联盟的赞成者。

而且阶级联盟利益还不仅局限于此，那些因为固定资本而不能自由移动的生产者以及那些因对市场或投入具有一定垄断权力的人，都能够与商人、职业者、服务业者和国家公务员结成联盟，因为他们都从地方的财政收入流通中获取收入来支持和维护城市经济的发展。甚至也有一部分劳动者会聚集在这个阶级联盟中，将其作为进一步提升其地位的手段，以便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供保护。在城市区域中，这些阶级联盟的一个典型表现形式就是，他们积极热情地参与到社区中并力图塑造一种团结进步的社区意识，从而维护社区利益。这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当代表现形式，是阶级关系和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

但是，哈维强调“结构性一致”仅仅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因为这种趋势存在于以下各种毁坏和破坏它的力量之中：通过技术革新、生产革新和社会组织更新而展开的竞争，关于分配的阶级斗争，生产和再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空间关系的转变，周转时间和资本积累的加速等等，都导致了这种永久的不平衡性。因此，平衡性只有偶尔才能够取得，而且也是非常短暂的。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围绕城市空间的利用和争夺已经成为城市阶级斗争的重要部分。因此，“城市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使得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负载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矛盾，即为了资本积累、为了剥削劳动力而生产，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就是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利润和需要

^① 路易斯·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载孙逊主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页。

之间的矛盾，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政治表现就是阶级斗争”。^①

第二节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不平衡地理发展

“不平衡地理发展”是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空间批判的重要维度。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哈维的立足点和突出点是空间问题；但与此同时，哈维又是一个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空间问题的政治向度和社会向度极为关注和敏感。因此，在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的理论过程中，哈维就对不平衡发展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它作为解读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一个重要理论入口。哈维之所以提出和研究不平衡地理发展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回答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在面临多次危机和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还能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②

在理论上，哈维把“空间规模的生产”和“地理差异的生产”作为其不平衡地理发展这个理论主体的两翼。他所理解的“空间规模生产”主要指的是诸如个人、家庭、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等不同空间等级下社会生活等级制度的构造特点，尤其是在当今时代，空间规模的生产更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宏大的背景；而“地理差异的生产”主要表达的是，城市空间中人们的居住差异和郊区化的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是特定规模上历史地理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哈维始终主张，“我们不得不将城市区域视作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中的一个地理实体”。^③ 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① 张应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②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③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59.

中充满了分割和碎片，这表现在经济规模和政治运行规模之间存在着日益增大的裂痕。

在哈维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开拓空间、占有空间、利用空间、交换空间和消费空间的历史；对城市空间的生产、占有、分配和消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哈维关注的焦点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如何塑造、如何占有的，他深入探讨了影响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内在机制。哈维主张，是“七大活动领域”和地理学的“三大法则”共同形塑了资本主义独特的地理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哈维所理解的“七大活动领域”是指“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制度和行政框架、生产与劳动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日常生活和人类的再生产、人类对世界的感知”这七个方面，哈维反对孤立静止地看待这七个方面的作用，主张“七大活动共同作用，创造了质量显著不同的空间。这些空间反过来又要受到各自的政治哲学、生活方式的影响”。^①哈维所声称的地理学“三大法则”，一是资本具有打破资本积累的地域限制的原则；二是货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必须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才能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原则；三是资本向剩余价值和利润最易获得的地域集中的原则。

哈维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发展的对立和矛盾，指出：“一方面，空间障碍和地区差异必须被打破。然而，完成这个最终目标的手段却是必须生产出新的地理差异，这些地理差异成为将要被克服的新型空间障碍。资本主义的地理的组织化使这些矛盾内化进价值形式。”^②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资本主义利用空间中的差异获得了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不平衡地理发展又构成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阻力，资本主义要维持存在和获得发展，必须克服这些地理差异和空间矛盾。他强调指出：“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

②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417.

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集中化与分散化之间在历史上有名的紧张关系，现在以各种新的方式产生出来了。”^① 哈维从全球化、居住差异和郊区化三个维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一、不平衡地理发展与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它通常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及贸易上互相依存、文化上相互交流和交融的过程。一般来说，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也就是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所形成的全球范围内经济的有机联系。在当今世界城市空间发展中，作为衡量一个城市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重要标志的城市化与作为人类社会总趋势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交织和叠加在一起，因此，以经济全球化为参照来研究城市化发展就成为一个必需的课题。

从全球化的城市发展背景来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由一幅城市发展不平衡交织起来的画面。

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中，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城市之间高度竞争的网路，不同区域、地区和国家的城市发展之间不平衡。城市人口逐渐在世界人口中占据统治地位，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日益成为影响全球政治经济区域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和潮流。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截然不同的，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城市化进程逐渐放缓下来或趋于稳定；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还是强烈程度都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城市无论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还是城市面临的各种压力等方面，都

^①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0页。

有较之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优势，发达国家城市的发展更处于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地点、区域和国家城市空间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城市空间内部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分裂城市”和“极化城市”的存在。在几乎世界所有城市的内部，我们都可以见到两极分化现象，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比如繁荣的商业区、富足的居住区和贫民窟、居住恶化地区和郊区化现象的并存。在城市空间的“分裂”和“极化”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贫困人口的存在。城市贫困严重影响着妇女、儿童、失业者弱势群体，这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种族冲突、民族危机和城市暴力等城市问题，直接影响了整个城市的稳定。

为了解答资本主义“为什么在经历一系列的挫折和危机之后还能够幸存下来”这个历史性难题，哈维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寻找方法论源泉。哈维深刻指出，正是由于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而在当今全球化世界的背景中，资本主义凭借不平衡地理发展来展开资本积累在不同空间的布局，不断生产着“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

哈维在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始终不移地贯穿着“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思想，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更加中肯地考虑像“全球化”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地理意义和阶级意义。哈维把“全球化”理解为是资本主义地理的深刻重组的一个过程。对资本积累来说，由于不同地点空间的生态、政治、社会及文化的不同，从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资本流”能找到一些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占据的地域。这对不同的社会形态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哈维所指出的那样，“在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遭遇中，一些社会形态适时地进行调整使自己积极地介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的形式中，而其他形态则没有这样做，其原因多种多样，但后果却非常重要”。^①

^①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地理的深刻重组主要体现为克服空间障碍、“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冲动和努力上。为此，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降低在商品在空间中运动的成本，这体现为一系列的科技创新，尤其是在交通和通讯领域的革新和进步，这些都大大解放了距离对商品的约束和信息传输的成本；二是通过建立固定的物质基础设施来达到克服空间障碍的目的，这表现为一系列不动产资本及哈维所称的“第二自然”的建立；三是建立一系列的领土组织，主要是以国家权力对货币、法律和政治的调节，以便更好地“通过时间消灭空间”。

哈维极力主张，不平衡地理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在地理空间上体现出来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他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角度把全球化过程看作是不平衡的时间和地理发展的一个生产过程，并把地缘政治方案问题作为全球化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哈维看来，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是全球化是一场主要由美国发动的地缘政治讨伐运动。在他看来，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从一开始就一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正是美国充当整个过程的驱动力和监督人，全球化才能以现在特有的方式发生和行进。美国一直是在本土思考、全球行动。美国通过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联盟，为其提供军事和法律保护。这样，美国资产阶级就通过其外交、军事和商业政策的代理机构的运作，推动全球化朝着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因此，“全球化总是特定的权力在特定的地方所追求和支持的特殊计划，这些特定的权力从贸易自由中一直寻求并已经获得了惊人的利益以及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加”。^①第二个是与资本主义传统的核心地带一样，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暴力和“创造性破坏”也广泛发生于其他地方。这种暴力和“创造性破坏”既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也对地方、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前景带来了阴影和不确定性。

^①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哈维不仅看到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事实，而且还深入探究了经济全球化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深层原因。在他看来，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表现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逻辑：区域逻辑和资本主义逻辑，正是在这两种逻辑的驱动下才致使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地理发展。

所谓区域逻辑又称国家权力的领土逻辑，它是指国家为了该国家地区利益和公共民众诉求等方面的要求而采取的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一系列的策略。区域逻辑主要表现为“在空间和时间中运行的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导致资本积累的地理学模式发生了被动性变革”。^①在这一逻辑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超越国家民族和地区的边界而日益表现出“区域性”特征，即区域组织起到了超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作用。在哈维看来，区域性逻辑集中体现在帝国主义这种国家性质上。从地理空间来看，帝国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空间控制策略，也是一种社会权力的重要体现，“这种控制力既具有扩张性，又具有强制性，其结果则是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引导资本流向有利于帝国主义者或霸权国家利益的领域，而这可能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②

所谓资本主义逻辑，是指货币和资本在一国及不同国家内部流动而不断实现资本积累、实现剩余价值和利润的过程。这主要体现为一些企业、公司尤其是跨国企业和公司的资本增殖运动。哈维认为这两种逻辑虽然运行特征和目的上有所差异，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国家与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国家与企业之间都是利益共同体。所以，无论是区域逻辑还是资本主义逻辑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化的战略，以确保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和领导地位。

①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哈维认为不平衡地理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征，同时不平衡地理发展又是资本主义确保在全球化中优势地位的重要条件。因为不平衡地理发展是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方面，资本家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地理壁垒，不管是空间还是环境他们永远在试图征服和逾越这些壁垒。另一方面，资本家积极开拓新的空间，以包含了大量固定和不可移动资本（他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资本，否则其价值将蒙受损失）的人造环境形式，制造新的地理壁垒”。^①而且，哈维认为对差异性的维持和对不均衡发展的维护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不断得以发展壮大的必备条件，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包含着新的地理空间的开拓，而且毁掉原有空间创造出新的空间是解决剩余资本吸收问题的一种很好的方法”。^②

哈维也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本《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构。哈维主张《共产党宣言》揭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那就是——“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地理的重新安排和重构、空间策略和地理政治因素、不平衡地理发展等，都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态的关键方面”^③。哈维在肯定《共产党宣言》所包含的伟大的地理空间思想的同时，也对这个文本进行了批评，认为它的一个最大缺点在于未能描绘出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哈维反对马克思把世界民族简单地划分为“文明的”和“野蛮的”民族，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这种划分逻辑就把资本积累模式看作是一种“中心—外围”的普遍模式，这太过于简单，甚至会造成某种误导。因此，必须更加完整地、理论化地理解资本主义发展中空间或地方的辩证法。

哈维继承列斐伏尔的“资产阶级把空间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思想，把全球化策略视为资本主义维持其统治的一种空间策略。列斐伏尔曾深刻指出：“今天，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一种用来实现多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6 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7 页。

③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 页。

个目标的工具：分散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地点；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并且通过技术官僚，管理整个社会，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①在哈维看来，资产阶级在面对威胁其存在的阶级力量兴起时，就会采取分散、分而治之和地理上瓦解他们的空间策略以达到控制和统治其他阶级的目的。不仅如此，在资本作为主导力量的全球化的当今时代，资本主义“还通过把市场选择的原则转变为集团划分的机制来实现这个目的。其结果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中植入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性别和其他的社会划分”。^②这样的地理景观无疑是充满矛盾和不平衡的，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同时也要看到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其地理景观也因为资本、阶级结构、地理环境等等差异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特征。

二、不平衡地理发展与居住差异

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无论是对工人阶级来说还是对资产阶级来讲，住房问题都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在所有的优先需求中，对拥有一个足够的避难所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从资本家的立场来说，他们对住房这个特殊的空间产品的生产也非常感兴趣，因为投资房地产业能为其带来巨大的剩余价值和丰厚的利润。

与此同时，围绕住房问题展开的范围广泛的阶级斗争也是城市空间中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对城市过程有着重大的影响。对资产阶级来说，生产的聚集和集中引起了为工人提供住房的难题，最初资本家通过建造公司房屋来解决，但是随后政策发生了转移，资本家为了推卸责任和减轻自己的压力和负担，就把为工人建造房屋的任务推给市场。而对工

^①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②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人来说，在劳动力成本中，住房成本是一项重要的大额开支，这就意味着必须大力压缩家庭收入。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家把房地产业作为一种快速资本积累的方式和投资的重点领域：住房完全商品化。这样在房地产市场中形成了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越多的阶级和个人就拥有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房屋；反之，那些拥有资源禀赋较少的阶级和个人则在房地产市场中居于劣势地位，有时甚至连最起码的住房条件也得不到满足。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居住差异问题。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

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路易斯·沃斯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就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隔离和差异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他认为“肤色、种族遗传、经济与社会地位、品味与嗜好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导致个体在空间上的隔离”，更为重要的是沃斯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所特有的社会关系入手来寻找这种城市空间隔离的根本原因：“由于城市集合体的成员的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血缘纽带、邻里关系和共同的民间传统影响下形成的情感已不复存在，或变得非常淡薄。在这种环境中，竞争和正式的控制机制取代了俗民社会赖以存在的坚实纽带。”^①工作的性质、收入、社会地位、种族和民族特征、品味、嗜好等都是导致空间隔离和差异的重要因素。于是，地位和需要相似或相同的人倾向于居住在同一地区和社区，不同地区和居住区的人口倾向于彼此隔离。整个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就好像是社会世界的马赛克图，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点和居住景观。

哈维的居住差异理论是建立在以下四个假设基础之上的，一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居住差异可以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来解释；二是居住区域（邻里或社区）为个人在价值、期望、消费习惯、市场能力和意识形态等

^① 路易斯·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载孙逊主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9 页。

方面的巨大区别，提供了差异的环境；三是大量的不同人口集中在不同的社区，这有助于形成阶级意识的碎片化和分割化；四是居住差异的类型反映和包含了许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在哈维看来，这些假设提供了一个居住差异和社会秩序间的必要联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哈维才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居住差异分析。

哈维主张，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是各种主要力量包括封建力量和派生力量共同发挥作用才最终导致了居住差异的形成和发展。他把它们归结为以下五种力量，并依次对其进行了考察。^①

第一，劳动分工和功能的专门化。

生产的扩大要求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改善工业组织、通讯交通、交换和分配的形式。这些提高和改善意味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和功能的进一步专门化。当社会的科技和组织的基础发生变化时，要求那些创造社会差异潜在条件的社会关系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劳动分工和功能的进一步专门化会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一步划分为更多的层次，社会冲突有可能在这些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间发生。

第二，消费阶级或分配群体。

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其物质生产有效需求的缺乏会阻碍资本积累的进程。如果不考虑内在于人口增长中增加的需求，也不考虑对外贸易，那么有效需求就依赖于创立一个能够吸收日益增加的商品生产的国内市场。哈维极力赞成马克思的观点，即创造一个新的消费模式和新的社会需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来说是异常关键的，否则，资本积累就会面临固定需求不能增加的障碍，这也就意味着生产过剩和危机。

第三，权力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非市场化的制度必须进行有序安排，只有这样才能支撑和维持资本和劳动间的权力关系，也才能为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

^① 参见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p.117-120.

服务。哈维认为，按照马克思的主张，生产中劳动的合作性需要一个“指令权威”（direct authority），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扩大，一个专业的工人群体——管理人员、经理层、领班等等——必须在指导生产中具有一定的权力。对一个整体的经济来说，这些管理功能主要存在于国家活动的领域中——这被理解为一种法律的、管理的、官僚政治的、军事的和政治功能的混合体。在国家领域和公司企业领域的权力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一般来说，权力关系的结构与资本积累动力所强加的必要性是一致的。因此，权力关系为人口的社会差异提供了一个基础。

第四，阶级意识形态。

哈维主张，阶级终究会成为个人的联合体，而且只有当这种联合体埋藏了其中的所有差别之后，才能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形成阶级认同（class identity）的意识。既然资本主义要生存和发展，那么它就不得不参与马克思所讲的阶级意识的创立过程。这样，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图塑造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秩序永恒化，划分社会差别、加剧资本和劳动之间对立的意识。

第五，移动机会。

在生产、交换、交通通讯和消费组织中，变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作出巨大的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个人必须准备变换其技能，改变其地理位置和转变消费习惯，等等。这就意味着在人口中始终存在移动或流动的机会。但是，就流动性而言，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无疑会创造巨大的不稳定性。为了社会稳定，一定的社会变化是必需的，要找到一些比较系统的方法来组织管理流动的机会。这就引起了流动机会的结构在某些方面的重要变化。

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居住差异就意味着不同阶级和群体在获取市场能力所需的稀缺资源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空间使用权的差异。比如，因家庭、社区和教育资源差异而导致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不同，要么有利于市场能力的代内转换，要么就会对流动机会形成严格限制。这些机会如此地被结构化以至于白领劳动力只能在白领邻里和社区再

生产，蓝领劳动力也只能在蓝领邻里和社区再生产。这样，社区就成为了再生产的地点，在这里，适合于生产地点的劳动力被再生产着。而所谓的市场能力则是包含着态度、价值、期望和特殊技能等一系列内容的综合体。从形成居住差异的角度看，很明显，是个人在作出抉择和表达其喜好。

但是，是什么创造和形成了不同市场能力中的不同态度、价值、期望和特殊技能？哈维把这一原因归结为社区，他确信是社区为各种不同的价值系统、渴望及其期望提供了社会环境。居住差异和社区相互作用对方、相互强化各自的特色。这样，居住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社区，并导致了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分化。比如，工人阶级的邻里，就典型地生产了一种有助于工人阶级的价值；这些价值深深地镶嵌在社区的认知、语言和道德准则中，成为个人用以处理世界中的概念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城市中，这种邻里和价值系统的稳定性，一直是城市变化动力所考虑的重要因素。这种价值系统的再生产促进了消费阶级的再生产和与劳动分工有关的群体的形成，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限制了流动的机会。由这种限制所产生的生活经历的同质化，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趋势，即相对不变的社会群体出现在相对不变的具有居住差异的结构中。哈维认为，这会对马克思所讲的阶级意识形成强烈的冲击，因为“一旦这被转变成一种社会意识（这种意识是以邻里和社区作为地点的），一旦这种社会意识成为社会行动的基础，那么，社区意识就会作为行动的跳板和社会冲突的地点，从而取代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意识”。^①

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金融和政府机构对广泛的居住差异也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金融和政府机构被权力关系进行等级化的安排，这从总体上来说支持资本主义秩序的，他们的功能就是把国家需求和地方行为及其决策协调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房屋市场行为中宏观的方面和微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20.

观的方面就得以协调起来。而它们管理、控制着城市化过程的动力，通常都是按照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管理的利益来进行的。在金融和政府机构的推动下，形成了不同的次级住房市场，这进一步提升了这些机构管理城市化过程的效率。但是，与此同时，它进一步限制了个人选择的能力，这种特殊的市场机制恰恰缩减了穷人选择的范围，由此就进一步扩大了穷人和富人之间居住差异的鸿沟。

从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城市其主要功能是政治文化中心辅之以商贸功能。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最初是以工业城市的形态呈现出来，其中其作用的主体力量是资本，在这些城市中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便有空间上的间隔也不会太遥远。而当今城市空间在居住地与工作地上变为二者在功能上区分明显，在空间上距离遥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与历史学教授艾拉·卡茨纳尔逊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分化对城市不平衡地理发展的重要意义。首先，家庭不再是生产的主要单元或地点。第二，大城镇和城市的整个区域逐渐地或用于居住，或用于工厂生产。第三，城市的居住区变得越来越同质化。^①透过居住地与工作地的分离、居住空间同质化的表象，看到的是货币和市场规则造就这种分离和差异的实质。由于居住地与工作地的分离，再加上以社区形式体现出来的居住地的同质化，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空间分布的地理差异和以等级制为特征的不同居住地在城市空间上的特有布局，这又是不平衡地理发展在空间占有和分配上的具体体现。

早在 140 多年前，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就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住宅短缺和居住差异问题进行过深刻论述。在该文中恩格斯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住房问题，唯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问题。

恩格斯认为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不一定能够让普通劳动

^① 参见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 页。

人民直接受惠。因为一方面经济越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就越迅猛，相应的就有数量越庞大的人口需要住房；另一方面，经济越发展城市空间中的土地就越成为资本投机和剩余价值增殖的对象，这样土地价格就越高从而带动房价的提高，造成的结果是普通民众更无力解决住房问题。虽然也会看到资本家为解决工人住房和改善工人居住区环境卫生状况的努力，但这都是服从于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和使自己生存免于威胁的目的。所以就住房而言，我们不能指望靠资本家的善心来解决普通民众的住房问题，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目的和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的。

恩格斯还强调指出，住房短缺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又是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因为“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等等的不断改善经常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并把他们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涌进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① 所以，“资本家不愿意，工人则没有能力”^② 解决住房问题。恩格斯也指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住房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这样的社会中，住房短缺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对健康等等的各种反作用，只有在产生这种现象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才能消除。”^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

三、不平衡发展与郊区化

郊区化始于 20 世纪初，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尤以美国城市郊区化最为突出。郊区化生动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不平衡发展，因为只有那些经济条件较为富裕的中产阶级或者更为富裕的阶层和群体才有能力迁往郊区；而广大的城市贫民和低收入者不得不待在市区忍受日益严重的“城市病”。

郊区化之所以如此愈演愈烈，这与追求一种乌托邦的生活方式不无联系。一方面是城市化过程中日益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促使中产阶级或者较为富裕的人逃离市中心，因为在市区土地短缺、地价迅速上涨、建筑密集、交通拥挤、环境质量日益恶化，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郊区可以接近自然，拥有清新的空间、足够的空间和浪漫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发明以小汽车为标志的便捷的交通工具，在郊区拥有一栋独立住宅俨然城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指出的那样：“它（郊区）是一个隔离的社会，与城市分开，不仅是空间上分开，而且是从阶层上分开，是一种上流社会的绿色的聚居区。”^①

但是哈维认为，郊区化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郊区化不是被动生产的，相反，它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因素来生产的。因为郊区化支持了产品的积极需求，从而也就更有助于资本积累。随着人口大规模地迁往郊区，经济活动也随之向郊区转移。最早随着迁往郊区人口的是零售业和服务业，但是由于城市发展使制造业面临空间拥挤、成本上升等问题，所以制造业也紧随其后大规模地迁往郊区。所以哈维倾向于把郊区生活看作被创造的一种神话，“这种神话来自于个人主义的占有欲，它是由广告人培育的，是由资本积累逻辑所驱使的”，但是哈维也十分清醒地指出这种神话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在他看来，“美国郊区，曾经是资本积累内部矛盾的一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变化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06 页。

种反映，如今成了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障碍。为了维护郊区的生活方式和特权，排除不必要的增长，郊区的政治权力越来越趋于保守”。^①

在哈维看来，郊区化不仅有助于资本积累，而且郊区化还作为解决阶级斗争的有效办法。哈维总结到，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所发生的阶级斗争来看，阶级斗争的发生与工人阶级的大量集中和城市中的失业相联系。1848年的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城市暴力及其伴随着的1877年美国铁路工人的大罢工，这些都表明在特定区域“危险阶级”的集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的危险性。资产阶级的反应就是采取分散的策略，郊区廉价的土地、住房和交通正好是这个解决办法的一部分，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资金投资于建筑环境。资产阶级对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所发生的骚乱的反应是什么呢？开辟郊区，促进低收入和黑人团体拥有住房，改善交通系统，等等。^②

但是如果任由郊区化随意发展，就会造成更大的城市发展的不平衡，甚至会违背郊区化的初衷，郊区生活会成为其良好愿望的表面。虽然在涌往郊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型的社区，但是这种社区却呈现出千篇一律和同质化的特征：样式一律难以辨别的房屋、一样的道路、同一个阶级的居民、同样的生活方式。对此，刘易斯·芒福德感叹道：“不论在外表上或是内容上，都来自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在大都市市中心制造的。这样的结果是，在我们的时代，往郊区逃避的最终结局是逃到一个低级的式样统一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再想往别处逃是不可能的，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③ 所以，芒福德得出结论说：“发展郊区只能是暂时的一种解决办法，而且这种办法代价昂贵。一旦郊区的布局形式普遍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22.

② 参见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p.28-29.

③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变化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

化了，到处都是，那末，它原先引以自豪的那种优点，也就开始消失了。”^①

如何克服郊区化所带来的问题，使城市朝着更加平衡和谐的方向发展，霍华德在《明天的花园城市》中给我们提供了思路。诚如刘易斯·芒福德所精辟指出的那样，霍华德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城市有机体”这个概念，并重新恢复了城市建设中人的尺度。针对大城市中拥挤、污染和居住恶化等城市问题，霍华德主张要对城市空间中的人口、居住密度和城市规模等进行限制，以更好地发挥城市的各种功能。所以，霍华德所强调的协调、平衡的理念，对当今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日益突出的“城市病”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深远的启迪意义。刘易斯·芒福德还深刻地分析了当今“城市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当今的城市发展中，城市发展的主导思想始终是由扩张力量所主导。这种思想认为，城市就是一个增长的机器，城市发展就体现生产力不断增长、经济量的不断的攀升和城市空间的无限扩大。

正如哈维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发展中所总结出的那样，“城市间的竞争、呈螺旋式上升的技术革新、过度积累以及地理扩张，这些都构成了一个不稳定的混合体。的确，这是一种导致国家政治地理竞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潜在压力，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城市资产遭受了巨大的和不平衡的地理性破坏。”^②由此可以看出，城市空间不平衡地理发展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发展的基本规律，它既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带来了机遇和财富，同时它又引起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动荡和不安。

从实质上讲，不平衡的地理发展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讲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问题是一致的。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是指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由于其自然条件、历史经验、外部环境等诸种因素的差异，导致不同民族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历史个性。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变化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03 页。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202.

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历史的统一性包含在历史的多样性之中；而历史的多样性体现着历史的统一性。可见，马克思所描述的历史客观规律是一种包含着差异的社会规律，是承认社会发展多样性存在的规律。而不平衡地理发展恰恰是社会多样性与特殊性的具体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体现。因此，不平衡地理发展也是我们认识社会考察历史时的一项重要研究方法，以此为指导更能洞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运行情形的辩证统一。

第三节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阶级垄断租金

哈维在运用马克思的租金理论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基础上，还创造性地提出了“阶级垄断租金”这个概念。哈维认为，要理解“阶级垄断租金”这个概念最为重要的要理解阶级特权。他以拥有土地或房产的资本家为例进行分析，如果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按照整个阶级的利益行事，那么阶级垄断地租就不可能实现。在哈维的理论视阈中，作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发展前提和基础的资本积累主要表现为在城市区域的一种独特的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出现了导致统治阶级联盟形成的各种阶级力量和利益诉求主体。这些统治阶级联盟主要代表了银行和金融资本的利益、财产资本和建筑集团的利益、地主和房东的利益、开发商和国家代理机构的利益。哈维把这些统治阶级联盟凭借在城市空间中的垄断地位向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收取的这种特别形式的租金，称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阶级垄断租金，他强调指出阶级垄断租金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和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阶级垄断租金与绝对空间

哈维曾经按照空间的不同特点，将空间区分为绝对空间、相对空间

和关系空间三种类型。他从绝对空间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统治阶级联盟所榨取的阶级垄断租金。他说：“空间是绝对的财产，意思是说结构、人和土地面积在三维的欧几里得空间中以相互排斥的方式存在……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空间难题都有内在的垄断性特质。”^①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垄断阶级地租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源单位的所有者有权获取一定程度的正当性回报收入，通过城市化创造的人工资源系统恰恰就是垄断阶级生产绝对稀缺性和存在绝对地租的领域。所有这些绝对空间形式创造了阶级垄断地租实现的可能性。哈维还从实质上分析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这种绝对空间特性是通过私有财产关系的制度化安排得以实现的，正是在此基础上，这些统治阶级联盟才获得了空间的垄断权。

哈维以具有固定房屋量的房地产市场为例，来说明空间的垄断性和绝对性。他将购买这个房地产市场房屋的行为，比喻为在空的剧场里连续的填补座位。第一个进入的有“N”种选择，第二个进入的有“N-1”种选择，以此类推，而最后进来的没有任何选择。所以，他认为在房地产市场是按照购买力的标准来衡量的，那些有钱的人具有更多的选择，而最穷的人在其他人选择完之后，才能选择所剩下的。

在哈维看来，绝对空间的限制性进入为土地使用的变化过程提供了有益的洞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两种理论，即“过滤理论”和“迁出理论”。前者是指，由于富有者拥有最多的资源，他们会轻易地变换住房，而把自己原有的住房转让给他人。于是，通过这样一个“过滤”的过程，最穷困者最终会获得较好的住房。但是，贫困群体居住的区域往往都是“社会病”比较突出的地方，这些“社会病”包括贫穷和犯罪率的高发。与“过滤理论”相反的是“搬迁理论”。由于在房地产市场底端充满了社会和物质的压力，以至于富裕的阶层不得不从这些地方搬出去，中产阶级被迫迁往郊区去居住，这个过程会使消费剩余消失。最为明显的例子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68.

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许多城市出现的骚乱迫使许多中产阶级逃离市中心而迁往郊区，而抛弃了市中心的大量地产。所以，在实践中，房地产市场的动力被看作是“过滤理论”和“搬迁理论”的结合。^①

为了从理论上更好地说明绝对空间与阶级垄断租金的关系，哈维还引入了“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哈维将“消费者剩余”界定为，“消费者为取得一种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与他取得该商品而支付的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②这个概念也说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消费者剩余为地点分析和财富经济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但未被揭示的联系。消费者剩余会随着群体的收入增加而增加。在房地产市场中，最富裕的群体要比较富裕的群体能够购得好的地段和房屋，而较富裕的群体又要比穷人在这方面更具有优势。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收入的分配是倾斜的和不公平的，而且好的地段本身又是有限的，这样对收入下降和较少的群体来说，消费者剩余的数量会不成比例地下降。再者，由于购买能力依赖于信用等级，因此，随着担保能力的下降，购买能力也会相应地下降。

所以，对一个按照购买能力来确定分配顺序的房地产市场来说，由于最穷的群体最后才有机会进入房产销售市场，他们就必须面对房屋生产者和提供商的半垄断状况。那些最后进入购买房屋的群体被迫产生一定的消费者剩余，而这些消费者剩余落进了房地产经纪人中介或地主和房东等手里。如果生产者的剩余价值被看作租金和利润，那么在房地产市场领域，就很容易获得额外的租金和利润。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在最贫穷的区域，即使房地产中介、经纪人和地主房东没有额外的利润，但是人们还是遭受他们的剥削，较为常用的是通过房屋销售加价和提高租金等手段。

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存在着—对较为特殊的群体，那就是需要租房的房屋消费群体，他们没有信用等级而不得不靠租房为生；与之相对的

① 参见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172-173。

②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69.

是靠提供房源来获取垄断租金的房东或地主这个群体，由于租房者无权选择房东，因此这个阶级具有垄断的特权。虽然个别的房东会相互竞争，但是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具有共同的行为特征，那就是资本的回报率低于一定的水平，他们就会把房产从市场上撤回来。富裕群体始终有机会修建新的房屋。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由于统治阶级拥有对绝对空间的垄断，他们可以用较低的产出获得较高的价格和较高的利润。富有者拥有较多的经济选择，能够逃脱垄断的影响，而贫穷者具有较少的经济选择而不得不遭受垄断的危害。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富有者能够支配空间，而贫穷者则深陷空间之中。

哈维还提醒我们，在城市空间的房地产市场中，贫困的群体更易遭受土地使用变化的压力。尤其是在地价比较高的房产通常处于一种比较糟糕的情形，因为这些房产靠近商业区和工业区，因而这些地方更易于进行土地的投机且更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房产的主人不愿意花更多的钱来维修或参与新的住房建设。所以，贫困群体所居住的这些条件较为糟糕的住房更容易遭受土地投机和城市更新的压力。现代美国城市的迹象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土地使用变化的动力仍然保持不变。由于房屋提供商通过半垄断的操作获得了消费剩余，因而最为穷困的群体的消费剩余就没有了。在实施城市更新的商业规划中，为了实现未来更大的投资回报，金融机构对扩大地理空间的商业发展感兴趣，这样新的商业发展不得不替代了旧的住房区域。

从哈维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阶级垄断租金与绝对空间具有内在的联系。资产阶级正是凭借对一定空间的垄断、绝对占有和支配，才确保了他们在城市空间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和支配地位。由此形成了在城市空间上的对立格局：拥有资本占有空间的一方能够垄断住房、城市基础设施、消费空间、休闲空间和娱乐空间等空间资源和商品，并依靠垄断价格而获取垄断利润，最大限度地榨取普通民众的劳动成果和剥夺普通民众的财产收入；而没有资本和空间资源的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些空间资源和商品的价格，从而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和财产收入直接或间接地交

给拥有资本和空间资源和商品的一方支配。

二、阶级垄断租金与相关阶级力量博弈

哈维坚持认为，阶级垄断租金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得以实现，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处于这个空间中的各个阶级力量的不平衡。由于不同阶级拥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不同，他们在城市空间中所处的地位也就不一样，由此决定了一些阶级或群体必须靠租房为生，而另一些处于优势地位的阶级和群体则有权榨取那些处于劣势地位的阶级和群体的阶级垄断租金。因此，必须对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这些差别阶级和群体进行具体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对阶级垄断租金有更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第一，房东和低收入租户的比较。

就低收入租户的收入、社会地位、信用价值及其公共资助来说，他们都找不到一个作为家的居住地或者在公共住房中找到一个居住之所。这种阶级的人群除了在低收入的租金市场上寻找住处之外别无选择；他们被深深陷入在房屋的次级市场中。这个阶级的需要就是被称作房东或地主的阶级提供的。一个理性房东的策略就是，减少维修费用，尽可能地发挥财产的价值，坚守在房产的投资行为。因为，随着房屋的日渐失修，房子质量进一步恶化，最终最差的住房就不能投入使用，这样就造就了房屋的稀缺性。这时，租金又会逐步上涨。

可见，房东或地主的利益和租户的利益是明显对立的。如果房屋质量恶化租金上升，租户会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房屋；但是由于他们大部分都已陷入了这个次级市场，因而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他们采用一定的政治权利，他们就有可能抵消房东或地主阶级的阶级垄断特权、减少了房东或地主阶级的利润，这样房东和地主就会把资金从固定资产领域撤向资本市场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房东或地主会妥协并且往往会降低资金的回报率。相反，如果租户的政治力量比较薄弱，那么可供租住

的合适住房就会越来越少，这样租金就会进一步上涨。如此一来，上涨的租金就会进一步吞噬低收入者的收入，他们就不得不居住在过度拥挤的空间内或者贫民窟中。

第二，地产开发商和郊区的中高收入群体的比较。

阶级垄断地租不仅能够房东或地主中能够实现，还可以在房地产市场的各个领域和层次得到实现。相对中等收入群体来说，高收入群体有更多的住房选择范围和余地。一旦这些高收入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意识获得充分发展，房屋提供商或开发商就会有实现阶级垄断地租，因为这些作为消费者的高收入群体间为了拥有社会地位和声誉而在住房方面相互竞争，最终他们会居住在所谓“合适”的社区里。

但是，只有开发商拥有了表达其集体利益的机制，他们才能获得垄断阶级地租。当然，这种作用要获得充分有效的发挥，政府必须提供一定的制度支持。首先，政府必须减少土地使用中竞争的不确定性，通常会采取一些政府规范的行为，比如计划或者区域控制、提供基础服务设施等措施；其次，政府必须鼓励富裕群体参与房地产和土地开发，通常会提供便利的和有力的税务安排。在美国，开发商通过控制郊区的司法权和审判权来操纵地段的决策从而实现垄断阶级地租。如果没有开发商这样一个利益集团执行这些功能，郊区的发展就会陷入一片混乱，金融资本会被迫从郊区化过程中撤资。而这种撤资对经济增长、普遍的有效需求和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系统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开发商的垄断地租到底有多少，这就要看开发商之间以及他们与市场上所面对的不同消费群体间利益冲突的结果。如果开发商能够说服高收入群体居住在某种特殊的区域，如果他们能够完全控制政治进程等等，那么优势就在开发投机商这一边。如果消费者不被开发商的诱骗言行所动并且牢牢控制了有关土地使用规则和基础设施提供的政治机制，那么开发商的垄断权力就会被抑制。

第三，协调房地产行为的等级制度框架。

哈维主张，如果房地产市场要协调运作避免经济危机，那么阶级垄

断地租实现中所需的等级制度结构则是必需的。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正是这些金融和政府制度化的实践构成了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中阶级垄断及其权力的基础。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必须拥有足够的制度设备来整合国家的和地方的经济，把个人的决策和社会的决策整合为一个整体。哈维认为，政府的国家和金融制度不是无目的地运行的，总体来说，它们力图确保社会再生产并用一种有序的完整的方式来处理社会再生产中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这就意味着一种直接面向有序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政策。

在房地产市场中，对国家的房产政策来说，它最主要关心的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确保建设、经济增长和新的家庭形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序运行；二是确保短期的稳定，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作为凯恩斯政策（宏观调控）的一部分从整体上消除经济的周期摆动；三是通过提供住房的方式来处理财富分配以确保国内的和平与稳定。^①

哈维以美国为例考察了国家政策是怎样转化成地方政策、个人是怎样把他们自己融入这些决策之中的机制。在美国，联邦政府、州、地方政府共同形成了三层等级的结构，每一个政府机构都属于其中的一级。联邦政府本身就是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的，但是，联邦政府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它能够制定有关房产的国家政策。联邦住宅管理局管理着大量的政府规划，并且独立于州或地方政府行使其职能。但是在美国，协调国家的和地方的、个人和社会活动的机制，是通过在政府控制下的具有等级结构金融体制来操作和运行的，比如社区中非盈利的储蓄和借贷机构，及其以抵押银行、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为代表的以赢利或商业扩张为宗旨的机构。当所有这些机构一起运作时，就把国家的政策和个人与地方的决策联系起来，于是阶级垄断地租得以实现的地方机构就产生了。

^① 参见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70.

哈维以巴尔的摩为考察对象来说明这些制度是如何影响巴尔的摩的。哈维将整个巴尔的摩的房地产市场区分为几个不同的次级市场。哈维认为，在巴尔的摩市区的房地产市场还是存在地理结构特点的不同，而这为阶级垄断地租的实现进一步提供了潜力。房地产市场中的地理结构特点是由金融政策和政府机构相互作用共同造成的。在内城区的二手房房地产市场中，现金和私人贷款交易占主导地位，几乎没有机构或政府参与的痕迹；在白种人居住区域，主要是拥有私人房产的房主占主导地位，在这一区域几乎不可能实现阶级垄断地租；在西巴尔的摩的黑人居住区，这部分群体获得住房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一种被称作“土地分期付款的合同”，结果，黑人不得不遭受剥削，这正好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通过种族歧视采用了一种综合金融和政府政策的手段来实现阶级垄断租金；在产权高度流动的区域里，这里的金融服务主要是由抵押银行和联邦住宅管理局保险所提供的，这就为投机开发商提供了实现阶级垄断地租的机会；在非常富有群体居住的区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自己的储蓄或商业银行，几乎不依靠联邦住宅管理局的任何资助和保证，阶级垄断地租在这些区域之所以获得实现主要是因为声望和地位的因素在起作用。

哈维还进一步考察了塑造城市地理结构相关的因素。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城市的地理结构一直被此消彼长的市场力量引起的冲突和斗争所改变与塑造。比如开发商的、房东或地主和投机商的作用，政府和金融机构政策的变化，消费者的消费口味等等都是构成这些力量中的一部分。但是，从短期来看城市的地理结构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这个地理结构是如此固定不变以至于阶级垄断地租能够在次级市场内得到实现，而且阶级垄断地租还会作为一个力求侵蚀各个次级市场边界从而让其融为一体的破坏性力量而存在。在城市的一些区域，这些斗争或许是经常处于一种潜在的、未爆发的状态——通过各种自然的或人为的作用各个区域的边界还比较稳定，而且在次级市场内各种敌对力量都能够得到合适的居住权。但是城市空间始终被各种冲突、矛盾和斗争所充斥，要发现没有这样冲突的城

市几乎是不可能的。^①

三、阶级垄断租金与城市化

哈维详尽考察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阶级垄断租金和城市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阶级垄断租金与城市化起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强化的作用。一方面，城市化为阶级垄断租金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和机遇；另一方面，阶级垄断租金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朝着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向前进。哈维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阶级垄断租金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第一，阶级垄断租金塑造了城市空间中差异的居住结构。哈维认为，长期以来，城市中的居住差异都是通过社会生态过程、消费喜好、基于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原则等等来解释的；而在其中起积极决定作用的是金融和政府机构的力量，也就是那些从财政收入中实现垄断地租的投资者。那些以利润最大化和商业扩张意识著称的金融机构往往会支持房东和地主的利益，牺牲贫民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其结果就是，这些机构就成为塑造城市中居住结构的根本性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种族特点、社会地位声誉、生活方式愿望、社区团结等等因素与理解居住差异无关。恰恰相反，正是这些特点增加了实现垄断阶级地租的潜在可能性，因为这些因素有助于维持这种特殊的地理结构，有助于创造一个具有狭窄社区意识的绝对空间。

第二，哈维强调指出，城市化的物质动力是有金融和政府机构提供的，是由追求垄断地租的开发投机商和投机的房东地主斡旋的，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在这一过程中会生产出不同的消费阶级 (consumption classes)、分配群体 (distributive group) 甚至住房阶级

^① 参见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79.

(housing classes)。①当然，个人可以在加入这一个分配群体或那一个分配群体，或者在从一个消费阶级转向另一个消费阶级之间进行选择。但是个人不能选择的是分配群体结构或住房次级市场的结构——这些是由控制消费领域的那些力量所决定的。所以，在生产新的消费方式和新的社会需求中，城市化过程也同时生产了新的分配群体和消费阶级，而在一般化的城市结构中具体表现为一定的分配群体和消费阶级生活在不同的社区之中。

第三，城市化本身就是国家和社会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它为实现阶级垄断租金创造了可供实现的土壤。如果个人的行为能够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结合协调起来，那么政府和金融机构将会被迫以某种方式进行运作。对这种租金的需求引起了多重效果，这就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通过把资金投入土地、房屋和财产市场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种投资的转变有助于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中出现的萧条状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投资从工业中撤出转而投入房地产领域以获取垄断阶级地租，这一方面导致了工业的萧条，另一方面促成了房地产业的兴旺。从短期来看，这种投资转换是可能的，因为它为了当前的需要榨取了过去生产的价值，也确保了经济的增长；然而这也意味着城市环境的恶化，因为过多的资本涌入城市空间会造成资本的过度积累，由此又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从长期来看这种转变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如果不生产新的价值，就不能消除过度积累的压力和实现价值的保值及增殖。

第四，城市化是为生产新的消费方式和新的社会需求服务的，而这些新的消费方式和新的社会需求又为城市空间中垄断阶级租金的实现进一步提供了便利条件。对城市化的动力来说，投机地主和投机开发商的作用最为关键，其作用主要体现为对有效需求的维持和保护。与此同时，实现垄断地租的潜力又为从土地和财产市场中资本的快速积累提供了可能性。

① 参见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8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几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一切都商品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供给必须通过商品的形式得到满足；以前那种靠自给自足的住房供给方式再也不存在了，在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都必须通过商品的形式得到满足。因此，新的消费方式、新的社会需求进一步为垄断阶级租金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便利的条件。

哈维主张，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阶级垄断租金现象实质上体现了资产阶级对城市贫民的联合统治；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集中表现为如何处理主权国家和私人资本的关系。哈维认为，作为从社会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管理手段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进行调适。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吸收资本、为资本进一步积累提供各种制度保障和条件支持、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等一系列任务，为此，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主权区划实体保持支撑资本主义运转的制度和行政安排（如财产权和市场法则）的一致性，甚至如果有必要，它会采取强制手段做到这一点”。^①但这势必会与奉行自由主义无限追逐资本利润和剩余价值的私人企业产生矛盾。由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种分歧和矛盾不是根本对抗的。因此私人资本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合作面超过其对抗面，其鲜明的体现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的出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融合，其实质就是垄断资本通过联合、利用和控制国家政权而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私人资本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统治的一种新的形式，这进一步为阶级垄断租金的实现提供了切实的条件和可靠的保证。

刘易斯·芒福德从城市发展的起源、演变和前景的角度揭示了城市空间中剥削阶级联合统治被剥削阶级的事实。芒福德指出：“城市从其形成开始便表现出一种两重性特点，这一特点它此后就从未完全消失过：它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把最大限度的保护作用和最大程度的侵略动机融合于一身，它提供了最广泛的自由和多样性，而同时又强制推行一种彻底的强迫和统治制度。”^①而在城市空间中，统治阶级统治主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来维护统治阶级特有的利益。芒福德认为，相较于城市空间中最初的野蛮暴力的手段这无疑要进步得多和文明得多；但是城市发展违背了生物体的以“动态平衡和极限”为表征的有机规律，在生物有机体中，“所有的有机现象都有其生长和发展的极限，这极限是因它们缺乏维持自给自足和自我管理的必要手段而产生的：它们牺牲邻居的利益发展自己，结果只会把邻居们为它们自身生活所提供的那些方便条件丧失掉”。^②而“城市社区沉迷于扩展新兴的权力，丧失了这种极限观念；权力崇拜陶醉于自身无限的表现，它不仅提供了为权力争斗而进行权力争斗的嗜好，而且通过大规模强占和集团性奴役的手段获得了各种劳动产品，而无须自身终日参加苦重的劳动”。^③因此，芒福德认为城市空间中的这种关系是一种掠夺关系而不是一种共生关系，是一种征服关系而不是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只会带来对城市文明的破坏。所以，芒福德得出结论说：“城市，作为在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性发明，从其产生之初便成了内部各种分裂势力的容器，被用于无休止的破坏和灭绝活动。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原因，文明的生存，或者更直接地说，人类的任何一处较大的、未受残害的人群的继续生存，现在都成了问题——都将长期是个问题，不论能作出什么样的临时性调解。”^④

在对城市空间剥削统治的分析上，哈维和芒福德分析的视角有所不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②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③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④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同：哈维是从阶级垄断租金的角度，芒福德是从生物有机体的角度。但是他们都揭露了一个事实：城市空间实质上是任由统治阶级和强势群体支配和宰割的空间；在私有制的城市空间中，平等、合作与和谐是不切实际的神话；必须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城市空间关系，用新的更合理的城市空间关系来替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不合理的现实。

第四节 探寻未来的城市世界

在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进行经济分析和政治解读后，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歹托邦”图景进行了描述和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未来发展前景提出了思考和展望。

一、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歹托邦”图景

哈维所理解的“歹托邦”，实际上是指的与乌托邦的美好追求相对立的一种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阴暗图景和糟糕画面。关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歹托邦”图景，哈维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资本主义的“歹托邦”图景总体上表现为城市空间中的经济危机。哈维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固有而又难以根除和解决的问题。经济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并存，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实践奉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这是一种“在实际中常常公开表现出对金融资产和资本主义精英的支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金融机构，国家政权有责任为持续牟取暴利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①的政策；而另一方面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生产者 and 城市大众的有效需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页。

求严重不足，也就是说所谓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真正的过剩，仅仅是相对于普通大众较低的消费能力和购买能力来说的一种过剩，因而只是一种相对过剩。所以吸收资本并为资本增殖找到合适的地点和空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而建构一个新的制度框架来保证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就成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刻不容缓的任务。但是，哈维认为上述举措只能从局部和表面上解决问题，面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经济危机如果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经济危机是断然找不到出路的。

其次，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人口急剧增长。哈维认为，20世纪初，全世界只有16个城市人口超过百万，其中最大的伦敦也仅仅只有不到700万人口。而到2000年，则会有500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并且像东京、孟买和上海的人口会超过2000万。照此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将生活在城市而不是乡村中。因此，20世纪已经成为城市化的世纪，城市生活的质量将决定文明自身的质量。城市空间中的人口剧增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要为日益增加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这对大多数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过多的人口会带来资源的紧张和环境恶化的问题甚至会带来环境灾难，本想为人类带来美好生活和善良期望的城市空间却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生存。所以，城市空间的人口急剧增长会成为影响城市健康和和谐发展的重要变量。

最后，伴随着城市空间人口急剧增长的是一系列城市矛盾和问题，哈维将之称为“不适宜的文明”。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这主要表现为“每一个城市都受困于（常常是不断增长的和在某些时候占主要地位的）集中的贫困、人类的无望、营养不良和慢性病、几近崩溃或者极大压力的基础设施、无意义或浪费的消费主义、生态恶化和过度膨胀的人口、拥挤、表面上受侵袭的经济和人类发展、不时发生的痛苦的社会斗争，从街头的个人暴力到有组织的犯罪（它们往往是城市治理的替代形式），在社会控制中运用警察国家对抗偶发的（有时是自发的）要求政

治经济变革的大规模市民抗议运动”。^①而城市的命运任由房地产开发商、投机商和金融资本操纵、支配和摆布。所以，在哈维的眼中，21世纪的城市就像一种“歹托邦”噩梦，“在其中，所有被视为人类致命缺陷中最糟糕的东西都在绝望的深渊中集中起来了”。^②哈维在此所称的“不适宜的文明”主要是指在当今大多数城市中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中存在的“城市病”，这是城市发展至今人类的最大挑战。如何克服和解决“城市病”，让城市成为人类美好生活的载体，这是每一个城市规划者、每一个城市建设者和每一居民都应该认真思考并应该切实采取措施的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歹托邦”图景，在140多年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有过生动形象的描述和深刻的论述。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歹托邦”图景集中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不近人情的冷淡”，那就是“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而且“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③另一方面就是充斥在城市空间中的“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在资本制城市空间中，最为有力的武器就是资本，谁拥有了资本，也就是占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谁就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因此，“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作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

① 大卫·哈维：《可能的城市世界》，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页。

② 大卫·哈维：《可能的城市世界》，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页。

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①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歹托邦”图景最为鲜明的体现在于工人住房条件的恶劣。恩格斯这样描述道：“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么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街心，拉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② 所以，“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③

恩格斯通过对工人阶级在城市空间中的悲惨地位的描述，得出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必然会推动它为自身解放而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④的结论。列宁对恩格斯的此部著作也尤为赞赏，他说：“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⑤ 这部著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6—3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7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92页。

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和“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① 所以，虽然今天距恩格斯所描述的时代已经相去一百多年了，但是正如哈维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自从恩格斯时代以来技术、社会、政治和制度语境极大地改变了，但是总的实际状况在许多方面却恶化了。路障和围墙、隔离和分离，这些在今天标志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生活状况的东西几乎不能否认恩格斯所描述的事实。”^② 而且从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歹托邦”途经的描绘和论述中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恩格斯对19世纪城市中工人阶级状况的论述对哈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哈维秉承恩格斯的思想，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资本对城市“歹托邦”图景的恶化作用，也关注到了普通民众住房条件的拮据和糟糕，同时也留意到了民众居住条件的恶化。由此也可以看出，哈维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来分析把握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这也显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论资源的认可和重视。

二、对未来城市空间的探寻和展望

哈维主张，城市规划专家在规划城市时应当“既满足未来的需求，又不破坏先前产生的一切。先前产生的东西很重要，因为它是集体记忆、政治身份、强大的象征意义的场所，同时它创造了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在人工环境之中为创造性社会变迁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和障碍”。^③ 为了使城市空间朝着健康良性的轨道运行和发展，哈维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思考和建议。

在哈维看来，城市是城市化这个过程的产物，要理解城市化必须理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② 大卫·哈维：《可能的城市世界》，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页。

③ 大卫·哈维：《可能的城市世界》，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页。

解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但是人们往往把城市化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诸如房屋、道路、城市基础设施的物质属性与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构成的社会属性割裂开来，以至于对城市空间不能形成正确的理解，从而遮蔽了这些物质空间背后隐藏着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要反对“通过物质环境的改造来说明社会关系”这种僵化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会影响和妨碍不同的城市化过程的发展可能性。

而与“在社会行动领域中定位城市”的观点截然对立的是，19世纪晚期大多数建筑学家和城市社会学家都认为，城市是一种物，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并能够得到控制、维持和改变的空间。因此，这些人都把复杂的城市社会过程问题当成简单的物理空间形式，把空间形式凌驾于社会过程之上。哈维把历史上的乌托邦形态划分为空间形式乌托邦和社会过程乌托邦两种类型，认为乌托邦和城市空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乌托邦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空间乌托邦占优势地位的。这种乌托邦的典型特点是用空间压制时间，使人们轻易地顺从和服从于统治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人们把乌托邦归结为极权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①而与空间形式乌托邦相对照的是社会过程乌托邦，它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而在当今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现实中，社会过程乌托邦最为典型的表现形态是自由市场乌托邦的观点，这种观点坚信“自由市场必胜”的信念，认为它“能够通过成熟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动员个人的欲望、驱动力和创造力，从而有效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②

哈维极力反对这两种各执一端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倡导一种时空结合的辩证乌托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场城市空间革命。而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进行革命的难题在于“勇于斗争，争取推进一个社会上更加正义和政治上更加自由的时空生产过程的格局，而非勉强接受由金融资本、世

① 唐旭昌：《论大卫·哈维的辩证乌托邦思想》，《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4期。

② 唐旭昌：《论大卫·哈维的辩证乌托邦思想》，《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4期。

界银行所强加的格局以及内化在不受控制的资本积累体系中的通常受阶级限制的不平等性”。^①但是后者的权力无论有多么强大，它都不可能完全地控制城市化；恰恰相反，它会强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并由此为城市空间革命提供一个机会。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革命中，哈维追求一种以“社区实践”为核心的反叛集体政治学。在哈维看来，“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弹性积累时代，这决定了实现社会革命和变革的中心不再是以前的工厂，而是新型的一个个社区。而社区则是政治行动基础和组织的重要力量，因此必须把社区的重塑和激进的反叛政治学相联系”。^②所以，要把城市空间中社区的力量利用动员起来，将其融合进反资本主义这股洪流中，这是替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必然路径。

哈维坚持主张，对未来城市空间的探寻和替代应该在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和对资本主义社会替代方案的视阈中来审视。

首先，要坚持替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原则和策略。反抗资本主义城市化的革命运动发生在多个领域，如“在萦绕精神概念的劳动过程中、自然关系中、社会关系中、革命性技术和组织形式的构思中、日常生活中，或在改革体制和行政机构的尝试中”。^③而这场变革运动必须驾驭各种可能性，为此必须遵循以下四项原则：一是坚持发展不同于增长的原则；二是遵循每一领域的变革都必须对制度安排和科学技术进行深刻了解的原则；三是对一些共同目的进行宽松约定以制定普遍性指导准则的原则；四是主张各个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原则。哈维主张在坚持和信奉上述原则的同时必须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这种社会思潮，因为这种思潮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革命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和十分严重的消极作用。在哈维看来，虽然绝对平均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起到过唤醒社会变革和

① 大卫·哈维：《可能的城市世界》，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8页。

② 唐旭昌：《论大卫·哈维的辩证乌托邦思想》，《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4期。

③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

革命运动的作用，在大多数人心中对绝对平均主义拥有美好的期盼。但是，“尽管绝对平均主义原则本身看上去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在和其他活动领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①在大多数变革和革命运动中，尽管打着绝对平均主义的旗帜，但是很难掩饰各个阶级和各个群体之间不平等的事实。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人财产权和全心全意捍卫和保护这一制度安排的政府是资本主义得以生存的重要支柱”，这就必然会导致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中绝对平均主义原则被践踏和其追求的价值丧失。^②所以哈维极力主张，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现实中，“我们必须想办法切断绝对平均主义和私人财产权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提倡公共财产权和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与此同时“要按照工会、自治组织、合作社或任何其他形式的集体组织所倡导的思路，重新思考绝对平均主义和生产的组织形式、劳动过程的运转之间的关系”。^③

其次，要关注和重视弱势群体的反抗运动。哈维认为以“聚焦于工厂和工人阶级，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革命理论已经不合时宜了，需要进行修正。之所以要对马克思主义传统革命理论进行修正，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代替代资本主义革命的场所和主体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革命的场所变更而言，哈维认为，在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很多革命运动都发生在城市里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工厂里，“城市和工厂一样，都是阶级运动的发源地，要想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性转变构筑一个广泛的联盟，我们必须从整个城市而不仅是工厂的范围和水平来看待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种形式的农村和农民运动”。^④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3 页。

② 参见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5 页。

③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5 页。

④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3 页。

据此哈维指出：“传统左派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忽视了工厂及矿井之外出现的社会运动浪潮。和工厂一样，在街道、酒吧、俱乐部、教堂、社交中心就工人阶级聚集的社区里，人们的阶级意识都觉醒了。”^①就革命的主体变化来讲，哈维主张，农民、临时工、家政人员和城市中的劳动力大军与工人一样都是革命的主体力量。他指出：“如果有心存不满者、社会异类、被剥削者，以及一无所有者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反资本家大联盟”，那么“这意味着对日常生活、城市化、主流的社会关系、生产体系及制度框架进行彻底重构，这还要求我们对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别给予足够的关注，必须创造出新的环境和新的地域来替代旧的”。^②哈维更习惯用“被剥夺的一无所有的人”和“弱势群体”来指称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他把这些主体划分为“在资本或资本家政府的掌控下劳动，却被剥夺了创造性劳动成果的人”和“为了给资本积累让出空间，而剥夺了所有财产、生活资料，甚至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的人”这两种类型。按照哈维的理解，第一种类型事实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描述的无产阶级形象，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传统上所理解的革命主体；第二种类型的虽然构成及阶级成分要复杂，但有“被剥夺”的共同特征，尽管“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被剥夺’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它包括所有不管是通过合法（及通过国家征用土地的形式）还是非法手段，通过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途径，被从自己土地上驱赶出去、被剥脱了自然资源所有权、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参与到市场交换（与物物交换或者日常交换形成对照）活动中的农民或者土生土长的当地人”。^③哈维认为，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由公有到私有的转变、资本积累过程中侵蚀他人资产的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

③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234页。

信贷系统是剥夺现象中最为突出的两种表现形式。

再次，要坚持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哈维坚称：“革命的关键不是要保护旧有的社会秩序，而是直接对阶级关系和国家资本主义发起攻击。”^①因此，必须对我们所在的这个包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关系的世界进行彻底的改变，那种“认为这一切可以以和平、自愿的方式完成，我们进行自我剥夺，主动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会阻碍一个更加平等、稳定的社会秩序形成的东西”的想法虽然是美好的，但也是极不切合实际的。^②哈维认为暴力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依赖于以下五种革命的力量。第一种力量来自非政府组织，他们关注诸如环境、贫困、妇女权力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积极的主张、对人类发展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他们并不和资本主义进行正面对抗因而也不可能取得大的突破和进步；第二种革命力量来自于无政府主义组织、自治主义者和草根组织，他们反对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结构、反对传统的政党组织形式，他们为反资本主义尝试提供了广泛的根基，但除了行为更加暴力以外其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第三种革命力量来自于转型后的劳工组织和左派政党，他们不排斥国家权力和等级制，相反他们通过国家对剩余的分配来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但是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不能控制剩余的生产，因而不能真正对资产阶级构成挑战；第四种革命力量来自于那些出于抵抗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运动，他们不受特定的政治哲学或主张指引，他们更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础力量；第五种革命力量来源于围绕身份问题进行解放运动的力量，这主要包括妇女、儿童、同性恋者、少数民族群体、宗教少数分子追求各自权利的斗争。^③由于不同革命力量自身特点不同，因此哈维主张只有把这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8 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8 页。

③ 参见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1—245 页。

五股革命力量融合在一起才能完成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替代和变革。

最后，要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精神。哈维主张要实现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根本变革必须要进行认知观念的转变，而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要想建立一个可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道德的、不存在剥削的、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绝不可能的，这些要求都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相矛盾”，^①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改革现有的制度及行政管理框架并接纳其他政治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和社会理想则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可能性。哈维坚信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质，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更是改变世界。这无疑会引发与统治阶级利益和为之服务的思维模式之间的冲突，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成为被压制和排挤的对象。但是“只有当这些批判思想落实到制度安排、组织形式、生产系统、社会关系、技术、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时，世界才会真正改变”。^②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抱有极大的兴趣，给予积极的肯定。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在于“旨在以降低暴行和重新分配共同利益的方式进行民主的管理，同时对资本主义因素进行规范和控制”，共产主义的特点在于“社会控制生产、分配和交换意味着国家控制机系统的国家计划”。哈维认为在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开资本的秘密从而明确“我们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如何去做”，“或许我们可以简单地把我们的运动定义为反资本主义运动，或者称我们为‘愤怒党’，目标是打败‘华尔街党’和他们在各地的走狗和附庸”。^③

不难看出，哈维在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批判和对未来城市空间的探寻中把马克思视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认为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社会

①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③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

理想在替代、改造和变革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反资本主义的场所和革命主体的理解上，哈维与马克思有着较大的区别。哈维主张革命的场域不仅仅发生在工厂中，城市已然成为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主战场；革命的主体不再仅仅是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是包含非政府组织、无政府组织、左派政党、边缘人士、弱势群体等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应当说哈维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他看到了在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传统意义上的靠出卖体力劳动生活状况窘迫的工人阶级日趋缩小和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消退的趋势；他也看到了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力量的形成和聚集对革命的深刻影响。难能可贵的是，哈维并没有因为上述情形而否认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他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反抗资本主义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性在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本人也把“改变世界”视作比“认识世界”更为重要和迫切的任务。作为认识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其生命活力根源于鲜活的社会实践生活中，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与时俱进的。而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革命的相关认识和论述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真精神”，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社会主义低潮时期，作为一个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的批判精神和变革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现实的革命情怀尤其显得难得。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哈维把革命的主体寄托在一些弱势群体和边缘人士身上而忽略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和重要作用，这势必会把革命引向歧途，也难以实现他的替代资本主义和实现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变革的社会抱负。

第五节 思考与启示

在过去农业社会中，农村对人类世界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刻，农业成为社会的重要产业支柱，农民则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体；而在如今的工

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中，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讲城市对人类世界的影响都要深远得多，这主要体现在城市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地位和作用日益超过农业，世界上生活在城镇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并在进一步上升。但是，在人类城市化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如贫困问题、生态问题、市民权益受损问题等一系列问题。

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说，人类城市社会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分岔路口，城市发展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人类必须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芒福德认为，城市具备“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从历史发展角度城市首先具备“磁体功能”，人类最初之所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被城市这种新的社会组织所吸引，期望能够在城市这个独特的空间里过上更为美好的生活。但是从现实看，城市的“容器功能”远远超过其“磁体功能”，城市越来越成为人口的中心、资本的中心、基础设施的中心、住房的中心、娱乐中心和消费中心；而以前那种人们渴望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丧失殆尽，人们期望的那种积极的共生关系被以“战争、奴役、剥削和寄生性”为特征的消极共生关系所取代。因此，用权力逻辑来审视城市空间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正视和化解城市矛盾；要制定健康合理的城市规划；要树立人化是城市化的核心理念。

一、正视和化解城市矛盾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回顾 1949 年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 到 2009 年的 46.59%，几乎每一年都以 1% 的速度递增，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在不久就会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伴随着高速城市化进程的是城市空间的内部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也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尚待完善的城市开发和发展模式。

当前，中国房地产开发和住房领域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和商业力量，在城市开发中地方政府是主要的角色，开发商是重要的参与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城市开发是在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以利益为主导的方向下进行的。城市规划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造成部分城市规划迎合了强势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而忽略甚至漠视了弱势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这种模式下的城市开发和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级差地租的原则来安排城市空间秩序。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以资本为核心、以利润率最大化为导向、以地方政府片面的GDP追求为价值特征、以制度公正相对缺失为条件的空间生产和空间再造，是建立在不断剥夺农村居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对空间居住和享有权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对空间正义原则的侵害”^①的特征。

第二，高房价成为不堪承受之重。

“蜗居”、“蚁族”、“房奴”、“裸婚”、“胶囊公寓”、“逃离北上广”、“群租房”、“井底人”等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生社会现象和热门词汇的流行，生动形象地折射了城市居民所承受巨大房价压力的社会现实。短短几年的时间，许多城市的房价成倍上涨，大大超出了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许多家庭的绝大部分开支都用来买房，有的家庭甚至是靠几代人的积蓄才来购买一个安身之所，许多人一辈子的命运都和房子联系在了一起。“房子”绑架了城市空间中大多数人的幸福。而现阶段，房子又日益违背了其“居住”这个使用价值的本质属性，一些人把购房当作投机赚钱的一种手段，形象地说，房子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用来“炒”的。因此，掌握着大量社会财富的地产开发商和炒房者又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居住权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力，而如今却成了多数人的重负。还应该清醒地看到，高房价除了加重居民的经济压力之外，高房价还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失衡、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和侵蚀社会主义的价值基础等方面的负面社会

^① 任平：《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基本走向》，《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5期。

影响。

第三，居住空间分异或隔离现象严重。

居住空间是城市居民生活起居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空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社会的和谐。所谓居住空间分异是指“不同职业背景、文化取向、收入状况的居民在住房选择上趋于同类相聚，居住空间分布趋于相对集中、相对独立、相对分化的现象”。^①住房作为一种固定资产，是人们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体现。而住房的面积、质量、地址选择，则是与居民的收入状况和社会地位息息相关的。城市空间中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助推了居住空间分异的进一步拉大。那些收入好、地位高的个人和阶层能够居住面积大、质量好、区位优势明显、配套服务完善的住房里；而那些收入差、社会地位低的个人和群体则只能居住在面积小、质量差、没有区位优势和配套服务不完备的房子里。造成居住空间分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使得城市空间中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成为现实，而这种现实必然要体现在居住空间的占有和分配上面。另一方面是住房商品化对居住空间分异的推动。中国的住房供给体制从国家、集体和单位的统一包办转向了以市场供给为主的供给体制，这加剧了城市中居住空间分异。

第四，个人极端事件和群体事件频发。

近年来，城市中的极端事件、群体事件呈高发态势。虽然说这些极端事件和群体事件大多数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具有根本对抗的性质，但是如果处理管控不好会带来恶劣的示范效应，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表面上看，群体事件和极端事件是由个人原因引起的，但进行深层次追究就会发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导致群体事件和极端事件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诉求表达机制不完善。

^① 侯敏、张延丽：《北京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城市》2005年第3期。

第五，农民难以融入城市。

中国城市化必将伴随着农村和农民的城市化，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怎样融入城市、享受与城市人一样的国民待遇、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积极成果、过与城市人一样有尊严的生活，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进城的农民主要分为两类群体，一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二是城市化过程中失地的农民。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群体，他们都面临着融入城市的巨大难题。

就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许多农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却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比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障、教育等均等的公共服务。这主要源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户籍制度对城乡边界进行了明晰的划分，一般来说，城镇户口代表着“就业、教育、住房、养老和医疗”这五项权利，而农村户口则代表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等三项权利。如何把进城务工农民的三项权利转化为城市空间中的五项权利，这确实是一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就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来说，虽然他们被一般地转化为城镇户口，但是仍然很难真正融入生活。这批特殊群体在城市空间中面临着一系列实际问题，有学者将它概括为“六失”现象：一是“失地”，这些特殊群体失去了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生产用地和居住用地；二是“失业”，这些特殊农民群体在城市中没有一个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三是“失居”，面对高昂的房价，他们居无定所；四是“失保”，这些农民没有社会保障，成为被遗忘的一族；五是“失学”，是指失地农民子女失学率高；最后是“失身份”，这些特殊农民群体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他们在夹缝中生存，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①

① 参见任平：《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基本走向》，《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5期。

第六，汽车对城市空间的挤压和占用。

如今，汽车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出行和生活的一个重要工具，汽车也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空间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城市的道路交通以“汽车为本”，这样汽车占掉了城市道路资源的绝大部分，换来的却是少数人的出行方便。而没有私家车的普通人出行赖以依赖的步行和骑自行车这些环保的出行方式变得越来越困难。汽车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和有目共睹的：一是导致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二是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三是将公共空间变成了完全服务于汽车交通的功能性空间；四是这种汽车导向型的城市空间会造成对行人、骑自行车等交通弱势群体的排斥和限制。

（二）建议与思考

要有效应对和解决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和城市空间中的矛盾，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要充分协调和化解城市空间中的各种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城市空间的和谐，随着我国城市进程不断地推进，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因此，城市的和谐与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在城市空间中，不同利益主体都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利益主体间、阶级群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为此，政府要积极协调和化解城市空间中的各种矛盾，逐步扭转片面追求效率的城市发展模式，加大对各大开发商和金融资本的监控力度，遏制城市空间中的利益同盟对利润的无节制追逐；要协调城市中的劳资矛盾，关注和重视劳动者利益的维护和权益的保护；要完善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采取各种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利益的表达机制和拓宽利益表达的渠道，让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诉求能够得到顺畅合理的表达并切实解决实际问题；转变城市交通出行中以“汽车为本”的发展模式，更多地关照弱势阶层和群体的出行需求和实际关切，努力营造城市的和谐交通。我国政府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比如提高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连续不断

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在一些城市试点征收房产税等。当然，构建和谐宜居城市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总结、提高和完善。

其次，实现空间正义，充分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居住权利。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和谐宜居城市的内在规定。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问题和矛盾的日益累积和叠加，空间正义的呼声就越来越高。所谓空间正义，就是指“存在于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公民空间权益方面的社会公平和公正，它包括对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生产、占有、利用、交换、消费的正义”，也就是“社会应保障公民作为居民不分贫富、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等对必要的生产和生活空间资源、空间产品和空间消费及其选择的基本权利”。^①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正义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资本论》、《乌河培谷的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及其《论住宅问题》等经典文献中，都对空间正义的基本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及其生产进行了系统批判。

空间正义的提出也契合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生产和生活空间是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和载体，每一个城市居民都拥有公平占有、分享城市空间资源和产品的权利。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不能建立在对农民和广大弱势群体的空间利益的剥夺基础之上，他们也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其空间权力理应得到切实的尊重和维护。所以在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开发建设中，要加大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诸如住房、道路、公共绿地、公园和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让城市更具有包容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空间产品基本的、合理的、正当性的需求，使城市空间成为所有人和谐共生的领域。

以空间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城市开发和城市建设必然面临着居住公

^① 任平：《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基本走向》，《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5期。

平和空间正义原则的巨大挑战。没有居住公平和空间正义原则的城市空间，必将是一个不和谐的、不宜居的城市空间，因此，实现居住公平、促进空间正义是实现和谐宜居城市的必然要求。居住权是一项基本的权力，是基本人权之一。也就是说，居住权要保障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最低层次生活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居住权利，尤其是那些中低收入者的居住权利。要实现居住权，必须改变以前那种片面追求平均住房面积增加的模式，更加注重房屋建设和分配中的社会公平和民生问题的解决。

要保障城市居民人人都享有基本的居住权，必须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改变我国住房的供求结构。当今城市空间中的住房供求结构是以市场化的商品化的供给为主的模式，缺乏一个多元的平衡的住房供给结构。由于城市空间中不同个人、群体和阶层的收入状况千差万别，所以单一的靠商品供给的模式来保障所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权是不切合实际的。第二，要制定出符合家庭收入的具有差异性的住房政策。住房政策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对高收入者可以通过商品和市场化的供给手段，来满足这部分群体的个性需求；对中等收入者，要提供经济适用房来满足他们的住房需求；对那些没有能力购房的低收入者，政府应该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提供廉租房来保障这部分特殊群体居住权。因此，政府要担当起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的义务，要通过在公共财政中建立专门的住房保障基金、成立专门的住房管理机构、将土地拍卖的大部分收入用作住房基金、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等切实措施来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家庭的居住权。

二、制定健康合理的城市规划

（一）城市规划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

城市中各种问题纵然有体制机制的原因、各种人为原因和历史现实的原因和，但没有制定一个健康合理的城市规划并将其贯彻到底是导致城市问题和矛盾的重要因素。

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制定出一个健康合理的城市规划；二是即使有了城市规划但也不能将其贯彻到底。导致城市规划如此现状的原因在于受经济利益和利润驱动的短视行为，一味地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忽略了城市的本质和人的基本需求，这样的城市规划带来的突出现象就是“千城一面、百城一貌”。

导致城市“千城一面、百城一貌”既有其客观历史因素，更有其现实原因。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工业化的价值取向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理念，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式。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技术雷同、大规模的复制和无个性，在城市发展上体现为无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在资本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在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推动下，各个城市不顾自身自然条件、环境空间、历史积淀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从而丧失了城市自身的个性与特色，城市发展表现为重量的扩张轻质的提高、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建设轻管理、重硬件环境建设轻软件环境建设等通病。有人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乱象概括为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八个方面，应该说这对缺乏城市规划和对城市规划执行不力的乱象做了较好的概括。

（二）树立科学的城市规划理念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是惊人的，规模是空前的，如今，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和生活在城市。这势必对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生态环境带来非常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这既是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更显得必要和迫切。现实中的城市规划之所以进入一个个误区、陷入一个个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对城市规划的本质认识不清、理念不科学。对于城市规划应该树立以下几种观念。

第一，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蓝图，也是资源配置的依据。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建设进行的综合性、战略性、全局性安排和布置，因此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处于龙头地位。城市建设不能随意而为，而是应该按照制定好的城市规划严格执行。对于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发展规模、土地利用、房地产开发、功能区布置、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修建、空间布局、生态环境修复维护等内容都应严格按照城市规划执行，不能因为行政权力的干涉、开发商的利润动机和利益集团的干预而受影响和改变。

第二，城市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城市规划涉及方方面面，牵涉到许多要素，而且各个方面和要素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的。城市规划不单单是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的问题，它与国家的发展规划、地区的发展计划也紧密相关，应把城市规划置于国家发展、地区发展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中进行考量。城市规划不仅仅是对资源、要素和空间的配置和安排，更是对城市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不同群体间利益协调的过程。因此，城市规划既要关注物的层面又要关注人的层面，不能“见物不见人”。城市规划中的“以人为本”原则中的“人”不是笼统的人，而要对人群进行细分，既要关注和关照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要关注弱势群体、残疾人士、老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利益。只有对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有一个通盘的考虑，才能更好地做好城市规划这个系统工程。

第三，城市规划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城市化能够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主要得力于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型动力”驱动。其主要体现是：一是城市化与城市战略的规划是政府管控的；二是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的投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三是城市化的人口发展模式是政府规划的；四是城市的土地是政府掌握的。^①应该说，这种城市发展动力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不适应，中国城市建设应在政府的有形之手的和无形的无形之手共同推动下获得发展。虽然就城市规划来说主要还是

^① 参见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4页。

政府的行为，但是城市规划属于一种宏观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行为，不可能对一些微观行为和具体细节进行约束和安排。微观行为具体细节方面的问题应该留给市场去解决，政府不要管得过宽过细，政府应是“有限”政府。政府的重点就是要关注宏观问题和公平问题，市场的重点则是要关注微观问题和效率问题。只有把政府的无形之手和市场的有形之手完美结合，才能有效解决城市规划问题。

第四，城市规划要有科学性、民主性和权威性。首先，城市规划要具备科学性。城市规划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既要把握城市发展的数量，更要把握城市发展的质量。在制定城市规划时，应把土地利用率、能源利用率、生态安全、环境质量、文物保护等纳入考量的范围，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其次，城市规划要具备民主性。科学和民主是城市规划的两只手，缺一不可。城市是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共同生活的空间，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人，城市规划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城市规划应具有最大限度的参与性和民主性。城市规划不仅仅是政府、规划师和城市建设专家的参与，还应通过人大和社会听证的形式让最大限度的普通群众参与到城市规划的进程中来。最后，城市规划要具有权威性。城市规划不能停留在“纸上画画”，而应具备权威性、严肃性，城市建设必须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进行，不能因为行政领导、开发商和利益集团的影响而随意更改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是权威性的前提，而城市规划的权威性则是科学性和民主性的保障。

三、人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和关键

(一) 人的尺度成为衡量当今城市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什么样的城市才算一个好的城市？城市建设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自有城市以来人们一直在追问这些问题。毋庸置疑，城市是人类的城市，城市建设理当为整个人类服务，衡量城市好坏和城市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准理

应是人的尺度。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往往是物的尺度超越了人的尺度、机械的物质外壳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人的内核的发展。

这样一种重物轻人的城市发展理念和模式是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相适应的。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的两百多年时间里,机器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也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工业社会在创造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以追求对物质产品占有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还产生了机械化的组织方式和机械化的思维方式。在这种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的主导下,人们把货币、物质、商品、财富当作具体的、现实的和倾其全力追求的东西,而忽视了个性、精神愉悦、人际和谐、人际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等。因此,在看到工业文明给人类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技术进步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它给人类带来的矛盾、问题、困惑甚至灾难。

在以“物的尺度”为标准和原则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过程中,暴露出了一系列违背人的需求、人的本质属性的弊端和问题。首先,城市建设强调城镇建筑和附属设施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人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由此产生的掠夺性、寄生性成为侵蚀人的需求和权力的主要罪魁祸首;其次,城市建设中出现了人口膨胀、就业率底下、人口贫困、社会犯罪、富人社区与穷人社区的隔离、住宅区与就业空间的分离、市中心区的衰落、城市无限制地向郊区蔓延、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能源短缺等“城市病”;再次,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呈疏离、冷漠的态势,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理解和合作,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连接的几乎唯一的纽带;最后,城市中还面临着贫富差距日渐扩大、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称、享受资源和产品存在巨大差别等不平等问题。

(二) 城市本质探讨

城市的本质是什么?这是自有了城市以来就一直困扰人类的问题。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可见,人类最初之所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是为了

更好的憧憬和梦想。那么，什么样的城市才能够为人类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呢？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思想家刘易斯·芒福德对城市本质的探讨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芒福德首要的观点是：城市本质上是人类的化身。他认为，城市从无到有、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与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一致的。芒福德追溯了城市发展的起点，认为城市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城市之所以出现并能不断获得发展和进步，是由人类不断增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所决定的。

芒福德的第二个观点是：城市是改造人类和提高人类的场所。对此他做了十分形象的描述：“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这里以充分地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的神灵；经过一段段长期间隔后，从城市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以超越其神灵的禁限。”^①芒福德主张，正是凭借城市的发展人类才不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和完善自己。在城市这个特殊的空间和社会组织形式中可以缔造和改造人类自身，因为与城市发展相伴随的还有“法律规范、举止风度、道德标准、服装、建筑等各方面的相应变化，而这些新变化最后又将城市转变成一个活的整体”。^②因此，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③

芒福德的第三个观点是：城市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城市应该陶冶人关怀人。芒福德从城市的起源、演变和前景的时间轴分析城市功能和性质的演变。在原始社会末期，城市最初是作为一种神圣的圣地吸引了周边人口的聚集，芒福德称之为城市的“磁体功能”。但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②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③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82页。

城市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时,城市的“容器功能”表现得更加突出,城市成为人口、资本、生产资料、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的中心,同时也是各种矛盾和问题集结的中心。城市日益与人们的初衷和美好愿望背道而驰,城市中的寄生性、掠夺性、腐朽性日益加剧。在芒福德看来,这完全违背了城市的本质,城市最基本的功能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城市不仅在于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和消费品来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还应是一个充满爱的陶冶人、关怀人的特殊场域从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理慰藉。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人类“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其要义是说人类应该摆脱物质的束缚和羁绊,尤其是要从物化的现实中走出来,恢复和建立人与自然尤其是人与土地之间的天然的、有机的、密切的联系,从而追求一种内心的安详、和谐和愉悦。人类要诗意地栖居于城市中,要让城市成为一种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理慰藉社会组织 and 空间场域。然而面对土地被资本买卖、分割、垄断和投机的现实,诗意地栖居于城市更是人类短期难以企及的美好愿望。

芒福德最后坚持认为,城市应是一个专门用来进行有意义的谈话的场所。芒福德对现代城市人与人之间日益疏离、冷漠和缺乏信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和对话。芒福德对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异常特殊的意义。在谈到对话的地位时,他说:“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长长的青藤上的一朵鲜花。”^①在谈到对话的作用时,他指出:“如果说提供各种形式的对话和戏剧是城市的本质性功能之一,那么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便很明白——它在于社交圈子的扩大,以致最终使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对话。”^②在谈到对话的意义时,他指出:“从一定意义来讲,这些戏剧性的对话,既是城市生活最充分的体现,又是它最终的辩词。同样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②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道理，城市衰败的最明显标志，城市中缺乏社会人格存在的最明显标志，就在于缺少对话。”^①

从芒福德关于城市的本质探讨可以看出，他始终以“人”为核心和根本来探讨城市的本质、功能和目的，他始终抱有这样的信念：城市建设要坚持“人的尺度”至上的原则而不能把“物的尺度”拔得过高，更不能让后者超越前者，否则就会陷入舍本逐末的境地。芒福德关于城市本质的探讨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不能仅仅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不能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城市建设成功得失的唯一标准，城市建设和发展更应该把公平正义因素、人文的因素、伦理的因素以及环境生态的要素融入其中，应把城市建设发展当作一个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追求经济增长和城市空间扩容的过程；人化而不是物化才是城市化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城市化的建设和发展应从人的本质需求出发，城市建设和发展应以公共利益为重要的考量指标，尤其是要考虑弱势群体、残障人士、老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利益。

（三）农民市民化任重而道远

当前我国城市化的一个最大问题在于，过多注重“地”的城市化，而对“人”的城市化关注和重视不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农业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何谓农民的市民化？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给予了一个准确的界定，他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 或 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② 具体而言，农民市民化包括在身份、地位、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权力观等一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② 参见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主题》，《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系列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民走向市民的过程。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字，2010年我国非农业人口总数为384339361人，全国总人口数为1319046434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9.14%；而据国家统计局同期公布的我国2010年的城市化率为50%。可见，城市化率和非农业人口的比重相差近21个百分点。我们知道，城市化率是按照城镇常住人口的数字为基准进行统计的。这也就意味着居住在城市的2亿7500多万人没有城市户籍。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不单单是一个名义上形式上的户口问题，其背后隐含着的是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的巨大差异，比如在就业、住房、子女上学、社会保障、公共资源享有、公共权利的获取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甚至歧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近3亿进城农民的市民化，中国城市化的质量是要大打折扣的，纵然有高的城镇化率也不能掩饰高城镇化率背后令人担忧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和不断深化，各种社会要素不断地进行分化与重组。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出现了农民工这个新的社会现象。应当看到，作为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农民工对我国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有今天如此巨大的成就，农民工功不可没。尤其是在中国城市化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工更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往往从事的都是比较繁重、工作条件比较差、待遇比较低的工作和工种。农民工进城务工既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矛盾，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又为城市的繁荣和城市居民生活的美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都从根本上促进了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稳定，更是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与农民工的极大付出和重大贡献不相协调的是，农民工享受的权利方面却不尽如人意。在经济方面，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而工资收入和报酬却相对较低；在政治方面，农民工的身份比较含糊，既算不上真正的农民也算不上真正的工人，农民工被边缘化，被各种社会组织排斥，因而不能享有相应的各种政治权利；在文化心

理方面，农民工的子女的教育权得不到切实保障，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提升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农民工普遍都比较自卑，心理相对比较脆弱；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不能像城镇居民那样享受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

因此，如何将农民市民化尤其是让近三亿的进城农民转化为市民这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这既关系到农民自身权益的保障问题，也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和质量高低的问题，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问题。2014年7月24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如何将农民市民化给出了较好的思路和办法，在该“意见”中以下几点尤为关键。

第一，落实户口放宽迁移政策是适应新型城镇化的需要，要统筹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要把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统筹结合起来。现行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把公民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制度与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因此，为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统筹协调发展，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第二，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的原则。农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是社会人口结构中数量最为巨大的部分。农民既有地域的差异，也有从事具体工作和行业的差异，还有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差异。在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和尊重这些既定差异，要充分认识到农业人口向市民转化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和需要时间的过程，不能搞一阵风、一刀切，应充分尊重城乡定居居民的自主意愿，分批分次地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第三，要坚持统筹配套、提供基本保障的原则。农民能否真正转变为市民，不仅仅在于名义上的头衔和身份，更重要的是要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权利。因此，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不能仅仅停留在换证的表面文章上，更应该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下功夫，要扩大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的覆盖面。只有在基本保障和社会权利方面真正落

实到位，农民市民化才可能得到真正地推进和落实。

第四，坚持区别对待和差异化的户口迁移政策。要尊重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城市的历史和现状，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人文条件、地理环境、生态承受能力等各种要素，对不同城市的农民市民化采取差异化的战略。对建制镇和小城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对中等城市有序放开落户限制；对大城市合理确定落户条件；对特大人口城市规模要进行严格限制。唯有如此，才能将城市市民化的普遍要求与地方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找到一条中国有特色的农民市民化之路。

可见，推进我国农民尤其是工作、居住和生活城市的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异常复杂而又任重道远的过程。在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坚持上述原则非常重要。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特别是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把户籍制度改革融入到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这样一个大的视阈和格局中进行布局和规划。户籍制度改革不但是一个户籍问题，它关涉到整个经济社会的改革，只有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大背景和前提下，才能切实有效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二是要把尊重群众意愿和政府投入相结合。农民市民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一定要尊重农民的个体差异和具体诉求，不能搞一窝蜂和一刀切。农民市民化更要强调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农民转变为市民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户口簿的形式上，更为重要的是要让转变为市民的农民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与其他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尤其是要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方面能为转变为市民的农民提供保障。

第五章 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辩证评判

哈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经济分析和政治解读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价值说，它促成了地理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开辟了城市空间分析的全新视角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从现实意义上讲，它给予我们当今中国城市化许多有益的启示和积极的思考。但是，不可否认，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二是对空间问题所做的片面强调和偏颇的立场。

第一节 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积极意义

一、促成了地理学的研究的重大转向

地理学是一门十分悠久古老的学科，从其方法论的角度可以把地理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20世纪60年代前“例外论”为标志，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区域地理学家R. 哈特向 (R. Hartshorne)。从总体看，这一时期地理学的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地理学被认为是一般规律难以解释的，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家普遍都认为地理学没有必要发展普遍的一般原则。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导致了地理学远离当时科学发展的主流，使地理学发展处于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正如哈维所指出的那样，“地理学执着于目的的特殊（独特区域的描述）和解释形式的特殊（独特

方法), 结合成一强大的正统派, 使地理学难越雷池一步”。^①

随着地理学中“例外论”方法论的弊端日益暴露, 寻求新的指导地理学研究的方法就成为地理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逻辑实证主义和计量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于是就出现了地理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其方法论以逻辑实证主义和计量革命为代表,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哈维, 而其标志性的著作是1969年出版的《地理学的解释》。该书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角度证明了在地理学中采用数学统计方法、空间分析、区位模型和定量化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而牢固树立了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计量分析在地理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and 绝对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 实证主义方法论与计量革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计量革命的背后实质上就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哲学。

应当肯定的是, 实证主义和计量革命对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的影响。数量革命冲破了地理学方法论上长期的故步自封、孤立、沉闷的局面, 它颠覆了地理学科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地理学不适用于控制性实验、地理学中的人文因素不能用数学语言来加以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是地理学发展历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实证主义方法论引入地理学后, 地理学发生了革命性的积极的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地理学重建了研究内容和理论主体, 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地理学力图用空间分布的普遍规律来解释地区的独特事件; 二是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更多地采用假设—演绎方法; 三是实证研究中数量化技术的特点加强了地理学的科学化。^② 因此, 地理学中计量革命的兴起和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引进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 应该清楚地看到, 实证主义方法论对地理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逻辑实证主义助长了地理学中技术的观

① 转引自张祖林:《地理学中的计量革命与实证主义方法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2期。

② 参见蔡运龙:《地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评〈地理学中的解释〉》,《地理研究》1990年第3期。

念，排斥了传统的地理学研究方法；还有就是由于片面强调逻辑、数学和形式的完美，而对地理学现象中丰富内涵的忽略。

正是认识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局限及其对地理学发展的桎梏，哈维才倡导要引发地理学思维领域的一场革命，主张放弃旧的理论范式，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所以，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虽然《地理学中的解释》出版后好评如潮，但在4年后哈维又出版了标志其思想发生重要转折的《社会正义和城市》这部著作，这部著作标志着哈维从实证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也标志着哈维建构新的地理学范式和进行地理学革命的开始。用哈维自己的话说，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来分析理解他所探讨的诸如空间、城市化和社会主义等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强大分析能力则迎合了他的迫切需求。这种新的理论范式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进地理学研究当中，把地理学和社会想象有机结合起来，力图使地理学发展走上更加科学的道路。在哈维看来，之所以要倡导地理学范式和思维领域的革命，其原因在于面对广泛存在的生态问题、城市问题、国际贸易问题时，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地理学却不能提供深度的解释和说明，也就是说，以前的地理学范式不能很好地应对实践中的一切问题。正是出现的客观社会条件和我们不具备应对实践中发生的一切的能力，我们才有必要对地理学思维进行一场革命。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哈维所倡导的地理学范式革命的唯一理论和指导思想，他所倡导的地理学革命理论实质上是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现象学等方面相结合起来的大杂烩，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他所谓的把地理学和社会想象连接和架构起来的一种新的地理学。

但不管怎样说，哈维对推动当代地理学发展、促成地理研究的重大转向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方面，由于他对地理学研究中排斥一般原则和方法的“例外论”感到不满，于是在综合当时地理学研究新的趋势基础上，出版了被誉为“地理学的圣经”的《地理学中的解释》这部著作，对当代地理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在面对地理学不能解决实践中的许多问题时，他又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寻找理论资源和方法资

源,使地理学更多地与社会实践、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以达到与马克思“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地理学中诸如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等二级学科兴起和发展,哈维都对此作出了积极的有益的贡献。

二、开辟了城市空间分析的新视角

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观点的不同,可以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反映社会客观经济运动的规律,从而具有科学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逐步发展的。其理论来源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讲是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财富增长和分配的规律、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事实,但是由于受到阶级利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实质,更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扬弃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唯物辩证法,成为一种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次从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认为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中最本质、最为根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而是掩藏在物下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从而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马克思根据劳动二重性构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科学结论。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工具和方法论指南,更是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工具。哈维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借鉴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诸多范畴和分析方法来分析、解读、批判和展望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日渐成为地理学中激进社会思潮的理论基础。在这些激进思潮中,最有影响的是以结构学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派。这种学派“主要运用结构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去分析西方城市社会的空间问题,其主要论点是,社会应作为一个整体,即结构,而结构包括3个层次——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其经济层次表现为生产方式”。^①所以,在这些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派看来,“城市研究理论必须把城市发展过程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阶级关系”。^②不难看出,许多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者都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来探讨当今的城市问题,这在众多研究城市问题的派别之中是较为突出和引人注目的。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哈维才从经济的视阈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进行科学的分析,才从政治视阈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进行深入的政治解读。在哈维看来,从资本逻辑视阈的角度分析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实质上就是空间商品堆积的空间,这些空间产品是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也是级差地租、垄断地租和绝对地租的结合体;在塑造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各种力量中,起主导作用和决定力量的是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内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主要表现为过度积累,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是解决过度积累危机的一种手段,但是这只是权宜之计;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向弹性积累的变化,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呈现出新的经济特点。从权力视阈的角度分析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还是集中了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区域,因为在资本

^① 黄亚平:《城市空间理论与空间分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77页。

^② 黄亚平:《城市空间理论与空间分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主义城市空间中，包含着资本和劳动的矛盾、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凸显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统治阶级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竭尽所能地追逐阶级垄断租金；面对这些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歹托邦”图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必然会被新的城市空间所替代。

总的来看，哈维开辟了从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视角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微观视阈的全新视角，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更让人体会到了他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分析的深刻性、解读的全面性和理论的说服力。正因为上述原因，使得哈维与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一起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当之无愧的典型代表。

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思想的新境界

与其他许多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实则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后现代主义学者不同，哈维在分析和解读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坐标。他一贯坚持采用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研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哈维将空间分析的维度植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中，契合了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和空间地位凸显的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地推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哈维在分析解读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始终贯穿其始终。哈维把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理解为是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体，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分析解读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两个重要路径。从生产力角度讲，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这个特殊阶段的结果，是在以资本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导下资本积累不断扩大的产物，城市空间发展的主体是广大的工人阶级和普通大众；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不仅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场所，还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集中的区域，也是当代资本主义阶级斗争上演的重要舞台。总

之，在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和解读中，哈维综合吸收、借鉴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危机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将自己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和解读建立在更加科学和合理的基础之上。

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拓展还体现在主张时空结合的辩证立场和积极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上，并从空间的视角来分析和解读社会现实。哈维继承了由列斐伏尔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创的在城市领域进行空间分析的传统，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努力建构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在经典的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其理论关注的重心在于工业领域生产的历史，而对城市空间生产机及其矛盾的关注相对薄弱和不足。而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始终关注空间构型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辩证关系，他不仅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而且还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视作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点空间和核心。因此，“城市是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集中的场所，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城市充满着相互对立的关系和力量，是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群体争夺各种城市资源的斗争场所。他们关注在城市发展和变迁中，谁是受益者，谁的利益被侵害了，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为谁服务”。^①正如哈维所深刻指出的那样：“那些支配着空间的人可能始终控制着地方的政治，即使对某个地方的控制要首先控制空间，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定理。”^②

从当今现实来看，空间生产和空间问题也是我们城市化过程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当今的城市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在这一背景下，“随着以交通、通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人员、资金、信息在全球规模上高度流动，生产、技术、资本、劳动力在全球空间的重新布局，阶级、生态、种族、国家以及其他政治主题也发生着深刻

^① 张应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② 大卫·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2页。

变化”。^①从空间的角度看，全球化进程就是一系列空间重组和空间不断得以变化和重塑的过程，这一大的背景下要求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关注空间生产问题，要对空间生产的经济社会意义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中，围绕住房、交通、公共空间等空间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问题越来越重要，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合理占有和分配空间资源、如何避免由空间问题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和谐问题等等。这些都对我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必须直接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二节 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缺憾

总体来说，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解读和批判是较为全面深刻的，这对我们当今的城市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照意义。但是，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解读和批判还存在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思想存在严重的误读和曲解。

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一样，哈维始终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对城市空间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认为，尽管马克思、韦伯（Weber）和涂尔干（Durkheim）对城市的论述不少：马克思生动说明了城市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破坏性力量，韦伯主张城市可以提供计算理性的增长，涂尔干声称城市可以实现对道德凝聚力的整合；但是他们都认为没有必要发展一种特殊的城市理论，都将城市的研究和分析融入到以时间居上的社会关系理论之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与历史学教授艾拉·卡茨纳尔逊比桑德斯说得更为具体：“在诸如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滕尼斯（Toennies）、齐美尔（Simmel）等伟大的理论家那里，这样的城市既不在

^①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译序”第13页。

描述的意义上占据中心地位，也不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主题。当然，他们每个人都涉及城市，但只是将它当成与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为中心的现代性达成协议的更大工程的一个小部分。无独有偶，现代大城市是他们考虑现代世界的这些标志时一种不可避免的、必不可少的因素。”^① 下面我着重分析和回应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思想存在的误读和偏见。

我们知道，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相对时间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对城市空间问题没有那么钟情和强调。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柏林、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创立和发展都与资本主义城市本身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就连艾拉·卡茨纳尔逊也承认：“可以肯定，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地将城市当作一个理论上的关键分析对象，但是在劳动分工的大问题之内，有关城市化和城市问题对他们思考生产方式的转型还是相当重要。”^② 而且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论住宅问题》等经典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把城市空间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进行分析、解读和批评，不乏对空间问题的深刻、系统和较为全面的论述。因此，并不像列斐伏尔、哈维和曼纽尔·卡斯特以及爱德华·索亚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严重的“空间缺场”和“空间失语”。由此可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误读和曲解。

一、马克思的城市空间思想

概括地说，马克思有关城市空间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有关城市空间的组成、城乡对立、资本积累和阶级矛盾及其社会冲突等思想中。具体讲，

^① 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② 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城市空间是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体。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人与自然的二重化。实践是人与自然二重化的关键点，正是人类实践的不断推动，才导致人与自然的分离和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随着人类实践范围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总的趋势既是“自在自然”不断缩小，“人化自然”不断扩大，自然越来越打上人类实践的烙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城市这个独特的空间同样是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体。

就城市的自然空间而言，主要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建筑和公共场所等物质形态，这种空间是在“自在自然”的基础之上，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和发展的并为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服务的自然空间形态。具体到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其自然空间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土地、市场的聚集，它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提供物质基础条件和重要前提。

就城市的社会空间而言，主要是指城市空间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等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因为，社会关系既是城市空间的形式，更是城市空间的实质性内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要载体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城市居民生产生活活动借以施展的网络和框架，离开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框架和网络，城市就会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物质空壳。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资本关系成为主宰一切社会关系的灵魂和主体，其他一切社会关系都必须服从于它、依附于它。因此，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表现为等级化、同质化并列的特点，表现为城市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的两极对立。

第二，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与乡村严重对立的空間。

城市与农村的对立鲜明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空间差异和断裂，城乡对立是人类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和工业城市的时代，工业革命和工业城市二者互为因果不断推动和促进对方发展。正是在二者的推动作用下才造成了城

乡的严重对立，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二元化的空间。于是，对城乡对立和二元化空间的批判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乡对立最为发达和典型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为城乡对立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业革命催生了工业城市的形成，也加速了城乡的对立。产业革命使工厂大量集中在城市，城市成为金融、商业、交通和市政设施的中心和集结地，城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以至于最终取得了对农村的绝对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村的剥削基础之上的。这样农村日益成为城市的附庸而居于被支配地位和从属地位，城乡发展典型的“二元”对立模式和在空间上的断裂差异越来越拉大，因此，“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①

马克思恩格斯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城乡对立问题。一方面，城乡对立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在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和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更多是从批判的视角来看待城乡对立，他们认为城乡对立深刻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分工的不合理性，具体变现为农民和城市居民地位和权利的不平等，以及相较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的附庸和从属地位。因此，消灭城乡对立是社会统一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人类理想的社会空间必然是城市和乡村和谐共生的空间。

第三，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只有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才能不断进行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城市在发展中取得了对乡村的支配和统治地位，因此，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页。

就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

在马克思看来,城市的本质就体现为一种聚合经济所带来的空间优势。资本的不断扩张和积累是资本主义城市的一项重要职能。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表现为资本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大量聚集,城市成为金融、商业、信息和交通的中心。与此同时,城市还积聚了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和劳动力。正是这些城市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在这个特定空间的聚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才能获得不断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够得以维持和发展。

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积累的城市空间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资本对城市空间面貌的改变和塑造。马克思重点分析了级差地租与城市空间塑造的关系,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由于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的不同导致了不同地段的地租高低不同,由此也就带来了数量不等的资本聚集,这也造就了对不同城市区域的空间塑造和改变的程度、特点的不同。所以,由地理位置所导致的级差地租塑造了资本主义等级化的城市空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全面考察了曼彻斯特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在这个城市中工人区是与资产阶级所居住的区域严格划分开来的,整个城市划分为商业区、工人区和资产阶级居住区三个对立的截然不同的区域。工人区占据了曼彻斯特的大部分区域,环绕在商业区的外围,而资产阶级居住区则位于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适应、交通便利的城市外围的房屋或别墅里。^①

第四,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冲突的集结地。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从辩证的眼光来分析和看待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即看到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负面消极的作用,同时又注意到它对无产阶级客观上所起到的正面积极作用。

一方面,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表现为各种社会要

^① 参见李春敏:《城市与空间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城市空间思想新探》,《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

素和人口的大规模聚集，这一特点必然会导致和加剧个人、群体和阶层或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恩格斯曾对伦敦这样的大工业城市的人际关系作了总结和概括：所有人聚集在狭窄的空间里，表现为不仅人情的孤僻和在追逐利益时可怕的冷淡，整个城市就好似一盘散沙的世界；总之，“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①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大工业的重要载体，而大工业又是无产阶级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聚集效应促成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急速发展，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数量也急剧扩展，这就促使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进而为工人阶级的联合创造了必需的条件。因此，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大工业创造无产阶级，促成了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认识到了他们必须团结起来解放世界的神圣使命。从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展开阶级斗争的主要阵地和场所。1848年的法国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无产阶级斗争运动，无一例外都是在城市空间中展开进行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解决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问题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根除。

二、恩格斯的城市空间思想

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哈维对马克思城市空间思想的偏见和曲解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在一个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页。

立的角度来看待和认识问题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作为其亲密战友的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伟大学说和思想体系，恩格斯的思想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恩格斯的的城市空间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割裂其与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思想的内在的有机的联系。

关于城市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恩格斯的著述应该说非常丰富，其论述也非常深刻。1845年恩格斯在莱比锡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71年的《论住宅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研究的经典文献。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24岁时，通过对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差不多所有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况进行两年的实地考察后写就的一部著作。它也是恩格斯早年考察英国工业城市空间的典范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研究历史中具有开历史先河的重要地位。正如恩格斯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到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24岁。现在我的年纪相当于那时的三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①

在该著作中恩格斯考察了劳动阶级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和城市空间的内在关系，其中社会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社会地理与劳动阶级形成是恩格斯关注的重点。首先，恩格斯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变化与划时代的工业革命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恩格斯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推动、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这些因素的联合作用，才造就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人口、资本、资源和功能的集中，由此也形成了城市发展新的动力机制，而城市的发展又会对城市的地理格局、空间关系、社会关系和劳资关系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其次，恩格斯注意到了曼彻斯特阶级严重分化的事实。曼彻斯特这个城市空间的阶级分化不仅体现在物质财富占有的两极对立和分化上（一边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页。

是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一边是无产阶级的穷困潦倒），还体现在空间的隔离与区分。工人阶级主要聚集于人口密集的街区，这一带的卫生状况和治安状况都最差；商业中心主要处于集中于工业园的集市区、住宅楼；而资产阶级的住宅区则处于靠近商业中心的城郊林荫道地区，不仅生活舒适方便，而且环境也比较安逸舒适。最后，与城市空间隔离与区分相适应的就是阶级之间的隔离和冷漠。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到处都充满了“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而其中最起决定作用的就是资本，谁拥有了资本谁就拥有了支配其他人的权力和力量，因此广大的无产阶级和贫困群体注定会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而资本家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怜悯的。这种新型的城市空间关系会塑造新型的社会关系，也必然会对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心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而让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和更加自觉地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因此，在恩格斯看来，工人在工厂的集中不仅加快了工团主义、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等斗争，而且“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①

总之，恩格斯“将城市空间置于他思考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位置，以及他对城市问题具有前瞻性的处理，的确开辟了一条例外的研究城市空间、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形成的康庄大道”。^②如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对该著作的评述所说的那样，恩格斯开辟了把城市整合到社会理论中的道路，他将空间引入到了马克思的宏观视阈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之中，把空间引入到了对资本积累的理解和阐述之中。

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另一篇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该文中，恩格斯通过论战的形式批驳了以阿·米尔伯格为代表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各种社会庸医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方案，在反对这些观点的过程中恩格斯全面系统地论述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页。

^② 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148页。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的最重要问题——住房问题。

第一，住房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尤其体现在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上。对此，恩格斯指出：“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各不相同，其中也在于消费它们所用的时间不同。一个圆面包一天就吃完了，一条裤子一年就穿破了，一所房屋依我看要 100 年才住得坏。因此，使用期限很长的商品就有可能每次按一定的期限零星出实其使用价值，即将使用价值出租。因此，零星出卖只是逐渐地实现交换价值；卖主由于不把他预付的资本和由此应得的利润立刻收回，就要靠加价即收取利息来获得补偿，加价即利息的高低并不是任意决定的，而是由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决定的。在 100 年终了之后，这所房屋就用坏了，消耗掉了，不能再住人了。”^①可见，住房这种特殊商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是通过分期分批逐步实现的，而且其周期都比一般的商品要长得多。

第二，住房短缺是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恩格斯认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像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内。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房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房短缺。”^②恩格斯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住房短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必然的现象，试图解决住房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第三，要根除对解决住房问题的各种脱离实际的空想。恩格斯主要批判了一些“社会庸医”关于解决住宅问题的三种不切实际的方案。一是增加住宅供应量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方案。恩格斯认为这种办法顶多只能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9 页。

到暂时缓解住房问题的作用，不能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不能指望单方面通过改变供求关系来解决住宅问题。二是寄希望于资本家的良心和仁慈。在恩格斯看来，这是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方案，资本家“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这是因为“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说教，而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碰到私人利益，必要时一碰到竞争，就又会立刻烟消云散。这种说教同站在水池边的老母鸡向它孵出的在池中欢快地游来游去的小鸭所作的说教是一样的。虽然水里容易淹死，小鸭还是下了水；虽然利润不讲温情，资本家还是趋求利润”。^① 三是依靠国家对资本的限制和调控帮助来解决住宅问题。恩格斯认为这种方案同样是靠不住的，因为“现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房灾难。国家无非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个别资本家（这里与问题有关的只是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因此，如果说个别资本家对住房短缺虽然也感到遗憾，却未必会受触动而去从表面上掩饰由此产生的极其可怕的后果，那么，总资本家，即国家，也并不会作出更多的事情。国家顶多也只是会设法在各地均衡地推行已经成为通例的表面掩饰工作。我们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② 而且由于现代国家与资本的成为一体的结盟，所以国家根本不愿意解决住宅问题。

第四，住房问题的实质是资本问题，要控制资本和克服资本的矛盾性。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住房短缺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资本在社会生产及社会生活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和支配地位。资本要服从价值增殖的根本目的，作为重要商品的住宅也必须服从这一根本要求。所以，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2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

的住宅问题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① 归根到底，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对资本盲目崇拜的社会，是一个资本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妄图依靠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来控制约束资本是彻头彻尾的空想。

第五，住宅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依赖于城乡对立的消除。在恩格斯看来，纵然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住宅问题仍然不会自动解决，一个最主要的羁绊就是城乡对立。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不能解决住房问题，固然与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着绝对的必然的关系，但是也应当看到，“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显然遭到了失败，由于碰到城乡对立而遭到了失败”。所以，“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从而可能着手消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城乡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消灭这种对立，相反，它必然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② 就“怎样消灭城乡对立”问题恩格斯也提出了自己的大致设想和方案，他指出：“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并适应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扩充起来——同时这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③

由此可以看出，哈维在城市空间问题上对马克思的责难和批评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对城市空间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思想，这些思想成为很多城市研究者的重要借鉴。只不过马克思主张，在考察分析社会历史时，应该把时间作为重要的范畴和视角，空间虽然也很重要，但相较于时间而言具有从属的意义。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

间和城市空间的研究，在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献中不乏对城市尤其是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论述。而且从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解读中可以看出，他始终生活在马克思空间思想的光环之下，他的主要思想和观点也是对马克思城市空间思想的借鉴、继承和发挥。

索引

A

- 艾拉·卡茨纳尔逊 157, 186, 223, 239, 240, 246
爱德华·索亚 20, 51, 78, 126, 128, 129, 240
奥斯曼 114

B

- 巴尔的摩 198
巴黎 6, 10, 40, 113, 114, 189, 240, 244
搬迁理论 192, 193
彼得·桑德斯 239
贬值 39, 107, 108, 119, 121, 161, 164, 166, 172
辩证法 13, 34, 37, 38, 39, 71, 75, 141, 142, 144, 180, 233, 235, 237
辩证乌托邦 8, 34, 39, 70, 208, 209
不变资本 32, 33, 162
不平等 4, 39, 80, 81, 135, 148, 209, 210, 212, 225, 242
不平衡地理发展 9, 58, 80, 81, 141,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6, 190, 191
不平衡发展 15, 33, 78, 142, 174, 176, 181, 188

C

- 财政收入 93, 94, 137, 171, 173, 199
差异性空间 42, 48
产业后备军 159, 162, 163
超额利润 91, 98, 100
超额剩余价值 80, 109
城市病 188, 190, 205, 225
城市规划 4, 7, 15, 21, 38, 63, 102, 138, 139, 140, 205, 207, 215, 216, 221, 222, 223, 224, 226
城市化 1, 2, 4, 5, 6, 8, 11, 12, 13, 14, 15, 16, 25, 35, 61, 65, 84, 95, 96, 97, 103, 104, 105, 106, 110, 111, 113, 123, 125, 127, 128, 129, 130, 131,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2, 143, 176, 186, 188, 192, 199, 200, 201, 204, 207, 208, 209, 211, 215, 216, 218, 219, 220, 222, 223, 224, 225, 228, 229, 230, 232, 234, 238, 239, 240, 241, 247
城市化率 135, 136, 215, 229
城市空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22, 23, 24, 27, 31, 32, 33, 34, 35, 36, 37, 39, 40, 43, 44, 45, 48, 49, 50, 51, 58, 59, 61, 63, 64, 65, 70, 73, 74,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90, 91, 92, 93, 94, 95, 97,

98,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3, 114, 115,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4, 135, 140, 141, 142, 143, 148, 149, 150, 151, 152, 155, 157, 163, 164, 165, 167,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8, 232,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9, 250

城乡对立 240, 241, 242, 249

城镇化 5, 135, 136, 137, 139, 229, 230

抽象空间 42, 43, 44, 46, 47, 49

创新 82, 98, 99, 100, 110, 111, 124, 153, 154, 168, 178

创造性破坏 10, 130, 142, 143, 165, 166, 178

磁体功能 215, 226

D

丕托邦 203, 205, 206, 207, 237

戴维·萨克 19

等级制 82, 96, 169, 174, 186, 196, 197, 212

地理环境 19, 62, 73, 139, 181, 231

地理空间 8, 20, 48, 59, 62, 108, 126, 154, 172, 175, 178, 179, 180, 194

地理学 1, 2, 5, 6, 7, 9, 11, 12, 13, 15, 16, 19, 20, 21,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4, 37, 38, 50, 58, 60, 61, 63,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86,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3, 174, 175, 177, 179, 232, 233, 234, 235, 236

地租 11, 15, 33, 85, 91, 92, 93, 94, 97, 106, 141, 191, 192, 196, 197, 198, 199, 200, 216, 236, 243

帝国主义 6, 28, 61, 147, 174, 179, 211

第二级循环 80, 117, 118, 119

第三级循环 80, 118, 119

第一级循环 80, 117, 118, 119

E

恩格斯 60, 81, 82, 96, 97, 99, 130, 132, 133, 150, 151, 159, 186, 187, 205, 206, 207,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F

发展模式 4, 15,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215, 216, 219, 223

法兰克福学派 143, 144, 145

范式理论 25

方法论 2, 5, 9, 11, 14, 24, 25, 36, 37, 59, 72, 73, 75, 77, 78, 82, 110, 149, 177, 207, 214, 232, 233, 234, 235, 236

房地产 45, 87, 88, 89, 90, 98, 101, 106, 181, 182, 192, 193, 194, 196, 197, 198, 200, 205, 216, 223

分工 21, 61, 72, 82, 84, 96, 97, 105, 107, 111, 123, 124, 162, 166, 170, 183, 185, 240, 242

福柯 14, 15, 18, 20,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67

福特制 9, 82, 85, 123, 124, 236

福特主义 82, 123, 124, 125, 126, 128, 129

G

改变世界 16, 26, 30, 38, 213, 214

改造世界 2, 78, 235

- 高房价 216
- 革命 25, 36, 40, 44, 47, 61, 69, 70, 71, 74, 82, 97, 99, 107, 124, 133, 141, 154, 158, 189,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25, 233, 234, 238, 241, 242, 244, 245
- 工业革命 97, 225, 241, 245
- 工业文明 225
- 工作日 66, 127, 153, 160, 161, 162
- 公共空间 3, 4, 79, 204, 219, 239
- 公平 22, 66, 67, 140, 148, 193, 220, 221, 224, 228
- 共产主义 46, 133, 144, 158, 213
- 古典政治经济学 148, 149, 235
- 固定资本 31, 62, 74, 87, 106, 107, 117, 119, 121, 122, 164, 165, 166, 171, 173
- 雇佣关系 131
- 关系空间 64, 92, 93, 192
- 规划 3, 4, 7, 9, 10, 15, 21, 38, 43, 48, 49, 53, 63, 80, 98, 102, 119, 136, 138, 139, 140, 150, 151, 170, 194, 197, 205, 206, 207, 215, 216, 221, 222, 223, 224, 226, 231
- 国家 5, 19, 23, 28, 29, 30, 42, 45, 46, 47, 49, 60, 61, 80, 82, 94, 97, 98, 99, 108, 111, 113, 118, 119, 121, 123, 124, 129, 133, 134, 135, 136, 137, 139, 146, 152, 157, 158, 169, 172, 173, 174, 176, 177, 178, 179, 181, 184, 185, 188, 190, 191, 197, 200, 201, 203, 204, 207, 211, 212, 213, 217, 223, 229, 238, 240, 247, 248, 249
- 过度积累 80, 81, 108, 117, 118, 119, 171, 190, 200, 236
- 过滤理论 192, 193
- 过剩人口 152, 159, 162, 163
- 哈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6, 48, 49, 50, 51,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3, 104, 105, 106, 107,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63, 164, 165, 166, 167, 169,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3, 184, 185,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7, 198, 199, 201, 203, 204, 205,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5, 246, 249
- ## H
- 和谐 3, 4, 27, 31, 139, 140, 190, 203, 204, 217, 219, 220, 221, 225, 227, 229, 230, 239, 242
- 后福特主义 123, 124, 125, 126, 129
- 后现代 6, 9, 10, 25, 48, 50, 58, 62, 65, 69, 70, 75, 79, 82, 114, 123, 125, 127, 128, 176, 237, 238
- 后现代主义 6, 10, 25, 65, 123, 125, 127, 128, 237
- 环境 3, 8, 12, 19, 22, 24, 25, 27, 28, 35, 37, 38, 45, 62, 64, 67, 71, 72, 73, 74, 76, 77, 79, 84, 85, 90, 93, 97, 98, 104, 105, 107, 108, 111, 117, 118, 119, 128, 139, 140,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7, 169,
170, 172, 173, 180, 181, 182, 183, 185,
187, 188, 189, 190, 200, 203, 204, 207,
208, 211, 212, 219, 222, 223, 224, 225,
228, 231, 243, 246
环境正义 143, 147, 148
货币 22, 32, 33, 62, 69, 79, 81, 104,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8, 120, 121,
130, 131, 133, 147, 148, 149, 150, 159,
171, 175, 178, 179, 186, 225
货币拜物教 115, 116
霍华德 190

J

机械化大生产 159, 160, 161, 162
基础设施 3, 23, 77, 79, 84, 98, 105, 106,
110, 120, 127, 134, 137, 139, 168, 169,
171, 172, 178, 194, 196, 204, 208, 215,
222, 223, 241, 243
级差地租 15, 33, 85, 91, 92, 93, 94, 216,
236, 243
技术 29, 44, 45, 52, 53, 56, 64, 69, 71, 80,
82, 98, 99, 100, 103, 107, 111, 118, 119,
121, 122, 124, 125, 126, 128, 129, 131,
144, 145, 147, 148, 149, 154, 158, 163,
164, 165, 166, 168, 169, 171, 173, 176,
181, 190, 207, 209, 213, 214, 222, 225,
233, 238, 243, 245
技术创新 98, 124, 154
价值增殖 111, 121, 130, 131, 160, 187, 248
价值中立 2, 26
监督 53, 54, 55, 56, 67, 101, 127, 178
建筑空间 53
交换价值 15, 33, 84, 85, 86, 87, 88, 89, 90,
107, 108, 109, 115, 154, 161, 162, 174,
193, 236, 247

交通 3, 21, 52, 62, 69, 71, 80, 85, 90, 92,
99, 102, 103, 107, 134, 155, 178, 183,
184, 188, 189, 219, 225, 238, 239, 242,
243, 247, 249
郊区化 89, 118, 120, 174, 176, 177, 188,
189, 190, 196
阶层 3, 4, 29, 53, 85, 90, 101, 102, 103,
157, 170, 171, 172, 183, 188, 192, 216,
217, 219, 221, 223, 224, 244
阶级斗争 6, 9, 11, 13, 40, 48, 74, 118, 141,
151, 152, 157, 166, 168, 169, 170, 172,
173, 174, 180, 181, 189, 235, 237, 238,
244
阶级联盟 45, 167, 169, 170, 171, 172, 173,
191, 192
阶级垄断租金 15, 191, 192, 193, 194, 195,
198, 199, 200, 201, 203, 237
阶级意识 152, 156, 157, 183, 184, 185,
211, 244
结构功能主义 34, 35, 36
结构性一致 167, 168, 169, 172, 173
解放 25, 30, 57, 58, 70, 75, 76, 136, 144,
145, 148, 149, 178, 206, 212, 244
解释世界 2, 16, 19, 38, 78, 235
金融机构 21, 89, 90, 108, 113, 114, 118,
172, 179, 194, 198, 199, 200, 203
金融危机 100, 115, 121, 157
金融资本 15, 31, 33, 84, 85, 105,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32, 141, 179,
191, 196, 205, 208, 219, 236
经济危机 29, 32, 80, 100, 119, 120, 121,
122, 123, 133, 172, 186, 196, 203, 204
经济效益 67, 134, 147, 148, 222, 228
竞争 28, 61, 80, 98, 100, 104, 105, 107,
109, 114, 120, 122, 123, 126, 133, 151,
153, 161,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70, 173, 176, 182, 187, 190, 194, 196, 248
 居住差异 9, 78, 80, 174, 176,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99
 居住公平 220, 221
 居住权利 220, 221
 绝对地租 15, 33, 85, 91, 92, 93, 94, 192, 236
 绝对空间 19, 42, 49, 64, 93, 191, 192, 193, 194, 199

K

开发商 45, 89, 90, 98, 106, 128, 140, 172, 191, 196, 198, 200, 205, 216, 219, 223, 224
 凯恩斯主义 124
 科学 4, 5, 6, 8, 9, 10, 25, 26, 30, 31, 36, 38, 44, 45, 68, 73, 75, 76, 80, 82, 83, 116, 118, 119, 121, 122, 124, 131, 138, 140, 144, 145, 148, 163, 174, 179, 186, 209, 214, 220, 222, 224, 228, 232, 233, 234, 235, 236, 238, 239, 243, 245
 可变资本 32, 33, 162
 可持续发展 67, 143, 146
 空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3, 114, 115,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3, 134, 135,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7,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9, 250

空间拜物教 83

空间崛起 50, 52

空间生产 9, 13, 14, 32, 33,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78, 80, 81, 82, 83, 104, 108, 115, 134, 135, 141, 142, 153, 173, 191, 204, 216, 220, 238, 239

空间修复 33, 81, 108

空间障碍 62, 107, 108, 175, 178

空间正义 216, 220, 221

空间殖民 45

空间资源 3, 4, 134, 135, 169, 194, 195, 220, 239

库恩 25

扩大再生产 109, 117, 242

L

劳动力 22, 41, 79, 84, 91, 95, 98, 102, 103, 105, 108, 113, 118, 122, 125, 126, 127, 131, 134,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8, 169, 171, 173, 175, 182, 184, 185, 203, 204, 211, 229, 238, 241, 243

李嘉图 26, 27, 91, 148, 235

理性 27, 29, 73, 95, 121, 131, 136, 140,
144, 145, 164, 170, 190, 195, 239, 242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2, 7, 13, 15, 50, 59,
61, 70, 71, 72, 73, 74, 75, 77, 78, 82, 83,
110, 149, 177, 207, 238
历史决定论 51, 59, 73
历史唯物主义 2, 7, 8, 9, 34, 36, 37, 70,
73, 74, 75, 77, 82, 83, 235, 237, 238,
240, 246
利己主义 205, 244, 246
利润 22, 32, 33, 43, 46, 69, 78, 79, 80, 81,
84, 89, 91, 93, 95, 97, 98, 99, 100, 101,
103, 105, 110, 115, 116, 117, 120, 122,
124, 130, 131, 134, 149, 151, 152, 161,
164, 165, 166, 169, 170, 173, 175, 179,
181, 193, 194, 195, 199, 200, 201, 216,
219, 222, 223, 247, 248
列斐伏尔 8, 14, 18, 20,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1, 64, 74, 78,
180, 181, 237, 238, 240
路易斯·芒福德 21, 22, 23, 101, 102, 138,
139, 188, 189, 190, 201, 202, 215, 226,
227, 228
垄断 15, 33, 58, 85, 87, 88, 91, 92, 93, 94,
95, 100, 109, 110, 112, 141, 156, 159,
163, 165, 166, 170, 173,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3, 227, 236, 237
垄断地租 15, 33, 85, 91, 92, 93, 94, 191,
192, 196, 197, 198, 199, 200, 236
路易斯·沃斯 21, 23, 85, 172, 173, 182
掠夺性 225, 227
伦敦 13, 204, 206, 240, 244
罗斯柴尔德家族 113

M

马尔萨斯 26, 27, 143, 145, 146
马克思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8, 20, 23, 24, 25, 26, 27,
28,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6, 47, 48, 59, 60, 61, 62, 64, 66, 67,
73, 74, 77, 78, 81, 82, 83, 84, 86, 87, 91,
92,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5,
106, 109, 110, 111, 112, 115, 116, 117,
118, 121, 122, 123, 128, 130, 131, 132,
133, 134, 142, 144, 151, 152, 153, 154,
155,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74, 177, 180, 183, 184, 185, 186, 187,
190, 191, 205, 206, 207, 210, 211, 213,
214, 220, 223, 232,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马克思主义 2, 3, 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0, 23, 24, 25, 26, 27, 28,
30, 31, 32, 33, 34, 36, 37, 38, 39, 40, 46,
59, 60, 61, 62, 73, 74, 78, 83, 84, 86, 110,
118, 122, 157, 163, 180, 186, 190, 207,
210, 211, 213, 214, 220, 223, 232,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4,
245, 24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8, 10, 14, 20, 23,
32, 122, 163, 235, 236, 237
麦卡锡主义 27
曼彻斯特 240, 243, 245
曼纽尔·卡斯特 51, 74, 78, 237, 240

N

牛顿 19, 64, 68
农民 47, 210, 211, 214, 218, 220, 228, 229,
230, 231, 242, 248

农民工 229, 230

P

批判 2, 3, 6, 7, 8, 9, 10, 12, 15, 18, 20, 24, 26, 27, 28, 29, 30, 31, 36, 37, 40, 41, 50, 60, 71, 72, 73, 76, 77, 100, 110, 126, 129, 144, 145, 147, 163, 174, 180, 213, 214, 220, 236, 239, 240, 242, 247

批判地理学 2, 26, 27, 28, 29, 30, 31, 37, 50, 60, 71, 72, 73, 76, 77

贫困 109, 146, 159, 177, 192, 194, 204, 212, 215, 225, 246

平均主义 209, 210

Q

齐美尔 104, 239

启蒙思想 143, 144, 145

启蒙运动 144, 148

汽车 52, 69, 80, 118, 120, 124, 188, 219

迁出理论 192

乔万尼·波特若 22

全景敞视建筑 54, 56, 58

全景敞视主义 51, 54

全球化 8, 9, 45, 46, 57, 64, 83, 120, 129, 133, 134, 174,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237, 238, 239

权力 3, 8, 15, 16, 18, 20, 22, 26, 28, 29, 30, 39, 43, 45,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68, 69, 72, 77, 81, 83, 87, 97, 99, 100, 106, 111, 112, 114, 115, 116, 127, 129, 131, 138, 141, 146, 148, 149, 151, 152, 158, 165, 172, 173, 178, 179, 181, 183, 184, 185, 189, 196, 197, 202, 205, 209, 212, 215, 216, 220, 221, 223, 225, 228, 236, 246, 248

权力逻辑 15, 16, 20, 22, 141, 215

R

人的尺度 22, 190, 224, 225, 228

人工环境 22, 64, 84, 85, 104, 105, 107, 108, 117, 118, 119, 207

人口 3, 21, 26, 27, 66, 71, 76, 91, 97, 102, 135, 136, 137, 139, 145, 146, 150, 152, 154, 155, 159, 162, 163, 176, 177, 182, 183, 184, 187, 188, 190, 204, 215, 219, 222, 223,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42, 244, 245, 246, 249

人类 1, 3, 4, 19, 21, 22, 24, 25, 26, 30, 36, 42, 43, 44, 46, 51, 52, 53, 59, 62, 63, 64, 65, 69, 73, 76, 79, 83, 85, 86, 87, 94, 99, 103, 133, 134, 142, 143, 144, 147, 149, 150, 151, 169, 175, 176, 202, 204, 205, 212, 214, 215, 222, 224, 225, 226, 227, 241, 242

人类社会 3, 19, 44, 46, 65, 83, 150, 176

人类中心主义 143, 150

人民地理学 75, 76, 77

人文主义 30, 76

容器功能 215, 227

弱势群体 4, 177, 191, 199, 210, 211, 212, 214, 216, 219, 220, 223, 228

S

三级循环 8, 15, 33, 80, 104, 117, 118, 119, 121, 122, 236

商品 4, 15, 22, 29, 32, 33, 48, 49, 62, 68, 69, 71, 74, 79, 80, 81, 84, 85, 86, 87, 88, 90, 101, 102, 105, 109, 111, 112, 115, 116, 117, 120, 121, 122, 124, 127, 131, 141, 151, 153, 159, 161, 162, 164, 165, 167, 168, 169, 171, 178, 182, 183, 193, 194, 195, 201, 217, 221, 225, 236, 242,

- 247, 248
- 商品拜物教 115, 116
- 社会关系 3, 9, 18, 20, 21, 23, 24, 34, 39, 40, 41, 42, 45, 49, 59, 63, 65, 73, 74, 77, 79, 86, 99, 113, 116, 127, 129, 131, 132, 133, 142, 148, 149, 150, 164, 167, 168, 169, 171, 173, 175, 182, 183, 184, 197, 201, 208, 209, 211, 212, 213, 235, 236, 239, 241, 243, 245, 246
- 社会空间 19, 20, 23, 41, 42, 49, 57, 80, 237, 241, 242
- 社会替代方案 34, 38, 209
- 社会意识 13, 185
- 社会主义 10, 46, 47, 75, 129, 133, 149, 150, 158, 213, 214, 216, 219, 220, 223, 224, 230, 235, 246, 248
- 社区意识 173, 185, 199
- 身体 57, 58, 67, 152, 160
- 生产方式 9, 13, 26, 34, 41, 42, 44, 45, 46, 58, 69, 82, 91, 92, 93, 95, 96, 98, 99, 101, 110, 123, 125, 126, 152, 159, 160, 162, 163, 186, 187, 204, 222, 225, 228, 236, 240, 244, 245, 248, 249
- 生产关系 13, 39, 41, 42, 45, 46, 78, 86, 92, 99, 108, 122, 125, 130, 133, 142, 181, 204, 235, 237, 241
- 生产力 20, 41, 45, 46, 54, 62, 92, 100, 107, 122, 133, 134, 136, 142, 144, 149, 153, 162, 169, 183, 190, 237, 242
- 生产模式 34, 82, 94, 99, 117, 121, 123, 124, 127, 194
- 生态 13, 25, 37, 57, 60, 62, 66, 67, 76, 134, 137, 139, 140,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77, 199, 204, 215, 222, 223, 224, 228, 231, 234, 238, 243
- 生态环境 67, 139, 140, 144, 146, 148, 149, 150, 222, 223, 243
- 生态社会主义 149, 150
- 生态现代化 143, 146, 147
- 剩余价值 6, 11, 15, 32, 33, 78, 79, 80, 81, 84, 85, 90,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5, 106, 107, 108, 109, 111, 112, 116, 117, 119, 120, 122, 125, 130, 131, 132, 134, 142, 150, 151, 158, 160, 161, 162, 164, 166, 175, 179, 181, 187, 193, 201, 235, 236
- 时间 2, 6, 9, 13, 18, 19, 32, 33, 37, 38, 41, 49, 50, 51, 52, 59, 60, 61,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7, 79, 81, 82, 83, 88, 107, 121, 122, 123, 126, 127, 135, 153, 157, 161, 162, 164, 166, 173, 175, 178, 179, 200, 208, 211, 216, 218, 225, 226, 229, 230, 239, 240, 247, 249
- 时空观 65, 66, 68
- 时空压缩 9, 10, 70, 78, 82
- 实践 4, 13, 16, 19, 21, 24, 25, 26, 30, 35, 36, 37, 39, 42, 43, 52, 60, 61, 62, 63, 64, 68, 69, 71, 72, 73, 76, 77, 79, 82, 95, 127, 140, 143, 144, 146, 148, 149, 150, 153, 173, 193, 197, 201, 203, 209, 214, 226, 234, 235, 241
- 实证主义 2, 5, 6, 7, 16, 24, 25, 26, 64, 71, 72, 73, 78, 233, 234
- 使用价值 15, 33, 41, 42, 46, 47, 62, 74, 84, 85, 86, 87, 88, 89, 90, 105, 107, 108, 109, 115, 154, 162, 174, 193, 216, 236, 247
- 市场经济 4, 97, 136, 140, 151, 217, 223, 230
- 市民化 228, 229, 230, 231
- 私人空间 79

T

- 弹性积累 6, 10, 65, 78, 82, 85, 123, 125,
126, 127, 128, 209, 236
弹性生产 9, 10, 124, 125, 126, 128
泰勒制 124
涂尔干 65, 239
土地 4, 33, 86, 87, 88, 89, 90, 91, 92, 94,
95, 101, 102, 106, 110, 113, 114, 137,
138, 139, 143, 147, 149, 153, 169, 170,
172, 187, 188, 189, 191, 192, 194, 196,
197, 198, 200, 211, 218, 221, 223, 224,
227, 241, 248

W

- 危机 8, 12, 25, 29, 32, 33, 34, 45, 51, 60,
62, 78, 80, 81, 100, 108, 115, 117, 119,
120, 121, 122, 123, 126, 133, 134, 157,
158, 166, 171, 172, 174, 177, 183, 186,
196, 203, 204, 236, 238
为积累而积累 104, 105, 108, 109
韦伯 239
唯物辩证法 38, 141, 142, 235
文化 3, 6, 20, 21, 22, 41, 42, 45, 46, 47, 48,
51, 52, 58, 65, 66, 67, 68, 69, 70, 75, 82,
84, 94, 95, 99, 102, 114, 123, 125, 127,
128, 129, 130, 136, 138, 139, 140, 152,
155, 169, 176, 177, 186, 202, 205, 207,
208, 209, 211, 217, 226, 227, 230, 238,
241
乌托邦 7, 8, 34, 39, 40, 47, 56, 71, 76, 188,
203, 208, 209
无产阶级 26, 81, 158, 183, 206, 207, 211,
214, 235, 241, 243, 244, 245, 246
物的尺度 22, 225, 228

X

- 相对剩余价值 80, 100, 107, 162
象征资本 128
协作 100, 101
新自由主义 6, 130, 203, 212
形而上学 19, 20, 26, 59, 208
虚拟资本 94, 108, 116, 132
血缘关系 85, 155, 168

Y

- 亚里士多德 19, 138, 225
异化 10, 114, 131, 132, 133, 155, 222, 231
意识形态 26, 30, 34, 43, 71, 96, 144, 148,
149, 152, 182, 184, 236
银行 33, 50, 81, 90, 112, 113, 116, 124, 170,
191, 197, 198, 209
有机体 24, 190, 202, 203
有限空间 3, 19

Z

- 再生产 13, 32, 41, 42, 45, 65, 66, 67, 68,
71, 75, 78, 79, 84, 95, 108, 109, 113, 117,
119, 150, 152, 155, 160, 161, 167, 168,
169, 173, 175, 180, 182, 184, 185, 197,
204, 208, 242
增长 22, 29, 53, 81, 89, 97, 98, 99, 106,
107, 110, 112, 134, 135, 136, 137, 140,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54, 159,
161, 166, 171, 183, 187, 189, 190, 196,
197, 200, 204, 209, 216, 228, 235, 239,
241
正义 2, 6, 11, 13, 22, 24, 25, 31, 36, 40, 64,
73, 74, 76, 77, 140,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208, 216, 218, 220,
221, 228, 234, 246

- 政府 23, 72, 76, 84, 90, 99, 106, 110, 113, 114, 122, 126, 136, 137, 140, 147, 172, 185, 186, 196, 197, 198, 199, 200, 210, 211, 212, 214, 216, 219, 221, 223, 224, 231, 238, 249
- 政治 3, 4, 7, 8, 10, 11, 14, 15, 16, 18,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2, 33, 34, 39, 40, 42, 43, 44, 45, 47, 49, 53, 54, 56, 57, 60, 61, 64, 66, 70, 71, 73, 75, 76, 77, 84, 90, 94, 95, 98, 100, 110, 118, 122, 123, 124, 125, 127, 129, 139, 140, 141, 145, 146,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6, 157, 163, 167, 169, 170, 171, 172,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4, 186, 189, 190, 195, 196, 197, 203, 205, 207, 208, 209, 210, 212, 213, 229, 232,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7
- 政治经济学 3, 4, 7, 8, 10, 14, 20, 23, 26, 32, 40, 43, 64, 84, 94, 100, 110, 122, 124, 129, 148, 149, 163, 174, 232, 235, 236, 237, 238, 240, 247
- 芝加哥学派 21, 138, 172, 182
- 殖民主义 25, 211
- 住房 3, 4, 23, 33, 79, 84, 85, 88, 90, 104, 120, 127, 134, 181, 182, 186, 187, 189, 192,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4, 206, 207, 215, 216, 217, 218, 220, 221, 225, 229, 230, 231, 239, 246, 247, 248, 249
- 资本积累 6, 8, 9, 10, 29, 32, 44, 45, 60, 61, 74, 78, 79, 80, 81, 85, 97, 99, 104, 105, 107, 109, 110, 117, 119, 120, 121, 123, 124, 125, 127, 141, 145, 146, 147, 148, 149, 151, 152, 154, 162, 163, 165, 166, 171, 172, 173, 175, 177, 179, 180, 182, 183, 184, 186, 188, 189, 191, 197, 208, 209, 211, 237, 238, 240, 242, 243, 246
- 资本家 66, 67, 69, 80, 81, 98, 100, 104, 105, 107, 108, 109, 111, 112, 113, 116, 117, 118, 119, 120, 122, 130, 131, 145, 151,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71, 180, 181, 182, 187, 191, 205, 211, 246, 248
- 资本流通 22, 39, 62, 93, 94, 118, 121, 131, 173
- 资本逻辑 15, 16, 20, 42, 70, 78, 79, 84, 110, 129, 130, 131, 133, 134, 135, 141, 150, 236
- 资本循环 8, 33, 45, 78, 79, 80, 82, 117, 118, 120, 121, 122, 141, 149, 157
- 资本周转 33, 81
-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2, 3, 4, 7, 8, 14, 15, 18, 20, 22, 23, 24, 27, 31, 33, 34, 35, 36, 40, 44, 45, 48, 49, 51, 64, 65, 77, 78, 79, 80, 81, 82, 84, 85, 86, 90, 91, 92, 93, 94, 95, 97, 98, 101, 102, 103, 104, 105, 108, 109, 110, 111, 113, 114, 115,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30, 134, 141, 142, 143, 148, 149, 150, 151, 157, 163, 167,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81, 182, 183, 184, 185,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7, 199, 201,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3, 214, 220, 232, 235, 236, 237, 238, 239,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50
- 资产阶级 27, 30, 31, 33, 48, 59, 60, 67, 71, 78, 81, 94, 97, 98, 99, 106, 109, 111, 112, 116, 117, 132, 133, 141, 142, 148,

- 149, 151, 152, 158, 159,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70, 172, 173, 178,
180, 181, 183, 184, 189, 194, 201, 207,
212, 235, 237, 241, 243, 244, 246, 248,
249
- 资源 2, 3, 4, 14, 15, 21, 24, 25, 26, 33, 37,
48, 50, 67, 71, 76, 77, 78, 84, 106, 108,
109, 129, 134, 135, 137, 143, 145, 146,
147, 148, 149, 153, 166, 169, 182, 184,
192, 194, 195, 204, 207, 211, 213, 214,
219, 220, 222, 223, 225, 229, 234, 238,
239, 245
- 自然空间 20, 23, 77, 237, 241
- 组织创新 82, 98, 99, 100

参考文献

一、英文类

1.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2.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3.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lackwell, 1985.
4. 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6.
5. Davi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R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New York London, 2006.
6. David Harvey,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Verso London, New York, 2006.
7.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8. David Harvey,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deology of Science, *Economic Geography*, Vol. 50, No. 3 (Jul., 1974).
9. David Harvey,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Vol. 71, No. 1.
10. David Harvey,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0, No. 3 (Sep., 1990).
11. David Harvey, The Soci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New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Spring-

Summer, 2005) .

12. David 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 SEP/OCT2008.

13. Bernard Magubane, The Limits to "Capital" by David Harve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12.

14. Cyndi Katz,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assions: Engagements with David Harvey's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8, No.4 (Dec., 1998) .

15. David McCrone, Book Reviews,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and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01.38, No. I (Mar., 1987) .

16. Dick Peet, Classics in Human Geography Revisited: Harvey, 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Prog Hum Geogr*, 1992.

17. Gordon L. Clark, Book Reviews: The Limits to Capital, by David Harve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3, No. 3 (Sep., 1983) .

18. John Eyles, Book Reviews: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and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from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 12.

19. R.E. Pahl, Book Review: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by David Harvey, *Urban Study*, 1974.

20. R. J. Morris, Book Reviews: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and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0, No. 3 (Sep., 1988) .

21. Richard L. Morrill, Book Review: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64, No. 3 (Sep., 1974) .

二、中文类

1.《资本论》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2、3、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45、46卷,人民出版社2001、2003年版。

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7.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

书馆 1992 年版。

8. 巴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9. 迈克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10.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11.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
12.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年版。
13.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14. 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 年版。
15. 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16.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17.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8.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
19. 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20.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10 年版。
21.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22.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23. 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
24. 詹姆斯·E. 万斯：《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年版。
25. 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26. 布莱恩·贝利：《比较城市化》，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27. R. J. 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28. 杰布·布鲁格曼：《城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29. 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年版。
30. 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31. 王钰：《重读〈资本论〉》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32. 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编》，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33. 褚一纯：《〈资本论〉方法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34. 孙伯鍈:《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5. 夏铸九、王志宏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明文书局1999年版。
36. 何干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逻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37.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8.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9. 陈信主编:《〈资本论〉学习与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0. 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1. 张小金:《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2. 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43. 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4. 孙久文、张伯瑞等编著:《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5. 汪民安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6.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7.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48. 汪民安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9. 王明浩主编:《城市科学小百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7年版。
50. 孙逊主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51. 蒋涤非:《城市形态活力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2. 李閔魁:《城市规划与人的主体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53. 赵仁童主编:《想起唐朝》,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4. 复旦大学哲学院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5. 复旦大学哲学院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6.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57. 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至四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8. 李翔宁:《想象与真实:当代城市理论的多重视角》,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年版。
59. 任致远:《解析城市与科学》,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年版。
60. 孙逊主编:《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61. 孙江:《“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2. 张鸿雁,胡小武主编:《城市角落与记忆I——社会生态视角》,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3. 张鸿雁,胡小武主编:《城市角落与记忆II——社会更替视角》,东南大学出版

社 2008 年版。

64. 牛凤瑞主编:《城市学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65. 顾朝林主编:《城市与区域规划研》, 2008 年第 1、2 期, 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
66. 王军:《采访本上的城市》,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67. 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68. 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
69. 刘士林:《2007 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70. 杨帆:《城市规划政治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71. 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72. 复旦大学哲学院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73. 景天魁、朱红文主编:《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74. 景天魁、朱红文主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75. 蔡运龙:《地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地理研究》1990 年第 3 期。
76. 大卫·哈维:《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宣言》, 《地理译报》1990 年第 3 期。
77. 顾朝林:《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 《地理学报》1997 年第 3 期。
78. 吴敏:《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大卫·哈维论资本主义》, 《国外理论动态》2001 年第 3 期。
79. 刘元淇:《全球化和个体——评大卫·哈维的〈希望的空间〉》, 《国外理论动态》2001 年第 5 期。
80. 顾朝林、李平:《哈维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中华读书报》2002 年第 5 期。
81. 唐晓峰:《思想者哈维》, 《中华读书报》2002 年第 5 期。
82. 胡大平:《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20 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 期。
83. 胡大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 《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 期。
84. 仰海峰:《全球化与资本的空间布展》,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
85. 潘泽泉:《社会空间的极化与隔离:一项有关城市空间消费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
86. 侯敏、张延丽:《北京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城市》2005 年第 3 期。

87. 叶涯剑:《空间社会学的方法论和基本概念解析》,《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88. 胡大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间敏感性》,《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89. 乔万尼·阿瑞吉:《霸权的瓦解(上)》,《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9期。
90. 任平:《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基本走向》,《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5期。
91. 钱振明:《走向空间正义:让城市化的增益惠及所有人》,《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92. 任平:《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93. 胡大平:《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94. 王金岩、吴殿廷:《城市空间重构:从“乌托邦”到“辩证乌托邦”——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的中国化解读》,《城市发展研究》2007年第6期。
95. 张海防、许汝贞:《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96. 胡大平:《为什么以及如何通过空间来探寻希望——哈维〈希望的空间〉感言》,《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
97. 邱梦华:《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研究》,《城市问题》2007年第3期。
98. 徐琴:《制度安排与社会空间极化——现行公共住房政策透视》,《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99. 刘拥华:《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阐释》,《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2期。
100. 董慧:《大卫·哈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述评》,《哲学动态》2008年第5期。
101. 仰海峰:《弹性生产与资本的全球空间规划——从马克思到哈维》,《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
102. 田世锭:《哈维:处在“领土逻辑”下的新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第11期。
103. 巨澜:《哈维城市空间理论述评》,《黑河学刊》2009年第2期。
104. 李秀玲:《哈维的新帝国主义思想》,《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05. 吴雯丽:《浅析哈维对后现代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电影文学》2009年第3期。
106. 丰子义:《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07. 蓝江、王亦琳:《社会—空间辩证法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爱德华·索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2009年第4期。
108. 张雷声:《〈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109. 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110. 白钢:《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111. 张凤超:《资本逻辑与空间化秩序——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解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7期。

112. 王志章:《从田园城市到知识城市:国外城市发展理论管窥》,《城市发展研究》2010年第8期。

后 记

城市化问题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各个学科、各个思想流派和众多学者都从不同视角关注、分析和探讨这一对中国社会产生全面深刻影响的社会现象。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举世瞩目的，中国城市化无疑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城市化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提供了日益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城市化也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城市化还塑造了城市居民独特的人格、心理和文化。但是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是诸多问题的隐忧：资本在城市发展中缺乏控制、约束和引导；片面的以经济发展为重要衡量指标的城市发展模式；缺乏健康合理和一以贯之的城市规划；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资源问题；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的凸显。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独特背景在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影响日益深远的信息化，因此，吸收和借鉴西方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有关城市化的思想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征程中必要的选项。

本书的写作主要依托两个思想资源：一是大卫·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卫·哈维是活跃的著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西方社会激进左翼人士的代表。其学科背景非常的广泛，但最大的亮点在于他实现了“以环境、空间为主要载体的地理学科”和“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的认识批判社会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资源”的有机结合。其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重要视阈来分析、解读和评判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更是其思想资源中最为宝贵而又较少被系统关注和全面解读的部分。正是基于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一系列问题的反思和对哈维城市空

间思想的理解与把握，才有了本书创作的动机和最终的付梓出版。

本书主要从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理论渊源、理论基础、资本逻辑视阈下的城市空间、权力逻辑视阈下的城市空间和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评判五部分构成。就理论渊源而言，本书认为马克思的立场与方法、列斐伏尔的空间与社会、福柯的空间与权力是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理论源头，正是通过吸收这些思想家的营养后才形成了哈维独特的城市空间思想。就理论基础来看，“视空间为社会的构造物”、“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将之作为用来分析探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工具”是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理论基础的两大基石。从资本逻辑视阈来看，哈维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看作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资本主宰的城市空间，并对弹性积累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做了探讨，在该部分的最后还就资本逻辑和我国城市发展模式做了一些反思和建议。从权力逻辑视阈来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充斥着人与自然、资本与劳动、不平衡地理发展等一系列矛盾，在该部分结合哈维对未来城市空间的探讨也提出了对我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正视和化解城市矛盾、制定健康合理并一以贯之的城市规划、贯彻城市建设中的以人为本原则等问题的思考与建议。最后是对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的评判，本书认为哈维在促成地理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开辟城市空间分析的新视角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思想等方面都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可贵的贡献，但哈维城市空间的最大缺憾在于对空间的过分崇拜和极大的拔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思想的严重误读曲解。

本书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扩充和完善而成的。博士论文的撰写完毕，标志着我正规学习生涯也即将画上了句号。回首19年前我大学毕业到地处川东北穷乡僻壤的农村小镇从事中学教学工作，8年前到樱花盛开的武汉大学开始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涯，3年前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镇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而回到我的家乡四川并在西南科技大学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这一路历程，感触良多。在这一路行程中，是我的良师、益友、同事、领导及其家人的支持和帮助才使我走完了这一段充满艰辛却又有重要意义的路程。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黄继锋教授。6年前，在我硕士毕业找工作四处碰壁时，是他把我招至麾下，这才使得我有了新的起点和不同人生道路。3年间，导师在学习上给我提供许多指导和帮助，尤其是博士论文的选题、提纲的审定、初稿和定稿都凝聚了老师的心血。导师严谨的学风使我受益终生，我的博士论文几易其稿，导师都层层把关，哪怕是论文的一个标点符号和错字都不放过。更让人感动和难以忘怀的是，导师给我这个特殊的学生提供了众多的支持和帮助，教我如何处理协调家庭关系、关心我们一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尤其是为我儿子的学习提供了许多帮助。

我还要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雷声教授、张云飞教授、张新教授，他们（她们）不仅在课堂内外给我们传授了知识，而且还以其渊博的学识、淡泊名利的风范提供了我以后做学问、做人的方向和原则。三年攻读博士生涯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还离不开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2008级这个特殊班集体和师弟师妹们给我提供的诸多支持和帮助。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哥们陈文胜、李桂华、苗卫东、谢庆，是他们使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物质和精神的难关。在此我还要真诚地感谢师妹王明哲、师弟彭洲飞为我的论文部分英文资料提供了翻译，师弟姜霁清为我找工作提供了许多信息和实实在在的帮助。

我要衷心地表达我对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这个我人生又一重要驿站的组织和群体的感谢。我要特别感谢院长黎万和同志，正是在他对科研的极大支持下和四处筹集出版费用的努力下才有了本书的顺利出版；我要特别感谢前任院长徐云峰同志，有了他的关心和帮助我才能后顾之忧地生活在一个新的单位和集体中；我还要感谢副院长赵洋，是他领导兼兄弟的角色给了我学习、生活和事业上的诸多支持与帮助。在此，我还要感谢李群山和孙霞夫妇，来到西南科技大学很荣幸认识这两位朋友和邻居，群山兄弟与我一起常常就热点问题、学术问题等展开切磋和讨论，使我获益匪浅；孙霞妹妹为我的论文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打印做了许多琐碎的工作。

最后，我还要表达对我家人的歉意。8年来，爱人和孩子随着我颠簸流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过着没有保障、不安定的生活。如今终

于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安家，爱人有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儿子能够在理想的学校学习，这也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加倍努力为家庭多做贡献，为孩子学习成长多花费精力，力争为家人构筑一个温馨和睦的爱巢。

唐旭昌

2014年10月5日于西南科技大学科大花园38栋